

第一章 因战败而呈现虚脱 状态的酷热的晚夏

(一九四五年)

宫城前一片呜咽之声

天气象发了疯似地炎热，没完没了的晚夏酷暑是历年不曾有过的。太阳日复一日地挂在天空上燃烧着，烤得人们头晕目眩，热风在已经被空袭化为废墟的条条街道上打着旋儿，再加上战败带来的虚脱与惶惑，苛烈的灼热感与难以忍受的痛苦一骨脑儿地向国民袭来。

确切地说，日本决定投降的日期是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八月十三日中午——在宫中的防空洞里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天皇做出决断，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宣言的那一时刻。而国民是在隔一天的十五日中午，从天皇通过无线电广播发布的“终战诏勅”中，才获知这一消息的。

从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到这一天的八年间，国民的生活、精神、甚至生命，都被牢牢地系在这场战争上。即使被失利的战局和物质的匮乏逼得走投无路时，也凭着坚信“天皇的神话”和“不败的传说”赖以苟活下来。对于所有的日本人来说，战败，那是连说也不能说一下，连作梦也不愿梦到的事。

正因为这样，国民对八月十五日的玉音^①广播诏勅说了些

^① 玉音：指天皇的声音——译者。

什么，就难以听懂了。只觉得广播的声音不象天皇的语调，再加上听不清楚，不少人把投降的意思误听为“本土决战”、“一亿人捐躯”……。即使听清这是战败、投降的诏勅，也有人产生了奇怪的错觉，认为：“要说投降也罢，怎么还说无条件投降？莫非连领土、战争赔款都不要了？！到底不愧是大日本帝国的气派呵！”

战败的消息传开以后，整个长长的夏日的午后，数以千计的人络绎不绝地涌向宫城二重桥前的广场，在人群里夹杂着小学生、中学生、还有妇女的身影。他们的步履由于战败的冲击变得分外沉重。不知是谁，顾不得外表与体面，一屁股坐在沙土地上，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天皇陛下，请宽恕我们吧。”这是跪在地上叩拜的老人们发自内心的声音，“由于自己无能而导致战败”——请罪的意念都凝结在这句话上。在这人群中，既有仍然虔诚地怀着效忠天皇的思想、高呼“天皇陛下万岁”的青年人，又有与之相呼应的军人。

以这种场面为第一幅画面揭开了战后的日本史，但是，这种情景在尔后的昭和年代中再没有出现过第二次，可以把这一幅画面视为粉饰明治以来天皇制的最后一个场面。

搜寻天皇诏勅的录音盘

正是因为天皇的神话与不败的传说影响极为深远，当战败之际，在军人、右翼分子中间发生了执迷不悟甚至疯狂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了。一部分军人叫嚣：“不能承认战败，要彻底抵抗，直至在本土上决战”。八月十四、十五两天发生了夺取玉音广播录音盘，甚至发动政变的事件。

陆军省军务局军务课内政班长竹下正彦中佐（陆军大臣阿南惟几的义弟）、课员井田正孝、椎崎二郎中佐、畑中健二少佐、近卫师团参谋古贺秀正中佐（原首相、陆军大将东条英机的女婿）、石原贞吉少佐等人，便是这一事件的主谋。他们的意图是，迫使主张投降，寻求和平的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内阁下台，拥立主张本土决战的军部政权。

十四日上午十一时左右，井田、椎崎骑着自行车从位于市之谷的陆军省来到位于竹桥的近卫师团的司令部，与他们的同伙石原、古贺、畑中还有陆军航空士官学校教官上原重太郎大尉碰头了。他们准备说服森师团长，使近卫师团参加他们策划的政变。

森师团长去视察皇宫的警卫工作，返回来时，已经将近午夜零点时分。森已经觉察到这一伙人聚集在一起的意图，他说：“谨奉天皇的圣旨 实行和平停战。”粗暴的井田胁迫森师团长参加政变，森断然拒绝了。情绪激愤的上原立即拔出军刀。恰好这时森的义弟、广岛第二总军参谋白石通教中佐来到这里，他立即上前护卫森，上原高高举起军刀，照着他的左肩劈去，与此同时，畑中也拔出手枪，对准森悍然开枪，一枪便结束了森的性命。

于是，他们假借近卫师团的名义发布命令，控制了负责宫城警卫工作的近卫步兵第二连队。接着就据此将预谋的占据宫城、检查出入车辆、切断与外部通讯联系等行动计划付诸实施。

“为了阻止明天中午天皇通过广播发布终战诏敕，必须夺取录音盘，然后胁迫天皇重新做出决断。”这就是他们的目的。这时天皇发布终战诏敕的讲话已经灌好录音盘。关于这一

情况从《日本广播史》中的一节记述中可以得到证明：

“在宫内省二楼的御政务室内用绣有‘狮子滚绣球’图案的两张屏风围起来，中间立着麦克风。十四日晚十一时二十分左右，天皇身穿陆军元帅服步入室内，站在麦克风前。宫内大臣石渡庄太郎、侍从长藤田尚德，侍立在窗前，情报局总裁下村宏侍立在走廊上。在隔壁谒见厅里放着两个圆盘式录音机、录音扩音器和录音再生机，由广播电台和情报局方面的人管理着。

天皇手捧写在奉书纸上的诏书，一字一句，全神贯注地念着。但是录音有几处不够清晰，当管理录音机的技师与侍从长研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天皇对情报局总裁下村宏说：‘刚才读的声音好象太低了，再重新录一次吧。’于是，又第二次进行了录音。至十一时五十分，天皇离开了这间政务室。”

近卫步兵第二连队奉搞政变的一伙人的假命令，进入宫城内把各个大门锁起来，不久又占领了红叶山上的通讯所。搞完录音的情报局总裁下村和其余五名有关人员分乘五辆车，行驶到坂下门的时候，被佩剑的卫兵命令停车，车上的人全部被监禁在二重桥附近的卫兵守候室里，由搞政变的军官对他们进行审问。“录音盘放在哪里？”“由宫内省保管，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其中一个人回答。

他们立即到宫内省去进行搜查。幸亏录音盘存放在侍卫武官室的隔壁——皇后宫职事务官室内，他们的手未能伸到这里，录音盘才幸免遭劫。

另一方面，政变军占领了位于内幸町的广播电台。搞政变的军官们用手枪逼着电台工作人员馆野守男（后来成为有名的新闻解说员，NHK广播电台理事）等人说：“给我广播，就说

战争继续打下去！”馆野反驳道：“广播电台由东部军管区司令部管理，没有他们的许可不能广播。”于是他们给东部军管区参谋打电话，可是看样子他们好象被对方说服了，不一会儿便撤离了广播电台。这一出政变闹剧刚演个序幕便草草收场了。

彼伏此起，八月十五日，又有一伙人袭击了永田町的首相官邸。这是东京警卫军第三旅团旭部队横滨队的佐佐木武雄大尉率领的四十名官兵和横滨工业专门学校，东京工业大学的数名右翼学生搞的。他们开动军用卡车进京来到官邸，在大门口架起三挺机枪进行了一阵威吓性的扫射。

铃木首相这时不在官邸。这伙暴徒直扑向小石川丸山町的铃木私邸。铃木接到从官邸打来的电话，遂逃离私邸到本乡西片町的妹妹家去避难。到了妹妹家以后，铃木的秘书赶紧往私邸打电话，想告诉家人“首相已平安抵达西片町”。

不料接这个电话的人正是刚刚占领了首相私邸的暴徒。“什么？！……”粗暴地回答。秘书一听知道事情不妙，慌忙把铃木首相转移到其弟陆军大将铃木孝雄的私宅去。找不到铃木首相，这伙暴徒气急败坏，把铃木的私邸洒上汽油付之一炬。与此同时还有一伙人袭击并纵火烧了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的私邸。

叫嚣“本土决战”的叛乱在继续

与这种搞政变、企图暗杀首相的政治性军人不同，各地还有为数不少的军人，他们认为投降是最大的耻辱。与其投降莫如死。因而陷入极度愤怒与绝望，想要继续拚下去。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厚木航空队的叛乱。主谋是第三〇二航空队司令小藺安名大佐。他于十五日下午，两眼充满血丝对部下命令道：

“投降是君侧的奸臣贼子们策划的。神州日本怎么会投降？务必迫使天皇再次发出继续战争的诏书，给我向全体海军发出决战的电令。”

小藁把印有“告国民同胞书”的本土决战传单数万张装进厚木航空队的飞机，然后开着飞机在东京上空盘旋一周，把这些传单纷纷扬扬地撒了下去。翌日，竟然把传单撒到东北和九州。但是立即有流言说小藁患了疟疾，并得了精神分裂症。加之皇族高松官亲自给厚木打来电话说：“求和平的圣断是天皇自己的本意，希望国民服从。”因此厚木航空队镇静如常，叛乱未能得逞。

“至少也要痛击敌人一下以后再投降。”单凭血气之勇而死不认输的是埼玉县驻扎的陆军航空兵团八十八、八十九战斗队的青年军官们。直到十六日早晨，他们还要出动装备着炸弹的飞机，去迎击占领军。①

一直到八月二十四日，还能看到一些纷乱现象。疏散到长野县的陆军预科士官学校的教官、学生们袭击并占领了埼玉县川口广播站。因为这里是对海外广播的基地。他们企图从这里向外界发布彻底抵抗的宣言。

但是，这类骚扰实际上比预想的少，其规模也不大，在短短的几天里便烟消云散。至八月二十八日，当一百五十名美国士兵做为占领军的先遣部队飞抵厚木时，已经没有抵抗派的影子了。

“本土决战”，“彻底抵抗”之类军人们歇斯底里的叫嚣，与厌战的国民心理大相径庭所以得不到支持。同时，他们的主张在“终战是天皇的意思”、“只有奉诏遵旨才是国民的本分”

日本宣布投降后，美军进驻，日本称之为占领军。 — 译者

等伦理观念面前，更加显得苍白无力了。后来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部首脑在追述当时的感受时说：

“我们进驻日本时，以为一定会遭到一部分军队和国民的抵抗，因而派往厚木的先遣部队都有决一死战的思想准备。而实际上却出乎意外地实现了不流血的和平进驻。这也是由于天皇的权威所致。”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这也是天皇最后的权威了。

自绝身亡的军人们

被战败的责任和投降的屈辱驱使着自杀身亡的军人为数甚多。直至最后仍坚持主张要在本土决战的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大将在十四日的御前会议上看到终战的大局已定，是夜，遂于麹町的陆军大臣官邸里剖腹自杀，并留下绝命书：“引咎一死，以谢天下，我仍坚信日本神州不灭……除深蒙天皇的隆恩大德外，我没有须留下的遗言。”海军特攻队的创始人、军令部次长大西瀧治郎中将也于十六日拔剑自刎。

此外，负责镇压政变的东部军管区司令官田中静壹大将也在其麾下人马渐趋平静之后，于八月二十四日自尽。原陆军大臣杉山元元帅，原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大将也是同样结局。参加政变的古贺秀正（东条英机的女婿）遭到镇压以后也在近卫师团部自杀了。让森师团长的义弟白石中佐吃了一刀的上原大尉考虑，与其受军法会议处治，莫若自裁，于是拜托其亲友荒武禎年大尉作为助刀人，^①在陆军航空士官学校内的航空神社前剖腹。当把上原的首级割下来时，身上溅满鲜血的荒武，把

^① 有的日本人，在剖腹自杀前，先拜托某人，以备自杀不能顺利完成时，从旁帮助断其头颅，接受这种拜托的人，称为助刀人。——译者

带血的军刀连擦也不擦就挂在腰间返回中队，在士官学校候补生面前开始了讲述日本历史的训话，可是，当时他已经完全陷入惶惑状态，语无伦次地重复着自己的话，不知所云。

发动政变的椎崎二郎、枪杀森师团长的畑中健二，在十五日正午天皇发布诏敕之前，先行一步用手枪将自己打死。最有讽刺意味的是石原贞吉，他被东部军参谋在电话里说服以后放弃了政变的念头，转而去说服在上野彰义队墓地附近集结的抵抗气焰高涨的水户航空通信学校的学生兵，被主战派学生当场击毙。关于终战时陆海军的自绝者人数，现存有一本《终战时自绝烈士芳名录》根据该书记载：

陆军：将官三十人，佐官四十九人，尉官一百零五人，下士官一百零四人，士兵八十八人，军属十八人，共计三百九十四人。

海军：将官四人，佐官二十五人，尉官三十七人，下士官四十一人，士兵六人，军属十三人，共计一百二十六人。

其他：护士三人，身份不明者三人。总计五百二十六人。

右翼集团集体自杀

在右翼集团中，选择自杀这条路的也大有人在。在尊攘同志会，当初就有人气势汹汹地说：“一定要除掉使日本投降的罪魁祸首木户幸一内大臣。”

八名持这种主张的青年右翼分子于八月十五日拂晓及次日上午三时，先后两次袭击了赤坂新坂町的木户邸。那里曾经遭到空袭，木户已搬迁了。八个人从那里撤退回来，就在爱宕山的六角堂里存身。他们打着绑腿、头上扎着白毛巾、甚至还准备了日本刀、手枪、手榴弹。随后，又有两名青年加入了他们

的行列。

政府当局谋求在占领军进驻之前，使他们这个组织解散。由警视厅特高部长上村健太郎担任指挥，包围了爱宕山。虽然右翼分子的大人物儿玉誉士夫、东部宪兵队的塚本诚大佐、特高第二课长石冈实等人，相继前去说服他们，但他们拒不解散。警察方面只好转而准备采取武力解决。正当这时，他们十人用手榴弹爆炸，集体自杀了。事情发生在二十二日下午五时刚过。

可怜的是，二十七日天亮以前，他们之中三个人的年轻的妻子一同登上了爱宕山，各自以军用手枪自杀，追随她们的丈夫一路归天。

同为右翼集团的明朗会，以其领导人日比和一为首，共十二人，于八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时，在宫城前分别以手枪、剖腹、服毒等方法集体自杀。在他们的遗书中写道：

“日本国正处于生死关头，我等已经赤手空拳，仅以祈祷、热泪与鲜血，披沥我等仰慕天皇的恋阙之意。”

因神兵队事件而出名的大东塾，塾长影山正治应征入伍，正在中国的华北，由其父影山庄平代营。以影山庄平为首，大东塾的十四名右翼分子，也集体自杀身死。

据《大东塾十四烈士自刃记录》载称：

八月二十五日凌晨三时，他们在明治神宫附近代代木练兵场上的十九株榉树旁集合，每个人都端端正正地席地而坐，从三个方向，象庙宇的栅栏似地围成一个半圆，由影山发出信号，十二个人一齐剖腹自杀，其余两名助刀人，最后也都各自以剖腹这个日本的传统方式结束了生命。

他们的死，象征着当时日本人因对天皇的神话与传说这一

精神支柱的崩溃而感到空虚，对日本的未来感到绝望的心情。虽然大部分日本人还没有想到绝路上去，但其心理都处于当时所特有的“虚脱状态”。这种所谓“虚脱状态”就是——信仰、紧张一下子消失之后，产生了一种无重心感，或者说是疲劳感，空虚感，还夹杂着解放感，也就是说不知该做什么，也不想做什么那样一种心理状态。

实际上大多数人的这种心理状态是在忍受着饥饿和连日的酷暑，在瓦砾堆上用被烧过的铁皮搭起的小破棚子里苦熬过来的。

第二章 占领政策扎实 而迅速地展开

(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六年)

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到来

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下午，一架鲜明地印有吕宋岛地形图和BATAAN（巴丹）字样的飞机划破碧空冉冉下滑，降落在神奈川县的厚木机场。从银白色的舷梯上走下来的是联合国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元帅。他戴着一副太阳镜，在他那高个子身材的右手里轻轻地捏着一个烟斗。

华贵的烟斗，在从前曾经是开拓者的珍爱之物，是开拓美国西部地区的历史象征。这次麦克阿瑟又亲自担负着远东开拓者的使命。事实上，从麦克阿瑟踏上日本国土的那一时刻起，便注定了日本无论在地理、政治、经济方面，还是在社会、风俗上，都将做为美国的边陲渡过尔后的若干岁月。当天，麦克阿瑟乘吉普车直驱横滨、下榻在已被美国接收的新大饭店，并把总司令部（GHQ）设在关税大厦里。

三天后的九月二日上午，日本投降书（规定把日本置于联合国占领军的管辖之下。日本的国土是本州、北海道、四国、九州）的签字仪式在停泊在横滨湾的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日本的全权代表，是东久迩宫稔彦内阁的外务大臣重光葵和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重光靠拐杖支撑着装有假腿的身

子，面部表情忧郁、沉重，步履艰难地登上舷梯。跟在他后面的梅津，穿着已经失去昔日威风的卡叽军装，没有佩带军刀，一副徒手武士的狼狈相。

在并列坐成一排的联合国代表面前，麦克阿瑟做了简短的演说之后，随即转入签字。重光的那只好腿也是那么不听使唤，好歹蹭到桌子旁边，他的样子象在投降书上浏览，其实目光已经呆滞了。对于日本来说，这是首次尝到失败的滋味。面对着投降书，呆若木鸡，茫然不知所措。

麦克阿瑟指使身边的斯萨兰德参谋总长说：“你告诉他在哪儿签名吧！”重光签字之后，梅津取出了笔。事后重光写下了一首和歌：“宁可让世人鄙弃我们的臭名 愿祖国从此繁荣昌盛。”

异常和平的美军进驻情景

经过这么一段原委之后，占领政策便开始了——以美军先遣队的进驻为开端，接连不断地有军队开来。八月末开始有“美军搞掠夺和奸淫”的传闻，东京、横滨、横须贺等地的居民为此提心吊胆。政府机关和公司都不让女职员上班了。各家各户嘱咐女孩子们不要出门，也有的逃到乡下去了。

在第三舰队登陆的横须贺，市政当局向市民发出指示：“虽然没有必要离开居住地，但也要多加小心，不要给人以可乘之机 女子的态度仪表要严肃端庄，千万不要让外国人产生误解。”

在美军进驻的城市里，市政当局提醒市民注意：“不要因好奇而出来观望”也“不要追赶进驻军的车辆”；要以保甲组为单位互相协助对付进驻军。”即使这样，在部分地区也未能避免美国兵的掠夺与奸淫。据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朝日新闻》报道：

“八月三十日上午十一时半左右，在横须贺市旭町，两名

联合国士兵强奸了一名妇女，并夺走其手表。同日下午六时左右在该町又有一名联合国士兵用手枪胁迫强奸一妇女。还有其他两起未遂事件。

“八月三十一日下午四点半左右，在横滨市保土谷区岩井町附近，一人在运输五十箱二十四瓶装的啤酒时，有数名美国兵命令其停车，抢劫了五箱啤酒。当晚十点半左右，有三名美国兵来到保土谷警察署，拿了桌子上放着的一把日本军刀扬长而去。除上述事件外，仅三十一日一天，该市发生抢掠物品的事件达十一起，抢劫汽车的事也相当多，甚至还有抢劫仓库的事件发生。

“为此，日本当局向横须贺地区占领军巴嘉少将提出抗议。总司令部的马歇尔副参谋长就美国兵向日本巡察开炮事件（在横滨）表示歉意。”

可以说，这些事件的发生是由于进驻军把横冲直撞的战场心理，原封不动地带进日本，和日本由于战败而畏惧，这两方面因素复合而成的。尽管如此，但比起在满洲的日本人被苏军残杀、掠夺、奸污的惨状来，联合国军的进驻还是相当和平的。九月九日《朝日新闻》报道说：“传统的美国骑兵师（骑兵只是个名称，其实并不骑马，而是以吉普车代步）军纪颇为严整，对市民的日常生活也颇具慈心……”。

很快地联合国军（其实就是美军）与日本人开始了没有磨擦的接触，并熟悉起来了。固然，在昭和年代初期日本人已经开始接受美国式的洗礼，不消说，对“美国方式”也或多或少地有了某种程度的理解。这肯定也是原因之一。因此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到处呈现出一派美军占领下的独特而平静的景象。有两位名叫伊·勃尔塔夫斯基和阿·巴辛的苏联人在他们写的

《占领下的日本》中这样描写：

“在银座的中心地区耸立着新月形的服部钟表店，美国兵们正蹒跚地登上台阶。在另一处，一个美国兵正在肖像画前做出准备摄影的姿态。在这里经常可以看到喝醉酒的美国兵搂抱着“梆梆女郎”（以外国人为对象的娼妓）东倒西歪的样子。

其他地方也是如此，银座最好的建筑物都给美国的设施占用了。在服部钟表店设有美国人专用的‘px’商店，在门口挂着‘非美国人禁止出入’的牌子。以麦克阿瑟为股东的‘莱明古顿·兰德公司’的广告牌在头上高高地悬挂着。用英文写的‘国际新闻服务’、‘伦敦泰晤士报’不断在眼前闪烁。外国公司、出版社一家挨一家地排列在一起。这也是战后出现的新景象。

高岛屋百货商店是供应皇室御用的日本最古老的店铺之一。但在特设的电梯上却写着‘外国人专用’商店大楼的七八层专为外国人服务。在人字形的柜台旁边写着‘占领下的日本制造’的字样。这是占领军总司令部命令在所有日本制商品上都必须贴上的标签。”

惊奇！如此美国文明

把总司令部由横滨迁到东京第一生命保险公司大厦，那是在密苏里舰上签订投降书后不久的事。这座大厦至今仍隔着马路和城池与“皇居”对峙而立。

曾经被称为“宫城”的皇宫，在战败后大约两年半左右的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六日被改称为“皇居”。当天的《信浓每日新闻》在报道中说：“宫城这个名称会给人以武家时代的感觉因而曾考虑要改一下名称。宫内府曾经研究内定改称为‘皇居’，最近取得了国会的承认。”而占领军总司令部在政、官、财、舆

论界人士面前都称之为“城池那边”。

在总司令部所在地东京，许多建筑物都被美国接收了。有乐町的东宝剧场也是其中之一，并以在菲律宾战死的美国随军记者阿尼·帕伊尔的名子给这座剧场命名，成为美国军人的专用剧场。其他一些受到空袭焚烧过的饭店、旅馆也都成了美军及其家属的住宅、招待所或俱乐部。在赤坂的山王饭店等也是如此，这个饭店直到一九七八年仍然是美军饭店。甚至连芦田均首相在大森的私邸，在一段时期内，也将其一半让给美军军官居住。

在立川、横滨、横须贺、东京等设置军事基地的地方，条条街道都有乘吉普车奔驰的美国兵，跟他们在一起鬼混的“梆梆女郎”到处可见。还有在仓促中装修起来的酒吧间、夜总会、俱乐部，它们那花俏的招牌和闪烁的霓虹灯分外夺目。这些东西一开始是那样鲜明耀眼，但没多久便成为不足为奇的基地风光了。

在人们对占领军的存在渐渐习以为常的过程中，逐步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兴趣，始而入迷，进而努力模仿。战败后的日本人在生活中，对住宅、服饰、饮食越是感到不足，追求美国生活方式的心理越是强烈。这种转变是以流行歌曲为开端的。《新东京之歌》（清水七郎作词）《吉普车在奔驰》（吉川静夫作词）就是这股潮流的代表。《吉普车在奔驰》的一段歌词这样写道：

“轻盈的车身多么漂亮，
手握方向盘我心里舒畅，
行人投来羡慕的目光。

哈喽！哈喽！

吉普车在奔驰，吉普车奔向前方！

对这种被占领状态，虽然有人嫌“殖民地味太浓”、“从属美国”而直皱眉以示反感，但多数人却很快地美国化了。在二、三十年代，美国式影响还只限于通过电影、活字印刷沟通情况。而战后的这个时期，由于美军的进驻，把这个局限突破了。尤其使日本吃惊、使日本想奋力效仿的，是美国的文明，它在向美国化的演变中，具有某种魅力。

例如——投降后的八月二十八日，当美国先遣队的飞机在厚木机场降落时，前来迎接美军的日本军人一下子惊呆了：机仓被打开后，从里面露出来的是日本人不常见的汽车——吉普车。专门靠徒步作战，在向马来半岛进军时曾使用自行车，因而引以为豪，并自吹自擂为“银轮部队”的日本军人，这时看到美国兵的交通工具不禁在心中暗自叫道：“怪不得我们打败了”，并为美式自动步枪和其他武器所倾倒，当那些吉普车初次在日本的街道上奔驰时，某家报纸竟然还以“吉普车是何物”为题，一本正经地发表了文章。

九月九日《朝日新闻》在《美国同僚工作效率高的若干事例》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一篇题为《横滨——厚木之间的输油管道瞬间铺就——美国进驻军的高效率》的报道。文中写道：

“从横滨港的瑞穗栈桥至厚木机场的汽油输送管道，仅用两天时间铺设完毕。这一段的直线距离也有四十公里。美军首先用卡车、拖拉机等前面挂有巨大铁铲的机车，把战火烧过的保险柜、公共汽车、钢筋混凝土块等轻轻地铲起，从一处搬到另一处，机车过后便是一片平地……操纵手嘴里叼着香烟，哼着

小曲。一台机车不到一天功夫清理出来的场地，相当于神奈川县动员一千个劳动力，干三天才清理出的废墟。

不止是这种土木建筑机械、铺设输油管道等，而且还有盘尼西林，滴滴涕等药物也由美军带进了日本，使日本人初次了解了这些东西的妙用。

美军发放的、到处都是的巧克力、槟榔膏、干奶酪、黄油等食品也使日本人感到稀罕。战前在农村没有吃过这类食品的人是极普遍的，即使在城市里，战争时期也是吃不着的。青年以上的人都赞叹这些食品比从前日本生产的好吃。少年和幼儿则是初次尝到，惊叹不已。

在漫长的战争岁月里，日本不仅一点儿也不能吸收世界文明的发达，而且与这种文明隔绝了，连这种文明的发展情况都不知道。对于绝大多数日本人来说，战后，美军带来的所有物质文明，都使他们只有一味惊异，把战后的日本人与幕末至明治初期刚开始接受西方文明的日本人等同起来也不为过。

与此同时，善于思考问题的人们都痛感大大落后了的日本与相当先进的美国文明之间的差距，不能不激起一种要赶超美国的热情和使命感，把效仿美国物质文明做为重建日本的途径，从而迅速形成日本的总体规划。

当然，美国直至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在旧金山签订对日和平条约以前所给予日本的经济援助，也是促使日本美国化的巨大能源，这是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其中以占领初期美国向处于饥饿状态的日本人提供粮食援助为最。当时的币原喜重郎内阁对解决粮食问题一筹莫展，向总司令部提出援助四百五十万吨粮食的恳求，那是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六日的事。

随后，一九四六年二月，美国方面总司令部的公共卫生部

长詹姆斯说：“在日本贫弱的国土上要养活现有的七千二百万人口，靠日本生产的粮食是不够的。”负责世界粮食状况调查的夫巴特使也说：“进口粮食是重建日本的前提。”于是批准了一九四六年一至三月间向日本提供十一万吨，四至六月提供十五万吨小麦和其他粮食。由于有这些粮食才使日本得以确保最低生存的需要。

这些粮食援助，当时是用美国的占领地区救济拨款做为财源支付的，后来日本全部予以偿还。尽管这样，这一援助也使日本产生了亲美感。这是不容置疑的。正因为有上述原委，无论日本政府、官方、财界、舆论界的头目，还是一般国民，都把总司令部的占领政策看做是至高无上的命令，没有抵抗和反对，只有服从。

尽管如此，当时战败的日本，正如九月十二日麦克阿瑟在接见美国记者团时所说的那样“由于这次战争，日本已降为四等国”。的确，当时日本是陷于“四等国”的状态。

第三章 黑市的喧嚣与混乱

（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八年）

在废墟上兴起的黑市群

战败后不久，“黑市”便成为蒙受了战争灾难的大都市的闹市。黑市呈现出异样的喧嚣与混乱——的确使“战后的产物”达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

例如，一九四五年八月末在东京新桥的废墟上出现的黑市，立刻招徕了拥挤的人群。当我走进这人群时，立即有几个怪模怪样的男子围上来：“你那件西服（当时我正穿在身上）我买下了，你要多少钱？”一眼便可以看出这些人是落魄的军人，身上穿着沾满污垢的士兵服或军官服，脚上穿着航空兵专用的半高筒皮靴。我正这么打量着他们，突然，一个人冒冒失失地说了声：“先生，你看这个很便宜吧？”说着便将一块手表举到我眼前。这肯定是走私物品，不然的话就是偷窃来的赃物。这种交易方式被称为“流动黑市”。

在上野被盗的自行车，两小时以后重新完好地涂上一层油漆在新桥的黑市上出现了。当受害者发现这辆车时，遂铸成一场骚乱。这种现象在日本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呢？无论战前还是战争期间都没有，的的确确就是从战败以后开始出现的。

当时国家虽已陷入虚脱状态，但国民还必须一天天地活下去，而客观现实是处于穷困潦倒的境地。八月十五日这一天，在历史上它是划分战前与战后的一条界限，但在实际生活中，战前与战后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战后生活是战时生活的继续，其困苦程度没有丝毫改变。

毋宁说，以八月十五日为界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是人们的生存方式——社会道德、经济、伦理或生活规范。因为曾经支配这些观念的权威、权力、制度、法律等，由于战败而在瞬间彻底崩溃了。赖以维护的传统、道德、伦理、规范也随之化为乌有。

失去了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加之欲摆脱现实的穷困，人们便开始不择手段了。不管干什么，只要能使自己快活就行——这种生活哲学普遍化，是战后初期的一个特征，这种特征的显著标志便是黑市贸易。

黑市几乎都是在蒙受战灾的都市里发生、发展的。

在东京——从尾张町至新桥，在道路的南北两侧挤满了黑市商的摊床，大约有七十五家摆摊的商贩。贩卖的物品不下三百余种，其中有的小摊上甚至只有两件半旧的小孩衣服出售。仅有那么点儿东西就能拿到银座八丁目去卖，社会贫困的惨相可想而知。

既有在席子上堆满萝卜白菜的店铺，也有把干青花鱼、干鳕鱼、干松鱼摆成一排出售的小店，甚至还有违反经济统治法的规定出售饭团和蒸山芋的店铺。尤其在卖食品的摊床前面，人们象饥饿的蚂蚁一样，拥挤在那里贪婪地围观着。出售烟袋、卷烟纸、打火机、香烟、食品器皿、电灯泡、电热器、木工工具等物品的店铺也不少。

东京黑市商人的摊床在战败后的半年里急剧增加。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据警视厅的调查，在指定地方摆摊的有二百三十四个点，共计七万六千余人。当时所说的“黑市商店已经超过百货公司”这句话决不是戏言。

我也是曾经在这种黑市上徘徊过的人之一。复员后返回早稻田大学就读的我，一到中午就靠两条腿从神田赶到银座的黑市，买一盘每盘二十日元的蒸山芋（只有七、八块切好的热山芋）代替午餐。这对我来说，已是一顿相当奢侈的午餐了。

物价扶摇直上

在黑市上出售的东西全都比国家牌价高。说起这件事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那是一个犯过十二次案的男子的故事。他于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二日早晨被从监狱里释放出来时，警方给了他够吃五天的饭团和九十五日元的现金。监狱对刑满释放者不仅给一定数量的现金，而且给一定数量的饭团，这也是当时粮食困难时期的特殊规定。九十五日元这个数目在战争期间，相当于大学刚毕业的职员一个月的工资。

他为了回到家乡德岛而来到东京火车站，因车票已经售完，他必须等到十五日那天才能乘车。他无事可做便闲逛来到了黑市，看到很久没有吃到的蜜桔，买了三个花去十日元。一把花生米售价十日元。往带有棚布的地摊儿探头一瞧，一个高脚酒杯二十五日元，一碗蒟蒻^①五十日元，他的口袋里已经花得分文不剩了。他暗自思忖：“看来，在这狱外世界是活不下去的。”于是，他来到银座一丁目，钻进一家用木板临时搭成的小饭馆

^① 蒟蒻 ——用豆腐、芋头等混合制成的日本菜。——译者

里，明知口袋里无钱，却故意吃了七十日元的饭菜，结果被扭送到东京警察署。在拘留所里他宛如梦见了故乡。展现在他眼前的是古巢监狱。

这一幕哭笑不得的悲剧反映了当时通货膨胀的阴暗面。为了帮助了解当时物价之高昂，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的工资情况。据《朝日年鉴》（一九四七年版）刊载：一九四五年十月东京横滨地区的十九个工厂的职工平均月收入为男工六百一十六日元三角八分，女工二百六十八日元五角；男办事员七百零三日元三角八分，女办事员三百三十一日元一角四分。

相比之下，“黑市价格”高于官定价格数十倍，简直象在捉弄低薪的职员一样。

以稻米的黑市价格与官定价格之比为例来看，战时的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月是二十三点五倍，到战后一九四五年十月实际已上升到一百三十二倍。关于主要消费资料的黑市价格，日本银行调查东京零售物价指数的结果表明——如果以一九三三年为一的话，一九四五年八月停战时为四百三十一.三，至十二月又翻一番达到八百二十七.一，到一九四六年五月，又翻一番达到一千六百二十四.九。完全达到漫无边际、扶摇直上的涨价趋势。

具体地看，食品方面，稻米一升（约一点四公斤）达到一百二十日元，土豆一贯匄 五十五日元，对于平均月收入五百至六百日元的工资收入者来说实在是太昂贵了。

贯为日本的重量单位（=3.75 公斤），匄为贯的千分之一（=3.75克）。这里的贯匄即贯。 ——译者

谋财害命的黑市商品

黑市商大部分由失业者转化而来。据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五日厚生大臣芦田均在贵族院所作施政报告称：失业者人数由第一次复员的军人三百九十六万，加上工厂离职的四百一十三万，共计八百零九万，再加上第二次复员的军人五百一十五万，达到一千三百二十四万人——这个数字是一九三〇、三一年的经济危机时代失业人数的四点六倍。

黑市商在市场上出售的各种物品都是由大小经纪人（掮客）通过各种途径，偷偷运来的。这些东西的来源是农村、旧军需工厂、旧陆海军、美军、还有走私贩子。

一些被称为“偷运贩子”的成年男女和不务正业的小伙子到农村地区去采购，背着塞得满满的帆布背包，象蚂蚁搬家一样，接连不断地把稻米、山芋、鸡蛋等食物偷运进黑市。纤维品、鞋子、砂糖、酒、面包干儿及其他许多物品都是从旧陆海军的“后门儿”流出来的物资。陆海军在战争期间以“军需品”的名目，强行优先征购的这些物资，由军人、御用商人、军需公司的部分有关人员等，在战败的慌乱之际，草率地进行处理，结果，这些东西都流进了黑市。

军队的物资在战败时是怎样胡乱地处理的呢？这方面的实例不胜枚举。仅在东京都内，军队价拨的卡车就有一千三百辆，轿车一百辆，这些几乎全都是军队的“暗盘”物资。

同时，在黑市及其周围地区，私制和官制的注册外烟酒也泛滥起来。政府配给的烟草在一九四五年是每日每人三支，到了一九四六年每日配给四支。从那年一月十三日开始上市的，每盒七日元的“和平牌”香烟，和二月二十四日开始上市的，

每盒十日元的“日冕牌”香烟，只有在星期天或每逢“祭日”的时候才出售。要想买到这种香烟就必须去排那长长的队伍——由此可见当时的物质贫乏状态。所以倒卖注册外香烟就成了当时的一种商业活动。正如源氏鸡太在他早期的作品《烟草姑娘》中所描写的那样，从事这种烟草生意的大部分是女性。

她们站在车站的检票口或热闹场所的出入口，把用黑市价格买来的“和平”、“日冕”牌香烟再以每盒高出原价两日元的价格出售，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她们当中也有人出售冒牌假货，那是一些用金银花、虎杖树叶子等做原料，靠手工卷制而成的“和平牌”或“日冕牌”假香烟。

这些黑市的香烟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由警视厅一下子全部取缔没收，总计官制的达十三万五千七百九十四条，私制的达九万二千八百一十三条。

私造的酒大都是用酒糟掺酒精制成的劣质酒。私造这种酒的人集中于大田区的羽田町一至二丁目，还有东六乡四丁目一带。蒲田警察署和大森、品川税务署的署员三百人，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日早晨曾搞了一次突然袭击的大搜查。结果没收了未经过滤的浊酒十六石七斗，劣质酒九斗八升，还有其他不合格的酒八斗。另外，还有蒸馏器九台、过滤器三台。对其中的二十四名情节严重者提出刑事诉讼。

在这次搜查中，有的老太婆死死地抱住用来盛米的汽油桶，号啕大哭；有的中年妇女踢碎盛酒的坛子，毁掉证据，一时间闹得天翻地复。这种私制酒填满了地下酒馆和黑市商的腰包。

其中也有人出售威胁生命的酒，那是用乙醇（酒精）和浊酒加水调合而成的，只是用水稀释了以后就拿来出售的便宜货，威士忌就是这种酒。经常饮入乙醇就会导致失明或死亡。当时

名叫鬼俊英的歌手和山田五十铃的丈夫、电影演员月田一郎，都是被这种酒里的乙醇夺去了性命的。

靠帮会资金起家的“老爷”们

云集于黑市的商贩们受到一种帮会组织的管辖。这种由地痞流氓组成的组织叫做“帮”，其首领被称为“老爷”。黑市商贩必须向“帮”缴纳会费和收入的一部分，否则就甭想在黑市上开张。“帮”以其首领的姓氏命名，分布情况是：在新宿有尾津帮、在浅草有芝田帮、在池袋有关口帮、在银座有上田帮、在新桥有松田帮。东京市有八个“老爷”，他们独霸了闹市地区的黑市。戴着黑色太阳镜、身着夏威夷衫的阿兄们不断地到黑市上游来荡去。他们与流氓阿飞斗殴，以及对市民们发雷霆之怒的情景令人心惊肉跳。一些与黑市有瓜葛的中国、朝鲜等第三国人与他们的冲突也频繁发生。

一九四八年四月四日，在滨松市繁华街上，小野帮的五十余人与四十余名朝鲜人发生了激烈的枪战，死亡二人，重伤五人。五日夜間，本县和邻县的地痞流氓与小野帮会合，共百余人，蜂拥闯入朝鲜人经营的滨松市国际商场，大打出手。造成一人死亡、四人重伤、十几人轻伤。原因是国际商场定于四日举行舞会，届时，已订有合同的乐队指挥突然不见了。朝鲜人认为是小野帮从中作梗，所以特来找碴儿打架。

在这之前，一九四六年夏季，新桥有个绰号“河童^①之松”的首领统率其关东松田帮与第三国人为争夺权益进行了交战。

“河童之松”——松田义一，战败前夕从中国撤退回国，战败

河童——日本传说中的一种想象动物，水陆两栖，类似幼儿形。——译者

后一边与饭田一家以及并木兄弟争斗，一边招揽了战灾难民、失业者、复员军人二千余人，盗用第五代松坂屋的名义，发展成为新桥的第一号头面人物和黑市商贩的总管。当新桥商场正在兴建中，一九四六年六月十日夜，松田因品行不轨在新桥的办公室里，被已经脱离他的小兄弟N用手枪连射三枪，第二枪击中心脏，当场毙命。

在他死后七天的十六日，其妻芳子受千余名小兄弟和关八州首领的推举，承袭夫业，支撑起第六代松坂屋。当天下午，当身着全套西装的芳子由数名小兄弟前拥后簇来到新桥黑市巡视时，一个受过文身、刺有般若^①形象的地痞流氓，立即迎上来打躬作揖，口中说道：“请多关照。”——这样的报道与照片，在六月十七日《朝日新闻》的社会版里刊登出来，不能不说当时这群无赖的淫威是可怖的。

般若 —— 日本神话故事中面目狰狞的女鬼。——译者

第四章 饥馑的人们为 生存而苦斗

(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六年)

为活命而过“竹笋生活”

占领军总司令部在推行“革命”的民主化的进程中，国民的穷困生活没有任何改善。

东京都的生活顾问处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五日前后，在新桥、新宿、浅草等地的车站、街头，或者工厂、住宅对二十三家工厂的一百八十一名男工进行了调查，搞出一份调查报告。

据该报告称，由于工厂解体、人员裁减，终战时辞退的员工的退职金，由最低一百日元至最高五千日元不等。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一百一十一名退职员工，在两个月内花掉了退职金的一半，全部花光的有二十三人。离职后在两个月内另谋职业者只占百分之十，约二十二名，其余一百五十九名仍处于失业状态。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日，币原内阁为制定新物价政策，估算大都市普通工人的标准工资最低需五百日元左右，其估算的依据是：

饮食费总共二百三十七日元一角

主食费一百日元零五分

副食费一百一十七日元

调味品二十日元五分

住房费五十二日元六角五分

被服费三十五日元

采光、取暖费三十一日元五角八分

杂费一百六十九日元六角九分

总额五百二十六日元二分

如此看来，若以每月五百日元为基准，还有二十六日元赤字。家庭收入的一半用于伙食费。由于购买高价的黑市粮食而出现赤字，恩格尔系数^①膨胀。

据《每日年鉴》（1946年版）报道：某检字工九口之家，有四人参加工作，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的总收入为四百三十八日元，而总支出却是一千一百零四日元；东京都国民学校（小学校）教职员收入平均为二百四十二日元，支出却为八百四十四日元，家家都因购买高价粮而有亏空。

许多家庭为了弥补家计的赤字，逐渐将随身穿戴的衣物变卖，把可以换取粮食的东西都派了这个用场，当时称之为“以物易物”。城市人为了得到粮食而把穿的衣服一层一层地脱下来变卖的情形，犹如被层层剥皮的竹笋，这就是所谓“竹笋生活”一词的来由。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陷入这种难以解脱的困境之中。

死于营养失调的审判官的日记

当时，在六大都市每人每天的主食配给量为二合一勺（约

^①恩格尔系数：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1821—1896）发现家庭经济调查规律为，生活水平越低，粮食费的开支比率越大。——译者

合三百一十克)——面粉、甘薯、大豆等统统计算在内。所谓粮食，不过是草草地去了皮的发黑的霉米。仅仅靠那一点少得可怜的配给粮是难以活命的。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朝日新闻》报道了某银行职员神户朝太郎一家的生活情况——

这是一个八口之家。长子在大学读书(二十六岁)，次子是复员军人、学生(二十五岁)，三子读高二(二十岁)，四子读高一(十八岁)，长女是中学生，幼女是小学生。由于饭量大的男子汉居多，神户家简直是天天在打“粮食战争”。两个女孩子有中、小学生的追加配给米，比上头几个哥哥的配给量还多些，每天三百六十克。其余六个大人不分年龄，一律每天三百克。全家合计每天配给二千五百二十克。但是仅靠这些，八口人注定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两小碗饭。

因而，神户家每天早晨把甘薯和米混在一起煮烂充作早餐，并要留出一部分盛入五个饭盒，给上学和上班的人带走，留在家里的人只能以不足两公斤的甘薯充当午饭。晚上只好把约七百克米与甘薯一起煮，每人分得一小碗，充当晚餐。即使这样，靠配给的食品也还是维持不下去，每周不得不去黑市买上三、四十公斤的甘薯补充进去。

这个时期，“营养失调”这个词儿简直就意味着饥饿。一开始还觉得这个名词刺耳、难听，这到底是什么病啊？可是渐渐地，国民们的辘辘饥肠使他们本能地理解了这个词儿的含意。

东京帝国大学附属医院院长柿沼昊作博士发表过这样的讲话：

“在整个战争期间，在大陆第一线的部队当中开始流行一种奇怪的病——持续腹泻、身体消瘦、发烧。当时按照痢疾、疟疾、结核病来治疗，但实际上是营养失调症。第一次世界大

战时，在德国流行的所谓战争浮肿，也是营养失调的一种类型。

在日本还有一种叫做萎缩症的疾病。先是体重下降，脉搏变得缓慢，易疲劳、贫血、面部和下肢浮肿。意识虽然清楚，但总是嗜睡不醒地慵懒。由于身体抵抗力极度衰弱，稍一激动就死掉了，这是因为从食物中摄取的热量不足的缘故。食物不仅要有足够的量，而且需要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等，按一定的比例搭配，尤其是缺乏含有氨基酸的蛋白质时容易引起失调。象最近这样十天配给甘薯，十天配给豆类，必然会越来越加剧营养失调。”

一九四七年秋，有一个审判官，因耻于违背经济法规，不屑购买黑市食品，硬是靠配给的粮食糊口而终于饿死。他就是东京地方法院刑事部的山口良忠，有妻子和两个孩子，每月收入三千日元，但这个数目并不能使生活宽裕。当时有很多审判官转业去当律师，为的是多赚一些钱。而山口却坚定不移地干自己的本行。可是，孩子们饿得叫苦连天，夫人实在看不下去，准备拿些衣服物品变卖，换点儿黑市粮食充饥。山口却执拗不允，他说：“身为裁定别人的审判官，怎么能去买黑市商品，我们只能靠工资维持生活。”于是把配给食品几乎全都给两个孩子吃了，夫妻俩每天只是喝些稀薄的汤汁填肚。岳父和朋友曾经从乡下弄来粮食接济，但都被山口拒绝了。激增的成百的违反经济法规案件，山口一个人埋头审理。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已经陷入极度营养失调。八月的一天，山口终于昏倒在工作岗位上。原来，已经患了浸润性肺结核。十月十一日死亡。山口于病榻上写下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粮食统制法并非良法，但是它做为成文法每个国民都应该绝对服从，自己宁愿饿死也不能违反法规购买黑市商品。平

素我非常钦佩苏格拉底那种明知是孬法仍竭诚服膺的精神。今天日本这个法制国的国民尤其需要这种精神。因而，我毅然决然向黑市挑战，直至饿死。自己每天的生活就是走向死神的行动。”

当时的内阁是社会党的片山哲内阁。十一月六日报纸刊载了《朝日新闻》记者与内阁经济稳定本部长官和田博雄的对话：

“当提到山口之死时，和田长官‘嗯，嗯’地应着，他坐在椅子上将头深深地埋下，闭着眼睛，刚刚挤出一句“我感到非常痛心……”就哽咽住了。记者接着问‘在那种情况下，他如果购买点儿黑市食品就不至于饿死……也许他的行动是正确的？’对于这个问题和田也不回答。‘那么，即使他想买黑市粮食，靠那一千八百日元（当时官厅职员基本薪金的水准）恐怕也难以如愿吧。’和田长官终于抬起头来答道：‘遗憾得很，我实在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个人是有看法的，但现在无论我说什么，都会在政治上产生重大影响，请体谅我的苦衷……。’”

抢购风潮

大多数人都想通过抢购粮食渡过难关。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三日《朝日新闻》出现了“帆布背包——生命之纲”这样的标题，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状况。采购与黑市活动已成为战后社会风貌的剪影。文章中写道：“节假日也不得安宁，东京都各火车站前呈现出更加急切的抢购风潮。人们磨肩擦踵，纷至沓来，帆布背包和大小包袱随着人流卷入旋涡。十二日中午过后在上野车站站内的派出所，有一位五十多岁、看上去老实巴交的人前来自示了某火灾保险公司横滨支店长的名片之后说，他从秋田县买到一斗二升米，在火车上一位身穿制服、自称是司机的人，

借口整理车内行李，说他的包袱超重，于是拿走了六升米在大宫车站下车了。派出所的年轻的巡警解释说：虽然你的粮食被拿走一半，但是你能买到一斗二升米，也算是个幸运者了。象我们这样的警署都没有一点点配给。但不会为了弄到点粮食，捞点外快而不择手段随便没收你的东西。……”

政府对一般民众的采购活动是比较宽容的，但对职业黑市商人却毫不留情地采取激烈的打击措施。不妨介绍一下当时的一个场面：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日上午六时二十分，松户警察署的三十名武装警察与国营铁路、上野管理部的有关人员二十名突然包围了呼啸着驶进松户车站的列车，车厢内的职业黑市商们企图把包袱从窗口丢到月台对面的线路上，然后跳车逃走，但警官们掌握了窍门，机智巧妙地抓住了投机商和他们的私货，行动干脆利落，只用了二十三分钟。违反粮食管理规定的有七百余件。没收的和弃置车内的米有五百余草袋，墨斗鱼、干鱿鱼超过六百贯。这种场面在当时是屡见不鲜的。

交通事故招致的悲剧

为了抢购，挤乘列车是相当辛苦的事。无论国营铁路还是私营铁路，战时都遭受了空袭，尤其因运送军需物资长期超载不得维修，铁轨、车辆、设施都呈现出严重损坏和老朽状态，运输能力极低。至战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才开始修订国营铁路的火车时刻表，比战时的运输能力约提高百分之二十六，刚刚达到战前客运能力最高年份（一九四二年）的百分之七十六。即使这样，至十二月，迫于煤炭运输的急需和铁路设施的力不能支，不得不大大削减了客运量的三成和货运量的五成。

人们为了乘车，只好在发车前几小时就拥挤在剪票口排起长龙。在这里连出售排队位置的“卖座”商也恬不知耻地应运而生。车厢里被人群和采购来的大小物件挤得水泄不通，整个通道里挤满了人自不待言，连行李架上，座位下面也无隙可乘。沿途每到一个车站，几乎都有黑市商为了挤入已经饱和的车厢而打碎窗子的玻璃。用运输省旅客课长川村的话说，旅客已经处于“暴动状态”。

交通事故造成的悲剧不计其数。一九四六年即将结束的十二月九日清晨，高崎至上野的列车刚一驶进大宫车站，从第四节车厢中部传来一声惊叫：“伤人了！”乘务员和乘客协力把受伤者从超员的列车里拽出来送进医院，不久便死了。死者是尾久车站值勤的铁路员工高桥德次郎，估计是应工会青年部的要求到车厢里检查东西，在人群的挤压下丧命。

在终战当年十二月十九日都内山手线上，住在品川区的家妇由纪子在下午一时半左右，领着一岁多的长子，背着未满月的婴儿乘电车由新桥去目黑，途中发觉婴儿的样子异常，遂下车到五反田的田谷医院就诊，可是孩子已抢救不过来了。原因是车上拥挤，伏在背上的孩子鼻口受到挤压，窒息而死。东京地方检察厅认为“如果注意的话不至于死”，遂以涉嫌过失致死罪审理。

背着刚刚出生二十九天的婴儿去挤车那是很危险的，由纪子并非不知道。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由纪子夫妻由于住宅紧张只好在丈夫的哥哥家栖身，可是丈夫患了浸润性肺结核，哥哥家的住处也很狭窄，加之粮食困难，更有诸多不便，只好想法子搬出来。为了寻找安身之地，由纪子拖儿带女去找在新桥工作的父亲，然而，非但没有见到父亲，却在她扫兴而归的途

中遭到了如此不幸。

在“临建”与“防空洞”中生活的日日夜夜

不言而喻，从下面这个小小的真实的例证中便可以反映出，由战争造成的“居住难”达到了何种程度。你想知道一般民众因住房难，忍受着多大苦痛吗？——当时著名的“裸体画家”山下清就在战火烧过的公共厕所上，用朽木和焚烧过的马口铁搭个棚子供一家人栖身。由此可见一斑了。

严重的住房难与粮食奇缺这双重灾星已构成重大的政治问题。一九四五年，币原内阁为了使遭受战争灾难的地区复兴住宅建设，重新设置了复兴院，起用财界的小林一三为复兴院长官、国务大臣。

复兴院的事务当局拟定了一项计划——“为安排全国战灾难民需房二百万间，安排复员军人需二十万间，毁于风灾、水灾的住房五万间，需改建、修缮的住房五十万间，加上其他方面总计必须建筑三百二十五万间住宅，但迫在眉睫的是拟定越冬对策，必须首先解决四十二万间住房，让那些抛身露天的人住进去。”为此，拟定建造每间面积大约七平米的“简易住宅”三十万间。可是至十一月底，全国盖出的“临建”只有一万间。

结果，不得不依靠民众自己建造住宅。可是由于建筑材料价格暴涨，民众要想靠个人力量建造房屋谈何容易。在东京的板桥区有三十二家一百一十一人挤在十三间房里居住。在一块“塔塔密”上必须住两个人，有的地方甚至在四块半“塔塔密”上住老少六口。乃至发生了一个熟睡的孩子翻身时，胳膊堵住了身边婴儿的口鼻，致使婴儿闷死的悲剧。房租之高，达到十六平方米的住房每月二百日元。

我家的居住状况也相当可怜。买下了一间不足十六平米的房屋——因战时疏散已损坏——经过整修，那弹丸之地便成了五口之家的栖身之所。对于父亲那菲薄的收入来说，有这么一块安身的地方已经相当了不起了。一下雨屋里就到处漏水，到处都摆着用来接水的锅碗瓢盆，简直无插足之隙。连一块能铺上被子睡觉的地方也没有，把人晒得恨不得让墙壁倒下来当床用。即使这样，我家的处境可能还算是得天独厚呢。因为必须在“临建”或“防空洞”里苦渡日日夜夜的可怜的人们多得很。所谓“防空洞”只不过是战争期间在院子里挖的壕沟，充其量不过三、四平米；所谓“临建”就是在空袭过的废墟上，用战火烧过的马口铁草草搭起来的小棚子。

据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警视厅的都内调查表明，在防空洞里住着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一户，在临建里住着二万六千三百二十八户，其中有一千四百四十六户至一千四百九十二户严重漏雨，人们处于没有“塔塔密”席子，没有生活用具，没有铺盖的悲惨境地。

农村的资产阶级

与遭受空袭的都市相比，农村地区显得分外优越。这里没有蒙受战灾的难民，并且由于黑市价格猛涨，把米、麦、山芋之类的主食，萝卜、胡萝卜之类的蔬菜运到城市，在集市的边缘可以躲过市场掮客的盘剥，很快能以高价卖出。昔日家中只有一反步^①土地的小农都是些“穷光蛋”，而这时靠这一反步土地却垂手可得城里职员两年的收入。

农民向国家交售农产品的热情显著减退。当然，国家收购

^①一反步：日本的土地单位，大约相当于1.5市亩。——译者

的价格低廉，配给农村的必需物资不足也是缘由之一，但更主要的还是黑市高昂的价格吸引着农民。一九四五年，国家计划征购粮食二千六百万石，但到一九四六年一月末，农民只不过完成交售任务的百分之四十一。为此，币原内阁于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七日公布了强行征购的“粮食紧急措施令”。可是，即使靠“强行征购”，购到的粮食也未见显著增长。

农民从黑市上究竟得到多大实惠呢？当时有这样的传闻。高知县山崎町的N家娶了朝仓的农家女S。S出嫁时的嫁妆公开展示了两天：五屉柜里装满了纯白色的绸缎、丝绢，新娘的礼服，金丝织花锦缎的腰带、西服，崭新的衣物等，还有镜台、缝纫机等，价值约一百几十万日元。大开眼界的观众都惊叹，“到底不愧是农家女！”新房的三面墙壁上，不是用红白相间的横条纹洋布做墙帷，而是用一百日元一张的钞票密密麻麻裱糊起来的，总金额达四万一千日元。瞧热闹的人不禁惊得目瞪口呆。当时平均工资大约是一千八百日元，所以相当于一个职工两年的收入。

这样的农民暴发户成了饥饿的城里人的眼中钉。

“新日元”和“冻结”的叹息

与粮食、物资的贫乏成反比例，物价却扶摇直上。

试看当时日币的发行量，战争时期——一九四五年一月为一百六十五亿日元，但到终战的八月份达到三百零二亿日元，至一九四六年二月竟突破六百亿日元。

无疑这是由于战争一结束，政府必须还清拖欠军需生产单位的债务；各军需生产单位之间要进行决算；各公司对大量解雇的职工需要付给退职金；政府对复员军人要支付退伍费用，

如此等等，使货币的发行量一下子漫无边际了，整个日本被卷入通货膨胀的旋涡之中。

币原内阁终于果断地实施了通货膨胀对策。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七日，宣告依靠政权强制执行“金融紧急措施令”和“日本银行预入令”。这一系列措施首先是，“从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七日开始，个人或团体在金融机关的所有存款、储金、信托及其他款项一律冻结。”

其次是，“现在流通的纸币至三月六日一律作废，三月七日开始发行新钞票”。为此，把当时流通的日币称为“旧日元”，新发行的称为“新日元”。

第三是，“工资发放数目在五百新日元以内，其余部分做为存款冻结。”

“新日元”并没有给广大民众的生活带来什么好处。三月三十日《朝日新闻》登出大藏省物价部长工藤昭四郎的答记者问

问：“在现行物价政策下，生活还过得去吧？”

答：“五百日元生活是以大都市四口之家为基准，考虑到米价和生活必需品，以此为标准生活水平进行估算的，这个生活标准只相当于一九三七年八十日元的生活费的水平。”

问：“实际上还是苦了薪金收入者，因为在温泉疗养地和饭馆，仍然有每人一餐耗资一千五百日元的阔佬。”

答：“非法谋利的人还是有的。最近新设的物价厅施展其权威，与农林、工商、内务、司法等部门配合，正在取缔非法经济活动。”

问：“一合^①牛奶售价一日元，婴儿每日需喂五合牛奶，这

^① 合：日本的容积单位，每合约0.18公升。——译者

样每月仅牛奶费一项就需要一百五十日元，那么五百日元的生活费怎么能过得去呢？”

答：“如果逐个举例来看，穷得可怜的人多得很。昨天就有一个妇人向大藏大臣涩泽敬三述说自己由于拿不出新日元来，眼睁睁地看着患病的儿子死去。困难实在不少。”

问：“火车、电车的票价还要提高，这不是矛盾吗？”

答：“其他物价已经涨到一九三七年的八至十倍，票价涨到五倍也是自然的了。”

问：“现在五百日元生活费与一九三七年的八十日元相比，再加上物价飞涨的因素，实际上不是相当苦了吗？”

答：“工资只增长六倍而物价涨了十倍，当然生活是相当苦的。”

降为“四等国”的产业界

支撑社会、经济的基础产业——尤其电力、煤炭等能源产业和当时唯一的运输手段铁路都处于危机状态。据商工省的调查，当时的电力状况是，平均每日的发电量不超过终战时的三千零九十万瓩，至一九四六年八月，虽然恢复了一倍以上，达到七千八百万瓩，但这个数字只是一九四四年的百分之八十。

可是需求的供电量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为九亿二千七百万瓩，至一九四六年六月增加一倍，急剧膨胀到十七亿七千七百万瓩。加之水源干涸，水力发电能力下降；煤炭不足，火力发电能力显著降低，从十二月二十二日起工厂、家庭一律从上午七时至下午七时停电，供电能力陷入最严重的状态。白天根本不能收听广播，晚七时以后，出其不意的停电也是常有的。蜡烛成了每个家庭不可缺少的日用品，工厂、影院也都有了固定

的休假日——停电日。

电力供应的紧张状况至一九四七年岁末仍不见好转。大映电影制片厂的东京摄影棚只能在每天八时至下午四时拍片。松竹电影公司的大船摄影棚有时正在拍片子，突然停电，胶卷脱落下来，台词的录音与演员的口形动作脱节。导演们只好依靠不用加灯光的外景来应付，否则就一筹莫展。

煤炭的情况也糟透了。战后一年采掘的煤炭只是太平洋战争期间平均年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七。好歹到一九四六年一月，月产接近二百万吨，可是当时的需求量是二百万吨至二百五十万吨，还是供不应求。造成煤炭荒的原因是粮食困难，劳动力不足和劳动力水平下降；公司方面的开采热情锐减，加之战争中滥采乱掘，坑井荒废，运输力削弱。

煤炭荒的影响波及面意外地广。东大附属医院由于没有煤炭，把老朽的木结构建筑物全部拆了用来做燃料，可是即使如此还不能保证给住院患者烧熟饭菜。顺天堂医院由于没有燃料，手术用具无法消毒，大致三十个需要动手术的患者中只有二、三人能实施手术。

铁路运输也未能幸免危机的“光顾”。战争使一千六百公里长的铁路，四十五座桥梁，两万二千辆客车，九千五百辆货车，以及车站、工厂、发电站等毁掉。而且，在整个战争期间铁路承担了力所不能及的运输任务，使整个运输系统完全老朽化了。从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二十四日的一个月里，国铁对轨道、地基、枕木进行了检查。标明“特别注意”字样的地方，在东海道线上有两处，山阳线上有两处，鹿儿岛线一处，常盘线一处；标明“注意”字样的地方，按照每百公里计算，东海道线十五，常盘线十五点六，函馆线六点六七。山阳

线十六点六，鹿儿岛线二十五点四，东北本线十六点九。但是，这些需要修复的危险点，苦于资材缺乏，根本无法动工。

因此，交通事故频繁出现。在诸多事故中，最大的要算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八高线列车脱轨事件了。出去抢购物资的乘客、通勤者等死伤一千多人，酿成史无前例的大惨案。正如麦克阿瑟说的，日本已降为惨淡的“四等国”了。

第五章 社会状态产生犯罪的逻辑

(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六年)

饥饿夺去人的生命

正因为是穷困与混乱的年代，犯罪率格外地高，犯罪的性质与手段都达到战前、战时所不可想象的程度。以一九四六年上半年东京都的犯罪事实为例，其中最多的是扒窃财物，其次是偷盗自行车。再次是毁坏、糟蹋农田或果园。“毁坏农田罪”，这是过去闻所未闻的罪名，但在当时却上升为第三位。这是由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造成的。一九四六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令人痛心的事。

在丰岛区的某田园里，一个男人偷偷地钻进来，迅速挖出了约七点五公斤的山芋，装进帆布背包。当他刚要慌忙离去时，被保甲组安排看青的 M 发现。来人用随身携带的三尺长的铁棒向 M 头上一击，把他打翻在地，又往嘴里塞了几把泥土，正要仓惶逃走，被保甲组的人们抓住，扭送警署。原来这个男人竟是板桥青年学校的教师。

他由私立中学毕业后入东京丸之内的某商社工作，成为模范职员，商社出资供其读完长崎高等商科学校，尔后十二年一直在该商社的纽约分店工作，是一位勤勤恳恳的好职员。但是，战后生意萧条，门可罗雀。商社解散后虽然得到相当可观的退职

金，还有因房屋被空袭毁掉而得到的三千日元保险金，怎奈一家八张嘴巴为了活命不得不吃黑市食品，这笔钱瞬间就吃光了。

不久，他谋到了青年学校教员的职位，月薪七百日元。长子在兜町的公司里工作，每月可得三百日元。妻子在池袋的黑市上摆个露天小摊儿，赚几个可怜的小钱儿。尽管如此，一家八口还是拥挤在一间约十二平米的公寓里过着穷困的生活。这位颇有身份的老教师在警署的审讯室里一边呜咽，一边沉痛地述说：

“最近，我甚至忍不住捡别人丢在路边的烟头吸几口，完全堕落成一下贱人了。”

从这件事可以反映出当时的犯罪大多数是迫于饥饿。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夜，在涩谷区千駄谷的私宅里，著名歌舞伎^①演员片冈仁左卫门与其夫人、孩子、奶娘还有一个十二岁的看孩子的人，被人用劈柴胡乱地打死，其状之惨目不忍睹。这桩悲剧也与粮食困难有关。

发现这一惨案的是次日早晨来串门儿的仁左卫门夫人的母亲——长呗^②乐师吉田一五郎的妻子。她见五口人都死了，唯独与他们同居的饭田利明不见了，认为饭田是嫌疑犯便报告了警视厅，指名捉拿饭田。

饭田是一位拉场戏作者。二十日，他潜逃至宫城县玉造郡的温泉旅馆时被抓获归案。令人吃惊的是，被害人中那个十二岁的看孩子的女孩儿，竟然是他的亲妹妹。他借以藏身的那个温泉旅馆是他妹妹的学校在战争时期的疏散地。当然这反映了

① 日本的一种旧剧种。——译者

② 配合三弦、笛子等演唱的一种歌曲，常与“歌舞伎”舞蹈等配合演出。
——译者

饭田其人的特异性格，但他在坦白时这样说：

“前天晚上为索取妹妹的一万五千日元财产，受到仁左卫门夫妇的责难，不由我怒火中烧。我认为妹妹在他家光让看孩子，不让上学，光给妹妹吃配给的混合面，不给吃米饭，为此怀恨在心，一怒之下……”

恶魔 小平义雄和樋口芳男

当时采购成风和就业难的社会状况给一些禀性特异的人以可乘之机。小平义雄事件就是一起奸污杀害许多女性的犯罪案件。这一奇特案情的败露是在一九四六年盛夏的八月十七日，在芝公园内的西向观音后山的矮竹丛中，发现两具毁容的女尸。看样子其中一具尸体死亡一个月有余，已经腐烂，另一具裸体女尸大约也死亡十几日了。

爱宕警署设搜查本部进行侦破，至二十日搞清了裸体女尸的身份。原来是住在该警署所辖的东两国的审判员式守伊三郎的女儿、十七岁的 R 子。八月六日那天，式守家的人到警视厅报告说，女儿 R 子去芝浦职业登记处探询未归，其所穿的服装，随身携带的物品都与裸体女尸相符。搜查本部从 R 子母亲嘴里得知，六日 R 子为了找职业的事，去拜访住在涩谷羽泽町的洗染匠小平义雄（四十二岁）。小平犯过前科。搜查本部认为他有嫌疑，遂进行了传讯。

据小平自己供述——

七月十日前后，在电车上与 R 子偶然相识。电车开到品川车站前面发生了事故。在当时这是常有的事，趁此机会，小平便与 R 子搭话。当小平听 R 子说是出来找职业的时，就暗示她他有路子，可帮她找职业。于是，互相交换了住址。尔后，R

子因患大肠炎卧床休息，小平闻讯赶来探望。R子的母亲也完全信任了他。八月六日早晨，小平来找R子，说是要她去参加就业考试。吃完早点，小平就带R子到增上寺的山中去，将她强奸后勒死，并将其衣服和随身物品藏在矮竹丛里。

随着审讯的深入，搞清了此前堕入迷宫的几起杀害女性的惨案都是小平的罪行。这个禀性异常的人在叙述自己奸淫、杀害R子的过程时竟然悲悲切切地痛哭流涕，简直不可思议。可是后来当审判官敏锐地抓住破绽穷追不放，迫使其供出其他犯罪活动时，他竟然又一反前态，表现出目中无人，蛮横无礼的态度。警视厅断定共有七件凶杀案都是小平干的。此外，还有三起看样子可能是他干的——都是以代为采购或介绍职业为诱饵，将女性引出家门，强奸后杀人灭口。犯罪现场是偏僻的山林、寂静的自行车停车场、无人问津的防空洞等等。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属于战后犯罪，特种犯罪的案件。拐骗住友财阀令爱的事件就是特殊犯罪的一种。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七日上午十一点半左右，位于藤泽市片濑町的白百合高等女校放学了。女学生们走在回家的路上，一个男人问：“你是住友先生的令爱吧？”这是一个头戴军帽，裹着军用绑腿的男子。“您府上发生了重大事件，我是来接你回去的，一块儿走吧。”于是带着住友吉左卫门的长女邦子（十二岁）走了。被带走的邦子没有回到横滨市户塚区的家中。家里人虽到警察署去报了案，但丝毫没有查找的线索。已经是九月二十日了。

但是，判明了拐骗住友令爱的犯人，其相貌、作案手法、类型都与前些时候拐骗清水厚的长女那个犯人相符。那个犯人就是没有固定住所，犯过前科的樋口芳男（三十二岁）。

一九四四年，在樋口还是火车司机助手的时候就拐骗过松

平家的令爱——女子学习院初等科五年级学生。“我有一笔钱要交给你父亲，请你来一下。”此外还重复作案七次，是一个屡教不改、生性特异的拐骗少女犯。警察当局向全国布下天罗地网缉拿樋口。九月二十一日，一位老太婆在列车上正在看着住友令爱被拐骗的报道，在盐尻火车站上来一个男子，带着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少女，坐在老太婆旁边。

“这个女孩子不是跟方才看到的报道中关于住友令爱的特征一模一样吗？”于是老太婆赶紧下车去告发。岐阜县刑事课对中央线和支线一齐进行临时检查，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时，终于在岐阜县付知町的杂货商小仓信一家中逮住了留宿在这里的樋口。

“有乐町阿时”的地下黑戏

渲染当时夜幕之黑暗的是暗娼们的存在。她们那种异常的体态招来多少好奇的目光，也常常成为新闻报道的材料。一九四七年由战地回国的作家田村泰次郎发表了描写暗娼生活的作品《肉体之门》，顿时成为畅销书，因为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气氛。还有一些关于“有乐町阿时”的小说也颇负盛名。

“有乐町”这个名称与地痞、流氓、暗娼们在这里寻欢作乐偶然巧合。“阿时”，就是在有乐町的陆桥下，每到晚上站在那里拉客的二百余名暗娼的头目。一九四七年四月的一个夜晚，在黑市市场一个铺子里，阿时所说的淫话被日本广播电台（NHK）的送话器偷偷地录了音。电台以《街头录音——陆桥下之女》为题把它公诸于世。阿时听后，惭愧至极，唾弃自己见不得人的生活。当天晚上，她的身影忽然从陆桥下消失，从此改邪归正，成为某公司的女事务员。广播电台于一九四八年

又以《陆桥下之女后记》为题报道了她的新生。

一九四六年伊始，警视厅就对暗娼来了个一网打尽，这种统一行动俗称为“狩猎”。三月初，抓获了以品川火车站为中心，田町、滨松町、有乐町的娼妓三百余人。面对前来“狩猎”的警官们，她们发出放荡的悲鸣进行抵抗，被追得四处逃窜的情景也太可怜了。这种场面成了“肉体小说”、“肉体电影”喜欢描写的素材。

据《朝日年鉴》（一九四九年版）刊载，一九四七年五月曾对六大都市的暗娼进行过统计，推定总数为四万人，年龄竟然从七岁至四十五岁，其中十八岁至二十四岁的占绝大多数，职业以小酒楼、酒吧间的招待员居多，艺妓、官吏、佣人、事务员、女工、司机、农业劳动者、护士、学生、家庭妇女等千差万别，无所不有。

如果不写一笔与她们为伍的流浪儿，就勾画不出当时社会的阴暗面。流浪者的圣地是上野火车站。一九二七年做为东京的门户建设的，通向东北地方的上野火车站，至一九四五年已经变成黑灰色的老朽建筑物岂止是流浪者，连流浪儿、暗娼以及战后的特产——青少年男妓也都乐于云集此地。宽阔的地道成为他们藏身的“避风港”。

一九四七年警视厅受理的杀人、抢劫、盗窃、恐吓、诈骗等案件中，一千三百四十五件是上野地道的人干的。六月八日警视厅、上野警署、东京都、上野车站等单位对上野地道至上野公园五万平方米地域的流浪者进行了彻底扫荡。并且规定，擦皮鞋的、卖糖果的、卖报的、暗娼等一律禁止入内。警视厅总监田中荣一（后为国会议员）在上野的山上被男妓殴打的事件正是在这次联合“狩猎”之际发生的。

第六章 天皇作为“神” 的末日来临

(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六年)

在巢鸭看守所里战犯的表情

当战后社会继续陷入混乱之际，美国进驻军总司令不断向日本政府提出推行占领政策的指令，这些都由东久迩宫稔彦、币原喜重郎、第一次吉田茂三届内阁忠实地执行了。

但是，期望日本确定自由民主体制的总司令部指令的某些内容，对于为数众多的希望维持旧制度的人来说，变革未免太过分了，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追究战犯和废除天皇制。

逮捕战犯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的。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命令原首相东条英机报到的命令是逮捕战犯的“第一号令”。当天下午三时半，已获悉“将要逮捕东条英机”这一情报的美国记者乘吉普车赶到东条的宅邸，东条拒绝会见。也许是感到不安了吧，东条穿着一件敞开的衬衫，出现在战争中用他自己的存款建造的木结构洋房二楼的窗口。混在记者当中的美籍日本人翻译从下面对东条喊：“东条，^{カミ}已经发出逮捕命令了！”东条脸色顿时大变。这时，总司令部的克劳斯少校赶到，大声地更正说“不是逮捕命令，而是报到命令。”“那么就走吧，让我收拾一下。”说着，东条反身走进里面去了。不一会儿

从房里传来乒的一声枪响。少校和记者们破门蜂拥而入。东条倚靠在一楼起居室的安乐椅上痛苦地挣扎着。左胸部被鲜血染红，右手仍握着手枪。“我愿意就这样死去。本来想自刎的，但因自己是个失败者，所以还是用手枪了。天皇陛下万岁……”他象说梦话似地自言自语。

美军的救护车将东条送进代代木的野营帐篷里迅速进行手术抢救后，又转送横滨野战医院。子弹只是擦心脏而过，很快就治愈了。他自杀用的手枪是被日军击毁的 B29 飞机飞行员使用的。当时东条虽口吐狂言，说是自杀等等，其实只不过是怕丢丑、受辱才拿起手枪的。“我自杀以后，你回九州的老老家去吧。”东条与夫人胜子这样商定了。夫人换上裙裤^①，手拿镰刀，装扮成割草的农妇，从院里走出来，显出依依不舍的神情。手枪的响声传到她的耳朵，她还是硬着头皮走了。

以东条为开端，负有发动太平洋战争责任的东条内阁的阁僚岸信介（后任首相）等三十九人全部被捕。其中厚生省大臣小泉亲彦于九月十三日剖腹自杀。文部省大臣桥田邦彦服毒身亡。还有陆军大将山下奉文，陆军中将本间雅晴做为菲律宾的战犯，被押上法庭判处死刑。

但是，由于战犯相继自杀，美军司令部决定改换方针，不直接插手，而是通过日本政府进行逮捕。但是，对战犯的追求还是毫不留情的。十一月十九日逮捕了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大将，首相小矶国昭大将、外务大臣松冈洋石、政友会总裁、邮电大臣久原房之助等十一人。十二月一日逮捕了以皇族梨本宫守正为首的曾担任首相的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大藏大臣池田成彬、评论家大川周明、德富猪一郎、原国务大臣绪方竹虎

和下村宏、《读卖新闻》社长正力松太郎等五十九人。

其后，近卫文麿于十二月十六日被传讯的当天，在荻窪的私邸服毒自杀。侧近人士富田健治说：“可能近卫文麿是害怕自己做为最后的华族被处以绞刑，不甘受辱而自杀的。”

全部高级战犯与多数被俘军官、士兵被收容在巢鸭看守所。大战犯都是一人一室，其他战犯二至六人一室。一到早晨六时，就听见美国陆军宪兵的钥匙哗啦哗啦地响着，以“哎，东条英机，起来！”这样的口气，指名道姓发出起床的信号。战犯起来以后，盥洗、扫除完毕，然后一做体操，贺屋兴宣（后为国会议员、法务大臣）、桥本欣五郎的情绪就好起来了。吃饭时无论大将、中尉还是小队长，一律拿着自己的餐具在走廊里排队等候分配饭菜。

梨本宫守正满不在乎地说：“我是做为皇族的代表来的，我可不是一般的代表啊！”；正力松太郎（后为国务大臣、读卖新闻社老板）默默无言，专心阅读《夏目漱石全集》；荒木贞夫表现出超然的态度；有马赖宁则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井野硕哉（后为法务大臣）以开玩笑的口气鸣不平说：“咳！反正就是那么回事儿，胜者王侯败者贼嘛。”；松板广正爽朗地说：“这座巢鸭监狱是我任法务大臣时建造的，早知有今日，一定把它建造得更好一些。”还有岸信介、重光葵则每日吟诗作赋打发时光。

东京法庭的判决

被逮捕的战犯中，由远东军事法庭（东京法院）起诉的有二十八人。起诉理由是“违反人类和平罪，杀人罪，普通战犯罪和违反人道罪。”一九四六年五月二日以市之谷的旧陆军省大

礼堂为舞台开庭初审。开庭伊始，日本方面辩护团的清濑一郎（后任文部省大臣，众议院议长）站起来陈述对于管辖权的异议。

“本法庭的管辖权应该限定在对于战争开始后，违反战争法规、惯例的人实行审判。起诉书所列举的杀人罪、违反和平罪、违反人道罪则不属于这个范畴。并且本法庭的审判对象应该限定于太平洋战争的战犯。”

当然，这一申述没有被承认。首席检察官在六月四日的开场白中说道：“将要追究在全世界人民心理和良心上构成犯罪的行为。”

但是，在五月三日开庭审讯时发生了一件稀罕事。《纪元二千六百年史》和其他战争中畅销书的作者、军部思想的指导者、被誉为日本的罗斯福的大川周明穿着一条又短又小，极不合体的裤子，衬衫扎在裤子里面，脚上趿拉着木屐，双肩耸起，以一副不可一世的傲然姿态走上法庭。

法庭执行官刚开始宣读起诉书，“啪”的一声，坐在前排的东条英机冷不防头上挨了一巴掌。当惊魂未定的东条回头看去时，大川却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当东条刚要掉转头去，大川一把夺过东条的笔记本，再一次向东条的头上狠狠打去。

类似的事第二天开庭时又发生。入庭后，当法庭执行官命令“坐下”时，大川用德语喊“德国人过来！其他人滚开！”因此审判长宣布让他退庭去做精神鉴定。大川一边狂叫“我头脑正常”，一边被美国宪兵推走。事后，大川曾喜形于色地对外国记者说：“因为从空气汲取了营养 非常非常健康。”

据说大川在审判开始前一、二个月就已经神经失常了，诊断结果是进行性神经麻痹症，被送进东京都立松泽医院。因为

是“狂人”，不能做为审判对象了。

但在社会上也有“是否为逃避审判而装疯卖傻”的流言蜚语。联合国方面也对其进行严密的精神鉴定，都认为确实疯了。可是，审判一结束，大川的病很快就“痊愈了”，直到寿终正寝，一直埋头从事《古兰经》的翻译工作。

如果允许象小说那样推理的话——因为狂人也有狂人的“逻辑”，一般人装疯，是逃不过精神医学专家的鉴别的。而头脑明晰、博闻强记的大川“怎么能让你们看出破绽呢？”他以嘲弄的心理，按照狂人的“逻辑”伪装自己，或许连美国医生也被他蒙骗了。

在整个审判进程中，前外务大臣松冈洋右患肺结核死于一九四六年六月，永野修身元帅患急性肺炎死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加上大川患“神经病”，被告席上少了三人。对余者二十五人的宣判，是在开庭以后经过两年零六个月的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绞刑：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武藤章。

无期徒刑：木户幸一、平沼骐一郎、贺屋兴宣、 嶋田繁太郎、白鸟敏夫、大岛浩、星野直树、荒木贞夫、小矶国昭、畑俊六、梅津美治郎、南次郎、铃木贞一、佐藤贤了、桥本欣五郎、 岡敬纯。

有期徒刑二十年：东乡茂德。

有期徒刑七年：重光葵。

战犯岂止这些“一级”的大人物。联合国军俘虏的许多将校、低级军官、士兵，做为“二级战犯”，也被押上了军事法庭审判。

天皇由“神”降为人

占领军总司令部认为财阀和地主制度是天皇制赖以存在的基础。故而，做为取消天皇制的第一步骤是解散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解体方案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日确定，一九四六年九月三十日起执行）；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自耕农，实施农地改革政策（第一方案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决定，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起执行。）

虽然后来至五十年代后半期，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财阀又以特殊的方式复活了。但农村却再没有倒退到昭和初年那样的贫困状态。农民成为占有土地的新的富裕阶级。总司令部取缔天皇制的第二个步骤是冻结天皇占有的股票、土地、建筑、木材等十五亿九千六十一万日元的财产；并且停止政府对神社的援助保护；禁止在公共学校普及神道教育。

总司令部做为第三步骤采取的措施是让天皇自己否认自己的“神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月中旬，总司令部劝说宫廷省“如果天皇能够表明自己不是神的话，那对提高天皇的国际威望大有补益。”币原首相立即赶到玉川用贺的私邸着手起草关于天皇的《人的宣言》。这一宣言是用英文写的。秘书福岛慎太郎负责译成日文，文部大臣前田多门推敲润色。于是，在一九四六年元旦终于发表了关于天皇的《人的宣言》：“把天皇当做‘现御神’、把日本民族看成高于其他民族，进而负有统治全世界使命的空想概念是不对的。”

天皇做为神的权威的丧失，从视觉上可以感受到的是宫城（皇居）前广场的变迁。一九四六年五月二日《朝日新闻》报道：

“经许可，记者来到宫城内二重桥傍伫立观察，民众的歌声响彻云霄，会场上红旗林立，一律左侧排列。估计这种欢庆解放的歌声一定会传到身居御文库的天皇与皇后两陛下的耳中。从天上的神降为地上的人，此时此刻，天皇当以何种感受倾听这民主主义的反响呢？使人不由得想起过去的战争岁月。当庆祝攻克武汉和新加坡的民众兴奋地手举太阳旗或提灯汇集成火海人流涌向这个广场的时候，就在眼前这座二重桥上，天皇陛下骑坐在白马高鞍之上缓缓挥动提灯向民众致意的身姿，宛如梦幻般地出现与消失。可是，如今这里却连一面太阳旗也看不见了……”

曾经做为“神域”不准任何日本人靠近的宫城前广场，战后不久被举着红旗和标语的“五·一”游行队伍和反饥饿大会示威队伍高唱“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的歌声震撼着，刹时间变成了“人民广场”。当夜幕垂降之后，这里成了野妓、醉汉、放荡无羁的年轻恋人们私会、嬉戏的场所了。“宫城前广场”这个神圣的名词，已经滑稽地与色、情、欲联系在一起了。

根据东久迩宫稔彦战后首任首相的提案——天皇的直系亲属十四皇族“除今上天皇的兄弟秩文宫、高松宫、三笠宫之外均降为臣子”，总司令部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发出了免除皇族特权与义务的指令。经济科学局金融课长杰宁古斯中校说：“禁止以皇族的名义为职业过寄生生活。”

某广告员的过去

与免除皇族特权并行，以重要大臣、枢密院、贵族院为主干的华族制度，随着一九四七年五月新宪法的施行也自然消亡。华族是依据明治十七（一八八四）年的华族令，分为公爵、侯

爵、伯爵、子爵、男爵五个等级，全部都是世袭制。明治当初只分封了五百零七家，可是到战后废止时已扩展到九百二十六家。

天皇制的精神支柱神社也没能逃脱没落的命运。祭奠明治天皇的明治神宫在战争期间的一九四五年一月，每天平均有一百三十八万人前来参拜，可是到战后一九四六年一月上旬平均每天只有一万三千六百人，中旬竟萧条冷落至四百人。祭奠战死者的靖国神社在一九四五年元旦，来参谒的遗族达四十万人，可是一九四六年元旦只有三万人，收入的香火钱也只有区区一千一百日元。

各种铜像也相继受到“惩罚”。在明治政府被誉为陆军之父的大村益次郎，日俄战争的特等功臣广濑武夫中佐、天皇制、官僚政治的鼻祖山县有朋元帅、“七·七事变”中的三勇士等象征军国主义的铜像自不待言，甚至使“大和魂”权威化的建武中兴之主楠木正成的铜像都被决定取消了。

唯独西乡隆盛的铜像，或许由于对它被丢在假山之上弃之不顾的命运的同情，或许由于它那穿着短撅撅的小袄，牵着条狗的样子着实动人，孩子们都亲昵地叫他“西乡先生”，才算幸免。

在激烈变化的市井之间，一些华族和高级将领们为了寻一条活路，也顾不得什么体面了。

出身于公卿之家的中国子爵在中央线吉祥寺火车站前一间十坪的小土屋里，开一个出售小吃和干果品的食品店；荻洲立兵陆军大将在涩谷经销运动器械；还有著名提督高桥三吉的儿子高桥健二以年近四十之身去充当广告员，不得不将家境没

落的悲哀深深埋藏于心底，做出各种滑稽动作巡游在银座的闹市街头。

那年头用人做活广告还是稀罕事儿，何况他又是提督的儿子，过往行人的视线都被他吸引住，从人们瞪视他的目光里，不能不感到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总而言之，总司令部让日本政府做的事——制定与施行新宪法（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以这一自由民主主义精神为基础的诸制度或先于宪法产生，或规定于宪法之中，战后大约用了两年时间全部完成。

政治方面——承认自卫权，但禁止为发动战争而搞军备。保障居住、言论、政治活动、宗教信仰等自由。废除贵族院，设立参议院，地方自治政权的首脑要经公民选举产生。改革警察制度（禁止设思想警察，禁止警官佩刀，改为带手枪或警棍，录用女警察）。

经济方面——解散财团，禁止垄断集中。实行农地改革，禁止军火、航空产业。

社会方面——工会活动合法。重新制定劳动关系法、劳动基本法，实行六·三制教育。

这些新法后来几乎都有过修改，但作为自由民主主义的基础，一直延续到今天。

第七章 扭曲了的社会 与黑暗的年轮

(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

被粉碎的二·一罢工

在劳动工会运动发起攻势的骚乱中揭开了一九四七年的序幕。人数超过二百六十万的全官公厅工会^①与政府间就提高工资、缔结劳动协约、全部工资支付现金等问题进行的谈判破裂，成为工会发起攻势的导火线。当时日共操纵了包括全官公厅工会在内的“产别”^②，内定把经济斗争搞成政治斗争。全官公厅共同斗争委员会（简称“共斗”）于一月十八日发布斗争宣言——“以二月一日零点为期限，逾期不答应工会提出的条件，将坚决采取罢工行动。”

日本共产党的目的是通过罢工打倒以吉田茂为首相的保守党政权，以便建立社会党与共产党的联合内阁。美军总司令部经济科学局长马卡特少将对全官公厅“共斗”代表，国铁出身的委员长伊井弥四郎等宣告：“如果你们实行罢工的话，占领军将采取制止罢工的必要行动。”“共斗”代表们继续以强硬姿态严辞

① 即机关工会全国联络协议会。

② 产别，原意为按照产业分类，这里是日本全国“产业别劳动组合会议”这一工会组织的简称。——译者

拒绝。对中劳委的斡旋也不予埋睬。

至一月三十日，麦克阿瑟召集各产业委员长严令中止罢工，但伊井等继续抗拒。因为共产党也好，全官公厅工会的干部们也好，还有“产别”方面，都猜测“总司令部不会发出中止罢工的命令，”继续扎扎实实地进行二·一大罢工的准备。社会上呈现出革命前夜的不安景象。

但是，一月三十一日下午四时五十三分，麦克阿瑟通过无线电广播宣称：“在贫困衰弱的日本，决不允许诉诸致命性的社会斗争武器。”并把“共斗”代表的委员们召集到总司令部，勒令他们发布“中止罢工命令”。伊井乃于三十一日下午九时二十分通过无线电广播宣布：

“最高司令麦克阿瑟禁止搞二·一罢工，希望诸位尽力避免明天的罢工，请各工会组织做出全面的努力。退一步进两步，工人、农民万岁！”

假若这次罢工付诸行动，也许是工人运动史上最大的罢工。但二·一罢工就这样流产了。

数寄屋桥是历史见证

一九四七年前后，那里还淤塞着散发臭气的污水，但人们并没有忽略在那臭水河上架起桥梁，这就是“数寄屋桥”。当时那里丝毫没有后来（一九五二年）菊田一夫创作的广播剧《你叫什么名字》中所描写的真知子与春树幽会的那种浪漫气氛，而只是一片纷乱杂沓，这数寄屋桥的混乱正是战后第二个年头整个社会的真实缩影。

桥的一角，立着警察的交通岗，在它的后面，是徒有虚名的“数寄屋桥公园”的一百坪左右的空地。已经微微脏了的忠灵

塔仍然残留在那里。二月八日在那塔下，战犯星野直树的弟弟星野芳树，自称要为同胞的归来做祈祷，说要搞所谓百日“绝食”。他还在这里募集了捐款，随后出马参加全国区的参议员竞选并取得成功。虽然这都是装模作样事先运动的结果，但有的老太婆还是被他感动得直流眼泪。

在数寄屋桥旁，一个已经当选国会议员的人物只野直三郎打出“日本人民党”、“维护天皇制”、“民主主义总统制度”的旗号，叫嚣“不要忘记八·一五”。与只野直三郎相媲美，日共东京中部地区委员会的各位大员们也不甘示弱，打出几十面红旗，狂叫“彻底追究通货膨胀和黑市获利者”。

在这混乱的场面里，还夹杂着劳动妇女在叫卖劝业银行发行的“三角籤”股票副卷半工半读学生在兜售外务省编辑的《日美会话集》；还有挂着“快速照像”招牌的几个街头摄影师在劈劈啪啪地忙着拍照；透过那镜头可以看到数寄屋桥上染红了指甲的野妓与美国兵一对一双地走过；身披华贵的紫貂围巾、看上去肯定是发了黑市财的女人；穿着用军用毛毯改制的短大衣的女办事员；用士兵大衣紧紧裹着身子的男人——千奇百怪，目不暇接。

新兴宗教乱纷纷

仔细想想看，那个搞百日“绝食”的男子也好，叫嚣总统制度的人也好，似乎都被某种信念迷住了。其实，他们都是那个混乱时代的产物。战后产生、流行的许多新兴宗教的极端行径主要也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造成的。自封为“熊泽天皇”的熊泽宽道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在飞行馆发布登基宣言，这也是新兴宗教的一种。

一九四七年，超越神、佛、基督教，不属于任何宗教系统的合法宗教组织有七个，这些都是真正的新兴宗教。还有许多没有经过申请、呈报的宗教组织。因“生命之真象”而出名的谷口雅春创立的“生长之家”；打出保护动物旗号的多田康子创立的“弘安海”；在战争期间因触犯不敬罪而遭禁止的桥本佐七创立的“日莲主义佛立讲”等等都是未申请许可的地下宗教组织。其中的典型之一是一九四七年一月定名的“玺光尊”。

战争结束前曾两次因“不敬罪”被起诉的长冈良子，战后自称为主佛，声称“自己是天照大神为了拯救世界派来的圣人”，并赐佛号“玺光尊”，“将于最近天地发生骤变时登上皇位挽救黎民”藉此招来信徒云集。

“玺光尊”的总部设在金泽。把供佛的大殿和焚香朝拜的大厅都称为“天国”，所有的仪式和名称也都模仿皇宫中的形式别无二致。由于信徒之中有围棋名将吴清源和双叶山等人，使得这个宗教组织名气颇大。双叶山在这一带本来自诩“素戔鸣大神”的化身，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玺光尊只要伸出手指点他一下，就足以使他来一个“倒栽葱”摔在地上。

金泽玉川警察署以长冈良子涉嫌蛊惑人心罪，拟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对其进行传讯。可是在头一天深夜，似乎因怕她闻讯逃走而派警官提前前去缉拿时，不料双叶山头裹防空头巾之类的东西，猛地窜出将警官踢翻在地酿成一场不小的骚乱。

进入一九四七年以后，沐浴在聚光灯下的“舞蹈宗教”成为竞相争艳的新兴宗教中的佼佼者。教祖北村佐吉，本是普通的农家妇女，可是在一九四四年冷不丁地“神灵附体”，次年八月便开始向附近的人们进行现身说法。尔后又创立“天照皇大

神宫教”，并向政府呈报登记取得宗教法人资格。这种宗教的特点是以神教与佛教混合，一边高声唱颂“六根清静”和“南无妙法莲华经”，一边狂欢乱舞。

新闻时代的胎动

然而在这样混乱的时期，唯独言论的自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新闻自由始于一九四五年九月麦克阿瑟发布“撤消对新闻、通信自由的部分限制”的指令。

趁着这股自由之风，一九四六年二月以后四十二种报刊相继问世，争奇斗艳，一时新闻界呈现出空前盛况。在东京有日刊《体育报》、《新晚报》、《万朝报》、《第一新闻》、《“都”晚报》，其中也有象埼玉县川口市的《政权肉弹新闻》、东京的《月刊世界短波情报》之流的劣品滥竽充数。

当然，出版界也呈现出一片空前兴旺的景象。一九四五年终战时综合性杂志只有政府御用的《公论》和《现代》这些都被停了刊。十月以后，新的综合性杂志《新生》、《新日本》发刊。由于纸张统售制度，买不到好纸，都用粗涩的再生纸代用，印刷着色不好，象本小册子那样薄。但是，青山虎之助经营的《新生》随着通货膨胀的涨势支付稿酬。据说因此造成了战后作家的稿酬远远高于其他劳动工资的状况。永井荷风和正宗白鸟的小说，森户辰男、羽仁五郎、军人小路实笃等的评论都刊载了。

一九四五年末《民主评论》、《自由公论》、《新时代》、《光》等综合性杂志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在这个时期，反对过去、攻击军部与官僚的言论和那些只是接过总司令部带来的自由、民主、社会主义等概念，拾人牙慧的言论统治着新闻界的舆

论。

最终，这些反对过去的言论也好，拾人牙慧的论调也好，都自消自灭了，那是从一九四六年度开始的。这种迹象从战争中被迫停刊、这时又复刊的《中央公论》、《文艺春秋》以及新创刊的《朝日评论》、《世界》等杂志中都有所反映。与这些新秀齐名的是一九四六年六月发行的《读者文摘》(日文版)对这份杂志不能不多写一笔。由于总司令部的斡旋，在其他杂志都苦于纸张饥馑的时代，唯有《读者文摘》得天独厚，获准无限量地大批印刷。由于它内容新颖，宣传能力也占压倒优势，一九四九年度发行量突破一百四十万册。

至一九四七年，综合性杂志问世的时代已成为过去。《宝石》、《性爱》、《小说新潮》、《文学界》、《侦探实话》等等文艺、推理杂志相继创刊。妇女杂志有《主妇之友》、《妇人俱乐部》、《妇人公论》、《妇人世界》等复刊，《女性线》、《主妇与生活》、《妇人生活》等创刊。与迄今的妇女杂志风格不同的《向日葵》、《生活札记》、《美貌》、《全女性》、《妇人朝日》等也名声大振，形成了出版高潮。

当时《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都还没有夕刊，夕刊只限于《东京新闻》和其他专业报纸才有，而且日刊夕刊加在一起也不过是一张纸共两版。就是这些报纸，在当时因纸张困难，也有几天不得不印成十六开版的小报。出版用的纸张是由分配委员会审查决定配给的。其数量少得可怜。因为分配委员会的委员长是岩波书局打进去的人，自然岩波书局近水楼台先得月，分到百分之十三的最高配给量。各出版单位都含辛茹苦地购买黑市纸张支撑着经营。

趁着这股热潮，光怪陆离的色情读物也纷纷出笼。这是一

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出版界的特有现象。杂志有《猎奇》等，单行本有《阿部定的艳话》之类的书泛滥于各露天的小滩儿上。一九四七年三月，《猎奇》因发表《H大佐夫人》被以猥亵罪起诉，以此为契机，渐渐地把这股邪风压了下去。

脱衣舞的出现与广播的兴起

一九四七年一月，在东京新宿区的帝都座剧场的五层楼上，秦丰吉演出“画框表演”，这是脱衣舞的首次出现。与伦敦的脱衣舞相仿，当演员露出乳房时一动不动，象一座雕像，但这已使日本人惊诧不已。从此，脱衣舞便迅速向全国蔓延开去，在整个战争期间被抑制了的性，一下子暴发般地解放出来。

勿宁说在这个时期以坚实步调取得进展的是歌舞伎。在过去一切陈腐的东西都行将覆灭的社会潮流里，歌舞伎首当其冲面临灭绝的危险。事实上《寺子屋》、《忠臣藏》等剧目的禁演都是来自总司令部的压力。但是，正如市川猿之助所说：“歌舞伎这一传统艺术形式不能没有。”一九四五年九月在东京剧场尾上松绿演出了《土蜘蛛》受到好评。一九四七年二月，尾上菊之助继承第七代梅幸艺师、市村家橘继承第六代羽左卫门艺师的艺名、市川海老藏、尾上九郎右卫门、大谷友右卫门等演员也都崭露头角。显示出“古老的歌舞伎”被“新一代演员们”继承、升华的景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取消了对《忠臣藏》的禁演。一九四八年新桥舞剧场、一九五一年歌舞伎座都恢复了演出，从而歌舞伎这一度曾面临灭绝之灾的剧种反而兴盛起来。

与这些事情有关的广播事业也是不容遗漏的。因为广播只有一个NHK电台，在“八·一五”终战后的三天内，除了播送新闻外，哑然无声。终于从八月十八日以播送天气预报为开端

恢复了播音。这一广播电台完全被总司令部控制了。九月二十三日给规定出播放的标准，让广播为美军的占领政策服务。

此后，文娱节目渐渐增加，深受广大听众欢迎的节目是《业余爱好者的自豪歌喉音乐会》。

还有受到知识分子欢迎的《话之泉》节目，它的形式是模仿美国的“新闻节目”，这对于日本人来说完全是耳目一新的。

到了一九四七年又增加了菊田一夫的《鸣钟之丘》、《对过儿的邻居》等广播剧，还有《星期天文娱节目》、《明星与电影晚会》以及《二十个题目》等等，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听众。

两起残忍的杀人案件

这样的杀人案件恐怕是前所未有的。两起惨案均发生于一九四八年。一件是“寿产院案件”，另一件是“帝银案件”。

寿产院这桩奇案是一月十二日夜里发现的。拉着四具婴儿死尸的新宿区榎町殡仪馆的长崎龙太郎遇上了早稻田警察署偶尔布置的特殊警戒，原来车上的死婴是从寿产院拉出来的。当早稻田警署对石川美由纪和她丈夫石川猛经营的寿产院进行搜查时，一桩可怕的事实大白于天下。

石川夫妇自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八年共收养二百一十二个婴儿，每个婴儿收保育费五千至八千日元。可是，从一九四七年一月开始有八十五个婴儿因饥饿和消化不良而死亡。仅在五、六天内就有九个孩子死去，为了处理这些死婴的尸体，以每具五百日元的报酬交给长崎去埋葬灭迹。

帝银案件——一月二十六日，在冬天的太阳即将落下去的下午三时半，帝国银行椎名分行的职员们的生活与素日没有任何两样，可是，就在这时，在银行后面职员们出入的门口出现

一个男子，由于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使他们当中的十二个人立即结束了人生的旅途。

来者身高五尺二、三寸、四十五岁左右，脸型略长、皮肤白皙、留平头、有白发、一派绅士风度。在清癯的面庞左颊上似乎有一块黑痣。身穿一件烟色的外套，红色长筒靴子。臂上戴着袖章，红地白字，上面印有东京都的徽章，他出示的名片上印着“厚生省技官兼都防疫课、医学博士松井蔚”，要求面见分行长。

偏偏凑巧，分行长不在，由代理分行长吉田武次郎出面接待。“这一带发生了流行赤痢，我是来搞消毒预防的。”说着，把十六位职员全部召集到分行长的办公桌旁，让他们把十七个茶杯摆好。用一端带橡皮囊的玻璃管把药液分装进每个杯子里半杯。自己首先喝了其中的一杯，好象做示范似的，其实是在捣鬼。待职员们都喝过以后，刚刚过了一分钟，又取出第二种液体，它是装在一个漱口瓶似的容器里，又挨个倒进茶杯，让他们喝下去，银行职员们服完药只觉得喉头火辣辣地刺痛难忍，都想去饮水，但是随后就神智不清，昏倒在地上。

过了一会儿，恢复了意识的村田正子爬到门口，向过往的行人呼救。到派出所报案时已经是四时二十五分。四人得救，十二人死亡。杀人强盗拿走了一张一万七千四百五十日元的小面额支票和现钞十六万四千余日元。

警视厅根据目击者的追忆，画出犯人的模拟画像公开缉拿，除取得一般协助外，还动员了二百名侦探着手该案的侦察。但是，虽找到了·一些可疑的人，却都经人证明当时不在现场，没能取得可靠的依据，犯人的“痕迹”减退了。二月十二日，警视厅决定采取长期作战的方针，设立由侦探长藤田为首的综合搜

查本部。同时，在目白警署分部由堀崎繁喜任总指挥，一般情报的整理工作委托课长玉村二担任。

平泽贞通其人

随着侦破工作的进展，判明了两起类似的杀人未遂案件。一件是一九四七年十月四日午后三时许，在安田银行荏原分行出现了一个持“松井蔚”名片的男子，以同样的手法让职员们服了药，但是，职员们的身体并未发生异常变化。另一件是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九日，在帝银事件发生的前一周，午后三点过五分，在三菱银行中井分行，来了一位男人，出示了“厚生省技官兼东京都防疫课、医学博士山口二郎”的名片，采取了同样的手法企图让职员们服药。但由于分行长小川泰三持怀疑态度，那个男子匆匆溜走了。

警视厅认为这些案件是同一罪犯干的。·所以把调查名片做为基本线索予以推进。结果搞清了“山口二郎”这个名片是犯人订制的。而“松井蔚”那张名片确有其人，犯人使用的那张是松井蔚使用过的名片之一，于是对松井名片的去向进行调查，任务交给了警部辅^①居木井为五郎。松井蔚有个习惯，他每送给人一张名片总要把对方的名字记下来，因此对接受过松井名片的六十二人进行过滤，其中一个可疑的人是“坦帕拉画”^②画家平泽贞通。

据松井介绍说：“一九四七年四月去北海道出差时在乘坐青函渡船时认识了平泽并给了他一张名片。”当委托小樽市警

① 警部是日本警察级别的职称之一，警部辅是职位低于警部的警察。

② 坦帕拉画英文为tempest。一种类似油画的绘画法，用胶、蛋白等搅匀作画，十五世纪以后渐渐被油画取代。——译者

署对正在小樽市探望父亲的平泽贞通进行询问时，平泽回答说：“那张名片是一九四七年八月在市内电车上捡到的。”这样就把平泽洗“清白”了。

但是居木井在对其余二十个接受松井名片的人进行调查的途中路过小樽市时，顺便到平泽的老家去看看，那已经是六月三日了。居木井见到平泽的第一印象便对他产生了怀疑。他的长相酷似目击者追忆的画像，为什么无缘无故在北海道的老家呆这么长时间呢？居木井的心中开始萌生出判定平泽有罪的信心。于是，几个疑点浮上脑海。

“平泽以其妻子的名义，于一月三十日在三菱银行中野分行存入二万日元，二月九日又存入二万四千日元。这些钱来路不明。”

“平泽的亲戚住在帝银椎名分行附近的椎名町市场上，所以他对这一带的地理情况了如指掌。”

“因为平泽于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患过健忘综合症，被认为是个性格异常的人。”

“被盗走的一万七千四百五十日元小面额支票于作案的次日在安田银行板桥分行兑换成现金，那个前来兑换的男人留在支票上的签字与平泽的笔迹相同。”

如此等等共提出了十八个可疑点。

于是，八月十八日——事件发生后的第二百一十天才对平泽贞通发出了逮捕令。对平泽是八月三十一日诈骗三十万日元未遂案的嫌疑也更深了。九月二十二日平泽开始供认一部分罪行。二十六日又供认以前说“松井名片是在电车上捡到的”，是谎话。

参与调查这一案件的有关人员共计二万五千四百一十一

人，涉嫌被调查的人也有五千人，成为过去不曾有过的一次大侦破。审判情况是，一九五零年七月二十四日，经东京地方法院第一审宣判死刑，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经东京高级法院第二审也裁定为死刑，一九五五年四月六日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是对于该案至今也还有人坚持说：“平泽不见得是真正的凶手。”^①

笔杆子与暴力的斗争

暴力事件仍不绝迹。一九四七年对暴力团进行了彻底的围剿，判处关根贤五年苦役、罚款七万五千日元，一九四八年六月判处尾津喜之助有期徒刑八年、罚款五十万日元，但是，尽管如此，暴力团的余孽仍未根除，于是一九四八年六月，警视厅对政府机关、公司中的行为不轨分子进行了明查暗访搜集其犯罪的证据。

牵扯到的人物之一是绰号“银座大老爷”——东京中央区室町的国际商业广告公司老板、犯过四次前科的内田将光。从掌握的材料看，高桥、丸之内警署的二十七名警官都接受过他的馈赠与宴请。警官们的低劣品格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弊病。因而从一月至六月，警视厅对紧急录用的约九千名警官的履历进行了调查。其中三十九人有盗窃、赌博的前科经历，在原工作岗位上受过处分或免职的有九十四名，结果清除约千名不合格的警官。

但在地方上暴力团的活动仍然猖獗，其典型事例便是埼玉县的本庄事件。

八月七日，本庄町的某纺织品业主邀请检察厅和警察署的

^① 由于对平泽的审判有不同意见，至今平泽仍在押，未执行枪决。——译者

官员们到饭馆去吃喝一顿。据传说，因此就把在本庄町私贩丝绸的事暗中了结了。《朝日新闻》记者岸将此事做了报道，这便成为本庄事件的导火索。

町议会的议员、町警察后援会、警民协会理事、司法保护委员大石和一郎对记者岸粗暴地施加压力和进行威胁。当时检察厅和警察署的有关人员也在场，但是竟然没有一人出面制止大石的暴行。事后，与大石有黑关系的河野暴力团不分昼夜地轮番传唤记者岸，大搞疲劳战术。

当时本庄町成了暴力团的一统天下。国会议员青柳高一说：“因为这个地方游人颇多，我想在这个地方举行讲演会。可是，河野暴力团让我交出十万日元，我不肯交，河野帮的一个男子就威胁我说：‘今天就要你的脑袋！’”对于河野暴力团来说，町议会议员大石已成为他们的保护伞。原来的町议会的人们说：“大石借助河野的暴力，干涉町政府的事务。在上次选举时我们这些人都只好甘拜下风，退出竞选。”

对于这种怪现象，《朝日新闻》展开了彻底的攻势。埼玉县军政部的哈伊哈德也表示支持，认为：“必须彻底除掉本庄町的黑社会与暴力团”并果断地决定：“如果《朝日新闻》发动的舆论攻势不能解决问题的话，军政部将采取必要措施。”善良的町民们也群起而攻之，组成了“町政刷新期成会”，迫使公安委员们总辞职。公安委员们顽固地抵抗，警察署长也企图赖着不动。

但是，一进入十月，“町政刷新期成会”便奏出了胜利的凯歌。重新选举出三名公安委员，更换了署长，有关的检察官也降了职。这一事件表明，笔杆子能够把舆论与现实的力量结合起来。这一斗争与后来《读卖新闻》开展的追究新宿暴力团的

运动齐名。

太宰治投水自杀

接着记述晦暗的事件。其中之一，就是作家太宰治的自杀事件。住在三鹰町的太宰治与经营美容院的寡妇山崎富荣相爱。据说她与他相识是在车站前节日临时搭的舞台旁，爱好文学的山崎富荣成为太宰治在文学创作上的助手。两人曾一同到法国文学研究家丰岛与志雄家里去玩过，于是，两人的关系便在一些消息灵通的人们中间传开了。

实际上太宰治只是在自杀前十天才开始与富荣同居的。从富荣的屋子里发现他留给夫人的遗书——“小说也不能写了，我将永远地到人们不知道的地方去了。”——那是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四日的事。

这对情人双双在玉河上游投水自尽。他们的尸体是在推定的投水时间六月十三日以后一周，六月十九日被发现的。如果太宰治还活着的话，那一天恰好是他的四十岁生日。当时《朝日新闻》正连载他的绝笔作品，题目是《再见》。说来奇怪，莫非在他动手写这一作品时就已经下决心要自杀了？为什么呢？《再见》也是写到第十三章这个不吉利的数字时结束的。他之所以选择死，也许是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走到尽头了吧。

对于荒废的社会面的报道

到一九四八年底，无论经济还是社会仍停留在“战后”状态。俯瞰过去的一年——一月四日《朝日新闻》以“四八年的时装”为题报道了欧洲的“时髦”：

“终战第四个年头的春天，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仍然被粮食

短缺和生活艰难纠缠着，只有‘时髦’宛如不死之鸟又开始振翅了。但是，欧洲仍然处于战后状况，时装也是短缺物品。”接着，这则报道又介绍了日本元月的景象：

“元月的头三天，只有天气是那样晴朗，来到户外活动的人们把偌大个东京的所有闹市都填得满满的，磨肩接踵的人们穿着这样花俏的节日盛装，使人简直不敢相信，经历了战火的焚烧竟然还有如此漂亮的衣服保存下来。”

喜欢打扮的女性们的心理犹如不死之鸟在战后首先复苏了。可是，由于新式的西服、服饰一时生产不出来，能穿上幸免于战火的战前的衣物也就算再时髦不过了。

经济状况仍然十分严重，三月份，芦田均首相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答询时说：“至今仍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并且“美国陆军要求政府做出预算，拨款一亿美元作为对日本的粮食补助经费，一亿七千万美元作为重建日本的资金。”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日本政府简直是一筹莫展。

关于战后社会的贫困、悲惨之状有许多令人心碎的报道。请看社会版里出现的一些标题：

《因阅读惊险读物而行窃的儿童在增加》，《不断扩大的流浪儿队伍》；《依据儿童福利法成立保护人委员会》；《小学校校舍不足》；《令人担心的孩子们》；《聚赌诈骗》。

令人开心的报道也不是没有的。例如《实行夏季作息时间》（四月二十八日——九月七日）；《第一个文化节》（十一月三日，战前的明治节）；《歌手川田顺的“老年之恋”》等等。

但是，直至秋季，由于通货膨胀和不景气的独特表现形式，使重振经济、战后复兴建设迟迟不得奏效。十月六日《朝日新闻》刊载了一篇报道，题目是《通货膨胀的贫困之秋》。

“企业——到处银根吃紧，小金额申请激增的中小企业公库”

“出版——书籍滞销，退回出版社的书籍增加，杂志大甩卖”

“电影——雅座卖不出去。”

在一九四八年的政治史上记载了昭和电工贿赂事件；芦田均内阁总辞职；吉田茂第二次组阁；但这些仍然是在战后占领政策下的变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国民生活如何呢——一九六九年发行的《生活札记》杂志第一百号中有一篇文章《什么也没有的时期》，它充分反映了当时国民生活状况：

“战后已经三年过去了，全国没有房子居住的人家仍有三百七十万。大致每四家中有一家无房居住。这一年的年末，工矿生产水平只达到战前的一半。”

当年秋季出版的第一号《生活札记》杂志中田宫虎彦在《地狱极乐》一文中写道：“一言以蔽之，衣、食、住，哪一方面都处于相当可怜的穷困境地。穿着破烂不堪的裤子，米柜里空空如也，整日里闷在那肮脏的租借的破屋里。若是在战争前，这种境况早该全家自杀了。可是不管怎么说，比起遭受空袭那天夜里的惨状来，也就算不了什么了。洗个澡六日元、坐一趟公共汽车花个五日元、十日元的，已经不当回事了，因为这时的钞票好象没有分而只是以元为最小单位似的。

“我心目中设想的极乐状况是什么呢，那就是住的不敢奢望很宽敞，只求有一间四块塔塔密席子大小的书房供写作之用，家俱适当地有几件，不必把书籍堆放在装蜜桔的箱子里，破破烂烂的衣物不至于没处放，只要稍微整齐一点就行了。

吃的方面每天有五百克稻米，烧牛排谈不上，只要带点肉

的菜有两、三盘，饭后有水果，带奶油味儿的白面包也不错。我一看见美国杂志上那五彩缤纷的食品广告，比看到窈窕仙子在三保松林里翩翩起舞的极乐图更真切地感受到极乐的滋味儿。

穿的方面只要西服的里子没有破，有五、六条称心如意的领带，下身穿的只要能替换的就行了。我所响往的极乐状况就是这样子。”

由此可见，在一九四八年日本还没有从战时的荒废状态中解脱出来，仍陷在战败的悲凉之中。

第八章 血染铁路之谜

(一九四九年)

国铁总裁下山的尸骸面目全非

一九四九年刚刚开始，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接连发生了下山、三鹰、松川三起铁道上的流血事件。可以说这些都是“时代的产物”。

一九四九年初，总司令部和第二次吉田内阁迫不急待地谋求摆脱“战后状态”。二月，应总司令部之邀，访问了日本的道奇公使指示吉田内阁，“为了使日本自身的经济独立，要控制住战后的通货膨胀，使经济正常化。”这就是道奇路线。大藏大臣池田勇人（后任首相）以重建战后经济为目标，不得不采取紧缩预算的政策。

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了相当严重的不景气，各企业被迫缩短开工时间，拖欠付款，资金周转不灵，停发工资，裁减人员。据八月二十四日劳动省发表的数字，约有一千四百五十五处停发工资达七亿四千万日元以上。迫不得已，政府也只好解雇国家和地方公务员二十万人以精简机构。

这样一来，势必导致工人运动的进一步激化。共产党、社会党等在野党攻势也更加凛冽。对此，吉田内阁打算在都、道、府、县实施公安条例。六月，需要大批裁减人员的国铁改为独

资经营的国营运输公司，实行独立核算制。根据新的定员法，要从六十万职工中解雇十二万零四百一十三人。

为此，国铁工会组织于六月九日以反对实行新制度为开端展开了斗争。东京铁路局以工会领导人违反业务规章为理由给他们免职处分。于是，十日东神奈川支部开始了罢工。下午六时半，两辆插着红旗、贴有“人民电车”横幅的电车在前面开路。蒲田、中野、三鹰等处的司机也加入了罢工的行列。“电车是人民的电车，让它跑，让它停，都随我们的便。”

面对工会的如此攻势，国铁总裁下山定则还是于七月四日宣布了第一批被裁减的三万零七百人的名单，并预定隔一天再宣布第二批解雇的九万余人名单。

运输公司的干部和总司令部的有关官员预定七月五日——梅雨季节的一个阴云低垂的日子——共同研究第二批名单。象素日一样，早晨八时二十分左右，下山从家里出来，坐进黑色的轿车，命令司机大西政雄“开往三越去”。因为还不到九时，三越百货商场尚未开业。“那么，先到千代银行去吧。”下山走进丸之内的千代银行总店，先到地下室的贷款金库室去了，大约过二十分钟左右，下山再次坐上汽车奔三越去了。在三越百货商场前面的一侧，汽车停了下来。“我去一下，五分钟就回来。”说着下山的身影消失在三越百货大楼的南侧入口里。但是，此一去不是五分钟，而是永不回还了。

左等右等不见下山的影儿，运输公司的干部们都不安起来。当停在三越百货大楼旁的汽车里的司机从广播里听到“下山总裁下落不明”时已经是下午五点了。

时针又转过了一百八十度，至翌日零点二十六分，驶入绫濑车站的末班电车的司机椎名向站内的工作人员大喊：“在东武

线陆桥旁好象有一具尸体！”

果然是一具死尸，在常盘线与东武线交叉处的北千住开往绫濑之间的陆桥旁约七百米的地方。这具尸体已经面目全非，原来是被货车 D5165号轧死的下山总裁。

自杀说与他杀说的波澜

对下山总裁离开三越至发现其尸体这十四个小时内他的行迹进行了缜密的调查。

据十七个人的证言——在三越百货大楼里，他到过出售化妆品的柜台。还有人说有三个看样子象是他带来的男人与他在一起。既有证言说他走出三越大楼后在路上与两个男人低语了什么，也有证言说他在地下街的“香港”吃茶店里与两个男人交谈了什么。下山好象是坐地铁向浅草方向去了。

估计他从雷门站下车换乘东武电车，然后在五反野站下车。一位车站工作人员说：“下午二时左右，下来一位身材高大、很有派头、象个达官模样的人问附近是否有旅馆，我向他介绍了末广旅馆。”那位样子象下山的绅士于当日下午来到了末广旅馆，确有其事。“我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说着，客人走进二楼的一个小房间睡了。傍晚五时半他交付了二百日元住宿费和一百日元小费，然后离去。这个旅馆离发现尸体的现场只有一千米。

一个证人说：“下午六时三十分左右，我曾三次看见一位绅士模样的人在附近徘徊。”另一位证人说，“在同一时间，看见一位绅士沿着铁路走，还看见两位穿西服不扎领带的同伴从路基上下来。”这是关于那位样子象下山的人的最后消息。

但是，正如国铁副总裁加贺山之雄在《文艺春秋》（一九五五年临时增刊）和《日本》（一九五九年七月号）上发表的文章

中所写的：“直至今天，对下山之死没有掌握任何线索，恐怕这才是最真实的情况。”总之，完全如坠入五里迷雾之中，一切都模糊不清。因为每个人的证词都用：“好象是下山”这样的字眼儿。出现在五反野的末广旅馆的“下山”也是这样。出事后把真下山的照片拿给旅馆女老板看时，她说：“嗯，我看象是这个人。”在他休息的那个小房间里找到的毛发也与下山的毛发相似——只是这样一些证据。相反，每日至少吸二十支香烟的下山为什么在旅馆一支香烟头也没有留下呢？那位绅士交付小费的一百日元钞票是不曾用过的新票子，可是在下山尸体上找到的钱里却没有新票子；下山的皮肤又黑又粗糙，而那位绅士却是白净面皮。——反面证据也站得住脚。因而那个人物究竟是否下山无从查清。

此外，关于对下山尸体进行解剖的结果，产生两种对立意见。

东京大学古畑种基教授的检查鉴定称：“死尸的各部位有三百余处伤痕。属于‘生前伤’，的伤痕是手、足尖、胸部、睾丸、阴茎的右侧等八、九处，这些伤都伴随着表皮脱落的内出血。与此相反，被车轮碾断的部位和其他的伤则是死后才有的。”也就是说，下山是死后被碾断的，这是他杀说的依据。

与此相对，庆应大学的中馆久平教授则说：“在碾死下山的货车上有胶冻状的血迹，说明是活着被碾死的。”这是自杀说的根据。

这种法医学上的对立见解导致了侦破单位与新闻报道方面的意见分歧。警视厅与《每日新闻》相信庆应大学的鉴定，支持自杀说。检察厅与《朝日新闻》信服东大的鉴定，赞同他杀说。

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要想找出确凿的证据简直比登天还

难。警视厅倾向于自杀说是根据目击者的谈话，面对裁减人员这一棘手问题；下山的苦恼与忧郁症；死尸没有被移动等事实。检察厅根据现场没有遗留品；沾在西服上的油污和铁屑不知是怎么弄的；还有，可以说明生前遭受暴行的皮下出血等，尤其联想到下山死在工人反解雇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更加坚信他杀说。

除共产党和工会的干部们坚持自杀说外，一般人心目中都倾向于他杀说。作家木木高太郎说：“我认为是有预谋的他杀。我设想，总裁在三越下汽车之后，或许有某件要事想会见谁，或者用了餐随便走走而上了圈套。由于总裁一个人对付几个人，在提出重大妥协条件谈崩之后，便被人下了麻醉药或毒药，趁他昏迷之际马上用汽车拉到现场……”并且一般人认为这伙作案的人可能是日本人以外的人。

加贺山之雄与下山同时负责国铁的减员工作，数年以后他是这样推理的：

“他也许是为了获取工人运动方面的情报而去会见谁，结果被人家绑架走了。虽然有人作证说在三越、地下铁、浅草车站、现场附近出现了象下山的人，但这些证人谁也不认识下山。估计是派一个样子象下山的人在那一带转悠、不过是为掩人耳目而已。当时还发生了一件令人颇为费解的事。五日傍晚，东铁工会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说总裁因车祸死亡了。虽然事后查清了这个电话是从尾久火车站打来的，但不知是谁打的。”

下山事件当时已成为不解之谜，随着时间的推移，再想正确地解开这个谜简直是异想天开。一切都是那样地迷离莫测。无疑，它将做为那个时代的谜永远流传下去。

三鹰、松川事件接连发生

轰动全国的下山事件发生一周以后，七月十二日，国铁当局又公布了第二批裁减六万三千人的名单，正当工会对此进行反击时，七月十五日又发生了三鹰运输公司的无人操纵的电车横冲直撞的骇人听闻事件。

那天下午九时二十四分，突然从三鹰车站的停车库里窜出一辆空车，如猛兽般地横冲直撞，把站前的交通岗、建筑物、电线杆等都撞毁，造成六人死亡，十四人负伤。这辆六三型电车是当天下午四时五十五分经过验车之后被调进一号线车库的。据司机说：“落下了导电架，刹住了制动器，也关闭了车门。”作为肇事的嫌疑犯，逮捕了三鹰电车区检验班的饭田七三，中野区的司机山本文一，接着又进一步对竹内景助等十一人提出起诉。

饭田与山本是日共党员，加之事件发生的当天午后六时许，从三鹰电车区内给某人打来一个奇怪的电话：“将有惊人的事情发生，等着看热闹吧！”因而司法机关把注意力集中于“共同合谋”这方面进行侦破。

一年以后的六月十二日，检察官提出量刑，理由是：“这一可怖的反社会犯罪是三鹰电车区的不轨分子与地区委员会筹划的，他们认为工作岗位和电车都是人民的，他们鄙视法律的权威而崇尚暴力。”结果三人被判处死刑、两人无期徒刑、一人十二年徒刑、两人八年徒刑。

但是，八月十一日，审判长承认：“以共同合谋为理由的量刑是检察机关的空中楼阁。”认为这一案件只是竹内景助的个人犯罪。宣判竹内为无期徒刑，其余被告全部无罪开释。在第

二审时又同意将竹内判为死刑。

此后发生的是松川事件。由于国铁工会组织在一个时期内搞“人民电车”和“无人电车”等过激行动遭到舆论的谴责，国铁当局采取强硬措施，撤消了十四名工会斗争委员的职务，使工会斗争体制迅速瓦解。尽管如此，基层工会的斗争仍在继续。国铁福岛支部与面临裁减一千几百人的东芝松川工厂的工会联合起来共同斗争。

这些工会组织中的部分人共同谋划制造了一起列车脱轨事件。他们盗出锤子和扳子等，把东北线金谷川——松川之间的陆桥拐弯处的铁道钉拔出二十五根。十七日上午三时五分，当青森至上野的四一二次客车行驶到这里时，车头冲天而起，远远地甩在一边，接在车头后面的两节货车崩裂，一节邮件车和两节客车也随之脱轨。司机和助手死亡。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松川事件。

搜查当局开始对附近的不良少年挨个审查。有一位在最近被裁减下来的十九岁的青年护路工赤间胜美，在列车脱轨的前一天晚上曾对两个朋友说：“今天晚上将有列车翻车。”从而使该案的调查取得进展。受到起诉的被告人达二十名。

工会和被告认为，这是“检察厅搞政治迫害的一大阴谋”，继续坚决地进行抵抗。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六日在仙台地方法院召开的公审大会上，展开了异乎寻常的法庭斗争，酿成一出退场闭庭的闹剧。在仙台高等法院的第二审（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宣判死刑的有四人、无期徒刑两人、有期徒刑十五年两人、十二年一人、十年三人、七年四人、三年半一人、无罪三人。

工会和被告仍然继续向最高法院申诉。在四年半多时间

里，作家广律和郎专门就松川案件的审判问题撰写了两千余页文章发表在《中央公论》上。直至一九五九年八月十日，最高法院否定了第二审的判处，认为：“关于国铁与东芝两工会组织合谋的供词不是很可信的，原判决在认定事实上有可疑之处。”命令重新审理此案。这是审判史上罕见的事例。经过仙台高级人民法院重审，全体无罪释放。

卡农机关留下的谜

那么，到底松川案件的罪犯是谁呢？共产党的志贺义雄指出，最高法院的判决其实是“卡农机关的意见”。

卡农机关是属于CIC（反间谍部队）的一部分。正式名称是四四一CIC分遣队，但不久就改为独立的秘密情报机关。“卡农”是从该机关的头目卡农中佐的名子得来的。

这是后话。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原共产党员鹿地亘在藤泽市鹤沼的别墅里被绑架了，这是卡农机关干的。鹿地被蒙上眼睛，转来转去带到岩崎的别墅，这里已成为卡农机关的大本营。鹿地受到严刑拷打，被勒令交待德田球一（当时已潜入地下）的住处。

实在忍受不了非人的折磨，鹿地把头悬在吊灯架上企图自杀，但被一位厨师山田善二郎救了下來。他把写给社会党国会议员猪俣浩三的信托山田给带了出去。于是报纸上刊出《鹿地失踪事件》的报导。卡农机关迫于舆论压力，让鹿地立下了保守秘密的誓言，然后把他带到神宫外苑释放了。那是一年以后的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七日。

可是，有人认为这位卡农中佐和一九四九年为国铁裁员事与下山总裁交涉的民间运输局的谢古诺是同一个人。这是宇野

浩二在他撰写的《终生费解的故事》里提出来的。还有许多人也认为，下山事件的罪魁祸首是卡农机关。因为卡农的怀里总是揣着手枪，并且曾经与下山总裁、加贺山副总裁打过交道，又是一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加之那位谢古诺从民间运输局消声匿迹以后，卡农立即就在CIC露面了，这也是一桩奇妙的巧合。

之所以说松川事件是卡农机关的阴谋，是因为那天夜里恰好从现场路过的斋藤金作目击了那一场面：大约十二名美国兵从铁轨下面把枕木抽出来，在他们中间的一位日本人对斋藤威胁道：“你要是向别人泄漏，要受军法处置。”斋藤一看次日的报纸，知道了那个场面就是松川事件。五天以后，一位不相识的人出现，命令他到CIC去报到。惊恐万状的斋藤赶紧逃到横滨的弟弟家去，在那里当了三轮车工人。

翌年一月十二日，斋藤突然失踪了。四十天以后，他的尸体在挖掘的水壕里被人发现。从他的胃里检验出乙醇，据说可能是醉后跌入水壕的。不可思议的是，有一位身份不明的人来到他弟弟家，摘下十万日元就走了。

于是产生了帝银事件的罪犯也是专门从事细菌研究的美军中佐所为的传说。一九五八年以后开始有人公然进行这样的推理——松川事件是美军派人干的。虽然由于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工会的努力，三鹰事件、松川事件的涉嫌者受到积极的保护，但是对于他们中间不幸丧命的无辜者及其遗族新闻界却置若罔闻，这也是局外人难以琢磨的怪事。

第九章 被骚扰与狂乱 搅动的岁月

（一九四九年——一九五〇年）

总司令部盯上了共产党

宛如宣告血染铁路的三大案件引起的波澜似的，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保守与革新势力的抗争使整个社会陷入惶恐与不安。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五至十七日接连三天，共产党在大阪贴出海报：“敦贺市连续发生奸淫妇女、掠夺财物事件。”实际上敦贺市不曾发生过这类事件，只是为了搅乱人心而捏造出谣言。为此大阪市警视厅逮捕了十二名党员。

在平市，警署嫌共产党在车站前竖起的布告牌阻碍交通，命令其撤走，共产党动员七百群众袭击了平市警署。把五名警官拽出室外拳打脚踢，把两人关进拘留所，占领了警署。仙台高级检察院以扰乱罪检举了其首领。在这段时期流血事件接连发生。

一九五〇年五月三十日，共产党的活动扩展到美军的烈士纪念馆，在皇居前的广场上召开了二百多个团体、一万五千余人参加的人民奋起大会。因便衣警察对大会的讲演偷偷做了记录，遭到工会会员、学生、朝鲜人的团团包围，有四名美国兵也被卷入这个旋涡，双方的殴斗酿成一场大乱。八名暴行嫌疑

者被抓起来，以此为契机，总司令部开始了对共产党的镇压。

被赤化、洗脑后返回日本的人们

这种左与右的冲突围绕着战败的后遗症——海外日本人撤退问题也表现出来了。终战时被弃留在广大战场上的日本人约有六百六十万。其中在美国、英国、荷兰地区的日本人顺利地返回了祖国。至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除极少数战犯被留下以外，其余日本人全部返日。

关于在苏联的日本人的遣返问题，依照总司令部与苏联缔结的遣返协议，决定每月由苏联送回五万人。可是，到一九四七年六月以后，每月送回的人数都不足五万人。因而，麦克阿瑟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三日和十月二十五日两次催促苏方加紧遣返并且要求提供破冰船。可是苏联坚持主张一切遣返日本人的费用要日本政府支付。美国方面反驳道：日本人乘上船以后的费用由日本负责，乘船以前的费用则由苏联负担。

于是，十一月送回三万零七百九十二人，到十二月对日理事会苏联代表德列比杨格通知总司令部：“明年开春以前船舶停航，遣返也中止。”

这样，大约六十万被扣留的日本人将不得不在西伯利亚度过终战后第四个寒冷的冬天。吉田正创作的歌曲《异国之丘》就是在那时流行起来的。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七日麦克阿瑟再次向苏方代表要求重开遣返工作。苏联到五月二十日才答复“五月至十月遣送”。

但是根据他们答复的数字，将送还的日本人只有九万五千人。据总司令部和日本外务省撤退归国调查室的统计，在苏日本人有五十九万四千人。两方相差极为悬殊。

重新开始遣送以后，遇到了种种麻烦。第一次遣送日本人回国的高砂丸由纳霍特卡港出发，驶入舞鹤港时已经是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七日。船上的两千名日本人，首先拒绝按复员处理。船一进港就高唱起“国际青年之歌”。狂热地欢迎这些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洗脑）的归还者的不是亲人的热泪而是共产党的哄闹。

在大阪，当四十三名归还者从月台上走出来时，其中有十一人对前来迎接的家属视而不见，只顾挥动红旗互相挽着手臂向站前阪神大厦的“产业别”事务所走去。到达上野火车站的归还者，大多数随着旗海人潮被引到下谷会堂去参加共产党举行的欢迎会。在人群中还听到“哪个混蛋敢不去，老子把他吊起来”的恫吓声。还有母亲哭喊着，阻止儿子“不要到共产党总部”去的场面。

随第二次遣送船大郁丸、英彦丸归国的两千入，船刚到舞鹤港外，在船内就召开了共产党国会议员大会，以至船入港时甲板上连个人影也看不见。

信洋丸事件的发生是七月二十二日夜里十一点左右。当船从纳霍特卡开出时，归还者团长森上宽一等七人说“面包干里生虫子了。”遂追究以船长内川彻夫为首的轮机长、炊事员、船医的责任。次日，在甲板上做卫生的水手不小心使水流到甲板的升降口，归还者们胁迫船长让水手“通过麦克风向群众赔礼道歉”，并于次日早晨把船长和两名复员军官吊起来命他们“召开座谈会，做出解释”。

传讯德田球一

对日本人的这种赤化教育是由英联邦的霍奇逊向对日理事

会提出来的。传说当时日共总书记德田球一向苏联当局提出要求：“俘虏的日本人不经共产主义教育，不能让其回国。”究竟是否确有其事成了问题。“如果这种流言属实的话，德田就是背叛祖国的叛徒，是重大的犯罪。总司令部麦克阿瑟对日本政府表示希望下命令处理德田的问题。”于是，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在众参两院决定要彻底搞清问题的真相。正当这时，三月七日翻译菅秀治向参议院驻外同胞归国特别委员会提出了他的亲手记录：

“去年（一九四九）九月十五日，我在苏联哈萨克共和国的卡拉干达市第九十九收容所第九分所担任所谓“德田要求”的翻译。那天从塔什干转移到这里的日本人被召集到一起。他们向政治部军官艾尔马拉耶夫中尉提出各种问题，据我的记忆，中尉是这样回答的：‘什么时候能返回日本要取决于你们在这里的良知和行动，你们要成为真正的民主主义者。日本共产党的德田球一先生也期待你们不是做为反动分子，而是做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归国’……”

因此，由参议院的驻外同胞归国特别委员会，对德田进行证人传讯。“绝对没有此事。塔斯社也否认有此事，你们如果不相信我说的话，请去莫斯科调查！”德田气得暴跳如雷。众议院的考查委员会也开始追究此事，一个接一个地传讯证人。

然而，四月六日夜七时半，重要的参考人菅秀治在吉祥寺一带，从奔驰的电动火车上跳下来自杀了。由于二十四位证人中多数人都肯定了德田确有其事，考查委员会判定德田的证词是伪证，⁴并下结论“共产党妨碍了遣返工作”。

正当为“德田要求”这件事纠缠不休之际，四月三日，苏联通知总司令部：“准备把日本俘虏送回，请派两条有两千床位

的船到纳霍特卡来。”这是为了避免日本国内对共产党的舆论压力进一步强化。四月二十一日，塔斯社宣布：“除了战犯两千四百五十八名以外，其余被扣留的日本人九万五千人全部遣返完毕。”但是二十二日，总司令部马上发表声明进行反驳：“终战以来有一百三十一万一千四百六十六人被从苏联控制的领土上送回来。但是据推算，还有三十万九千七十名日本人留在苏联。我们不认为已经遣返完毕。”

这时苏联所说的“归还完毕”纯属无稽之谈，真正的遣送完毕是在一九六五年日苏共同宣言缔结之后。

悲剧“祈祷天明”的真相

随着遣返日本人的问题突出起来，苏联虐待日本人的情况也暴露出来了。同时，在苏联的收容所里日本人之间的纠葛也被传扬开来。其中最严重的是被称为“乌兰巴托悲剧”或“祈祷天明”的吉村事件。

乌兰巴托西北部的羊毛厂被用来做为日本战俘吉村队的宿舍。队长吉村是一个三十六、七岁的男子，长着一双蛇蝎一样冷酷的眼睛。下巴颏儿方而宽。只知道他从前曾当过宪兵曹长。吉村这个姓是假的，真实的姓好象是池田。只是在被苏联抓去当俘虏期间迅速地升到中佐的地位。所以能当上队长，是由于他与俘虏中一些懒汉、无赖勾结在一起，又有蒙军收容所所长撑腰。

吉田给队员们规定了苛刻的劳动定额和残酷的私刑体罚。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早饭前每人必须从两公里以外的山上运回来两根木头。早饭后，连续八小时烧砖、纺羊毛、凿石头。下午四点去收容所旁边的河川收木筏子，直到晚上九点半才结

束，然后吃晚饭。

完不成定额的人不仅不给饭吃，而且处以严厉的私刑体罚。“祈祷天明”就是私刑体罚的一种形式。受惩罚的人被脱光了身子绑在树上，站在户外“祈祷天明”。腹中空空加上天寒地冻，大部分男子汉都忍受不住，天明时只听见低低的啜泣，然后就断气了。吉村和他的喽 哏们却一边欣赏同胞的惨状，一边饮酒作乐。

一九四七年十月，当决定让他们返回日本时，吉村把大量的土特产分给他的帮凶，离开这里开往纳霍特卡。但是吉村的残忍在俘虏的队伍里已经传开了。在纳霍特卡，俘虏中的民主小组的委员们决定把吉村交给人民审判。结果只有吉村一人被留下，送到内地的采伐队去劳动。在做出这样决定的时候，吉村队的人们只希望他在那里永远不死不活地受罪。此后，在无人问津此事的情况下两年过去了。

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吉村队的记录》由报纸、杂志刊登出来；同胞们无端遭受虐待的惨状被公诸于世。当时身受其害的队员和目击者纷纷给《朝日新闻》写信，以他们反映的情况为线索，终于搞清了吉村队长已经返回日本，隐居在长崎县福江岛富江町。

吉村的本名叫池田重善，由宫崎县东臼杵郡南乡村小学毕业后就务农了。据他的同学和村里人反映，池田没有暴烈行动，是个很平庸的人，看不出有那么狠毒的心肠。但是，也有人说他“在当宪兵的时候趾高气扬，擅于吹牛皮说大话”。由此看来，这个人或许本来就具有内在的残忍，后来受到军队那种野蛮的外界刺激促使其迸发出来了。

原吉村队的队员吉川 崋作和笠原舍三，了解了吉村的住所遂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参议院的驻外同胞归还委员会也着手

查明事件的真相。被该委员会叫来答询的吉村，也就是池田，花言巧语、口若悬河地为自己辩解，最后他说：“我使用假名字也好，当队长也好，让队员们吃苦也好，这都是奉命干的。”大概他以为只要把一切罪行归咎于上级命令就可以搪塞过去。因为日本军队的习惯就是一切行动听命令。可是，站在证人席上的十余名队员岂肯罢休，一齐以坚决、强硬的语气说：“我们都受过长达十四小时的‘祈祷天明’处罚。”“在两年时间里，由于过度劳累，数百人住院，三十余人死亡。”

东京地方法院以涉嫌非法监禁致死罪逮捕了吉村，最后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此外，还有遗留在海外的幸存者的悲剧——“阿那达汗女王”也是颇有影响的事件。一九五〇年秋，顺路经过马利阿那群岛的美国船，从岛上救出一位女性，并把她送交日本的归还援护局。她的名字叫比嘉数子，与丈夫菊一郎曾经住在阿那达汗岛。一九四四年六月，在这周围的海上有几只船被炸沉。三十一个日本军人和家属一同从沉船上游到这个岛上存身。

这群男人中只有她一个女人。一九四五年终战的消息他们也无从知晓，继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菊一郎死后，她有了三个丈夫，为了争夺她，发生了男人们的争斗。根据她提供的情况，美国海军又把遗留在岛上的男人救出来，那是在翌年七月。比嘉数子终于未能逃脱人们猎奇的目光。从美国来到日本的著名影片《外国人部队》的导演约瑟夫·冯·斯坦巴克到底还是把她拍进《阿那达汗女王》这部电影里去了。

自行车赛大都是“双簧”式假比赛

政府之所以让地方自治体经营自行车赛这种赌博方式，是

为了给遭受战灾的都市筹措经费。以“确立地方财政”和“振兴自行车出口”为目的，一九四八年八月确定了自行车比赛的规章。

以同年十一月份在小仓举行的自行车赛为开端，一九五一年度有十九个都道府县、一百零一个市町都成立了主持比赛的自治体。达到了空前的盛况。从举行比赛的次数和收入来看，一九四八年为六次，二亿四千万日元；一九四九年为一百六十一一次，一百三十五亿日元；一九五〇年为四百八十九次，三百三十亿六千万日元。国家抽取二十一亿二千万日元入国库，主持者市、町、村政府的纯收益四百零六亿五千万日元。

市、町、村政府用这笔钱迅速进行复兴建设。至一九五〇年末大宫市新建的十座校舍，其中九座是以自行车赛的收益为财源，佐贺县武雄町年间预算二亿五千万日元，其中有二亿仰仗自行车赛的收益，居民税下降，收税标准之低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以这种自行车赛的收入为财源复兴的城市相当多。

然而，到一九五〇年，由自行车赛而引起的纠纷接连发生。二月五日，川崎市经营的比赛酿成一场骚乱。在第九场比赛中，优胜者内山的自行车脚蹬子差一点儿没有接触到终点线，被裁定无效。已经买到与优胜者号码相同的赛车券的二万观众眼看赢到手的钞票化为泡影岂肯善罢甘休，场内哄然乱作一团。出动武装警官一百八十人前来维持秩序，乱民们把警官打翻在地，放火烧了选手休息室，砸烂售票处的窗口，抢掠了约六百万日元的车券，然后纷纷逃遁。

以此为契机，警察当局开始侦寻自行车赛的内情。演“双簧”式的假比赛被连续揭发出来。首先搜集了二十八名甲级选手作弊的证据材料，然后逮捕了操纵这些选手，经营假比赛的头目光村隆正。但是这个男人却满不在乎地承认“百分之九十

的比赛都是事先确定谁胜谁负的假比赛”。可见，自行车赛这种赌博方式的弊端之大。

因此，自行车赛是否还应当存在下去也就成了政治问题。吉田首相倾向于废除，而通产省自行车振兴会、地方自治体等机构出于财源上的考虑主张保留。经吉田首相与横尾通产相磋商，决定“修改完善比赛场后继续保留。”

从一九四八年开始搞自行车赛至一九五八年，共举行比赛六千三百四十四次，收入五千五百零八亿五千零五十四万六千日元。数目相当可观。其中百分之十——五百一十七亿三千八百一十二万三千日元是主持比赛的地方政府的收益，将这笔收入用于住宅建设、教育投资、土木、修建、社会福利措施、扶助中小企业，解决失业问题等。

后来，从一九五八年秋开始，新闻舆论界又为自行车赛的废留问题掀起风波。评论家大宅壮一等人认为自行车赛是不健康的娱乐，是产生犯罪的温床，应该坚决废止。兵库县知事阪本腾、京都市长高山义三认为没有自行车赛也可以解决财政困难，决心要废止。

以自行车赛为得力财源的地方政府主张继续保留。平塚市长户川贞雄提出了“自行车赛丑妻论”，——把自行车赛比喻为丑女人。他说：“开始时政府明知它是个丑女人，但是因为它是棵摇钱树，就把它匹配给地方政府了。对地方政府来说，虽说这是个丑妻，但能赚钱。所以，如要让他们离婚，政府就得设法给地方政府以财源保障。”

贪污，抢劫，都是“噢，错了。”

一九四九、一九五〇年发生的公团违法事件颇多。公团，

是战后做为新的统制方式由政府出资设立的机构。以一九四七年产生的产业复兴公团为开端，很快地十五个公团相继问世。后来经过整顿，只保留粮食、肥料、纤维矿产品、产业复兴、价格调整、船舶七个公团。

一九五〇年四月矿产品贸易公团的营私舞弊活动败露，一个名叫早船惠吉的二十四岁的职员占据了八千万日元以上的巨额公款。

该公司规定，矿业部进口铁矿石、煤炭等所用款项，在交给通产省之前暂时在市中银行做为合伙使用资金存起来。以早船为首的一些不守本份的职员，利用这段期间以自己的名义或妻子的名义存款来赚取利息，或把货款借给有关公司牟取高额利息或回扣。此外，公团把进出口物资交仓库公司保管，在加保险的时候，职员们便从仓库公司赚取回扣。

四月十七日设在筑地署的搜查本部以涉嫌侵占二万日元公款逮捕了三个课员，十八日又传讯了课长。早船携妻子真锅荣子已逃走，但十九日早晨两人又回到筑地署投案自首。

趁此机会，中央经济调查厅从一九四九年九月至一九五〇年三月，对公团的经理进行了审查，发现浪费国家经费五十一亿四千七百万日元以上。因而警视厅开始对各公团进行调查。于是，各公团同样都有渎职罪嫌疑被列为审查对象，陆续逮捕了肥料公团的铃鹿总裁、吉江副总裁和经理课长、价格调整公团的经理部长、船舶公团的资材课员等，各个公团成了贪污魔鬼的宫殿。

社会上也有各种不法经济活动泛滥。其主角是“私设银行”的地下金融公司。“光俱乐部”事件最为典型。

在银座设有办事处的地下金融公司“光俱乐部”的老板是

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东大法学部三年级学生，名叫山崎晃嗣。他曾有一段戏剧性的经历。他结交了许多上流社会的女性，后来苦于金钱、美女不可得兼企图自杀未遂，为此一时成为世人瞩目的人物。

这个时期的犯罪不仅数量大而且花样繁多。最高检察厅曾有统计：一九四九年全国送到检察厅的嫌疑犯罪者比上一年增加三十五万人，达二百五十万人，平均每三十四个国民中就有一个嫌疑犯。

劫持日大汽车事件发生在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二日。当天下午二时左右，日大会计课员八木下弘与公务员金山忠一到银行去支取日大教职员九月份的薪金一百九十万日元。当他们乘小轿车返校途中，司机佐藤的朋友山际启之拦车要求搭乘。山际坐进车里便掏出大折刀，胁迫佐藤将车开到了劳动省大楼。山际向八木下弘的脖子捅了一刀，夺过装着现金的皮包，命三人下车，然后自己驾车逃跑了。

山际是一个受过文身的无赖司机，可是这样一个恶棍却使日大教授藤本藤次郎的女儿佐文（十八岁）为之倾倒。案发后，二人一同逃到大井町的低级旅馆隐蔽起来。由于旅馆主人的告密，二十四日被大森署逮捕。从作案至逮捕才不过两天时间，已将抢劫的钱花掉三十万日元了。

山际与佐文在大森署面对面坐在椅子上，一面调笑，一面用流畅的英语聊天。面对采访的记者团，山际以俨然公正的姿态说明自己的行动：“噢，是错了。”

在上述贪污案件中被逮捕的早船和他的妻子、东京的美人真锅荣子，地下金融公司“光俱乐部”的老板山崎，以及与他交往的女人们，还有劫持汽车的山际和女友佐文——这些一九

四九、一九五〇年时的年轻人都是战后派——地道的虚无颓废派。

可怜的国宝化为灰烬

在这一时期，许多文化遗产被烧毁。

奈良县斑鸠町——法隆寺的金堂起火，那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发生的事。上午七时左右，火舌喷吐而出，直至下午九时后才被熄灭，建筑面积四十七坪的佛殿全部焚毁。在十二张名贵壁画中最负盛名的西方阿陀净土巨幅画上面有三处被水滋成大窟窿；释迦大壁画的四分之一脱落，日光风景、观音菩萨等小幅壁画也在脸部、臂上有破损——做为国宝珍品的壁画损失大半。

在距今一千二百年至一千三百年以前的和铜年间建造的法隆寺金堂是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物，要想重新仿造被烧毁的内大殿，已经没有那时的工艺了。还有继承了印度中部马吉扬塔以及波斯湾等地古代美术风格，吸收了中世纪欧洲的湿绘法画出的壁画，从一九四〇年就开始复制，但是刚刚画好八成左右就被烧毁了。这场火灾是由于电褥子过热引起的。

与这次火灾没有直接关系，二月三日偶然发生了奈良地方检察院逮捕了法隆寺的执事吉田觉胤的事情。因为吉田在法隆寺火灾发生的一周前，在弥勒院门前放了一些涂抹过升汞水的馒头，有为讨好施主，欲毒害住在弥勒院内的保健妇上森纪美之嫌，其幕后有丑恶势力相争。

但以此为契机，引起了人们对抢救国宝和其他文物的关注。至少这一点是值得庆幸的。据说当时有百分之三、四十的国宝面临毁灭的边缘。属于中世纪藤原文化范畴的中尊寺等从一九

四七年开始就已经漏雨了。文部省要求拨款七十万日元以便修复，但只拨给一万五千日元。

关于国宝被焚的情况，后来在三岛由纪夫笔下被赋予小说一样戏剧性色彩的是金阁寺的火灾。那是一九五〇年七月二日，京都盆地的天气闷热，使人透不过气来，早晨二时五十分左右，刚刚凉爽一些，就发生了这件事。位于京都市上京区衣笠金阁町的临济宗相国寺里的鹿苑寺——俗称金阁寺，院内国宝金阁浓烟弥漫、火光冲天，全市的消防署派出的十辆救火车飞驰而至。可是，这时房顶上的薄木片已经喷火，南北五间半、东西七间楠木板建造的三层楼化成一片火海，保存在楼内的足利义满的木像和诸多美术珍品全部同归于尽。

原来是有人放火。罪犯好象是鹿苑寺的徒弟林养贤（二十一岁，大谷大学进修生），因为起火前，这个人便消声匿迹了。二日夜里七点半，搜山的西阵署警察在金阁寺后面的左文字山的山坡上发现了她，但已然服了毒，正在痛苦的弥留之际。他一边痛苦地喘着气，一边供出了自己放火的动机。

——因为我的身体有生理缺陷。幼年丧父，来到金阁寺当徒弟。这种环境使我对人生完全绝望了。对金阁寺的美怀着深深的嫉妒；旷课，逃学，堕落成为倒卖稻米的掮客，遭到同学们的鄙弃，我决心轰轰烈烈地死去，以显出英雄本色，所以才火烧金阁寺。

为了承担儿子的罪责，林养贤的母亲志满子在山阴线的列车开到保津——马堀之间，纵身从车门跳出，落入保津川引咎自杀。

汤川博士获诺贝尔奖金

在这个时期，文化方面的二、三事也值得一提。首先是汤川秀树博士因发表中子论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从理论上预言了在原子核中存在一种未被发现的新粒子——他称之为中子。那是在一九三五年，他仅仅二十九岁对人类做出的重大贡献。一九四九年十月，他为此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日本人。

其次是轰动一时的查塔莱事件。那是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六日，警视厅依据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的“散布黄色书籍罪”对小山书店发行的《查塔莱夫人的情夫》（D·H·劳莱斯著，伊藤整译）一书提起公诉。

对此，日本文艺家协会、“笔会”等团体联合起来为捍卫“表现自由”，为肯定这部作品的艺术性进行斗争。这一案件的审理花费了一年零四个月。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八日东京地方法院宣判：出版者小山久二郎罚款二十五万日元，译者伊藤整无罪。可是在东京高级法院第二审时宣判对翻译伊藤也罚款十万日元。最高法院支持第二审的裁定：“不能因为艺术性而允许淫秽的东西存在。”

靠朝鲜战争“特需”而复苏的日本经济

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围绕着扣留在苏联的日本人的归还问题美苏之间的磨擦，在日本国内以自由党、总司令部为一方与以共产党、工会为另一方的不断发生激烈冲突，这是美苏对立给国际局势投下的阴影。

这种全球性对立的爆发现点，就是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开始的朝鲜战争。它给日本带来了“朝鲜特需”。与朝鲜半岛一衣带水的日本，作为美军的前进基地和补给基地，美军从日本购买物资和劳动力，这就是“特需”。经济企画局制定的《特需契约五年概要》写道：

“由朝鲜战争而来的特需，到一九五五年六月满五年了。在这五年间，特需契约的金额创十六亿一千九百万美元的记录。它把当时我国走投无路的产业界从困境中解救出来，为改善国际收支平衡做出了重大贡献。

“契约物资的内容也发生了以下变化：在最初的一、二年间，汽车和纤维制品占很大比重。第三年开始供应武器以后，武器立即上升为第一位，煤碳从第二年以来一直保持第二位。第四年和第五年，前四位没有变化。由此可见，特需物资的内容基本是固定的。另一方面，服务契约开始是运输和汽车修理居首位。第三年开始，建设占第一位，与此同时，伴随着日本的独立，电信、电话服务也骤然上升。机械、兵器修理随之猛增，接着，飞机修理也显然上升。”

从以上的记述可以看出，朝鲜特需使得由于道奇路线而降到低景气的最低点的日本汽车、纤维、土木建筑、机械等企业一跃而变为兴旺发达。因此，企业的体质得到加强，使日本经济总体能够独立。不妨以丰田汽车公司在“举母”（现在的丰田市）的分厂为例来看一看。

据《每日新闻》报道：“去年以来道奇路线的严厉影响波及到这里，举母工厂生产的汽车全然卖不出去，资金周转不开，出现了拖欠工资的严重情况。去年六月以来，工厂和街面上显露出浓厚的忧郁气氛。去年四月传出工厂要解雇百分之三十职工的消息。工会方面展开了罢工斗争……举母市的各种物价猛

跌，连理发店都面临倒闭的危险。吃茶店、咖啡馆、饭馆、舞厅等所有场所都冷冷清清，如死去了一般……。举母工厂解雇一千六百名工人，全丰田汽车公司解雇二千三百名工人。

这时丰田公司大约负债十五亿日元，已经完全被金融界放弃，因为如果按规定还要支付退職金约三亿日元。结果以符合‘自动退職，的第一号规定，用七千八百万日元好歹把裁减人员这一棘手问题对付过去。公司的首脑们意识到这回该轮到自己了，公司的创始人丰田佐吉翁的嗣子、东京大学工科毕业的丰田喜一郎，原东京大学教授、副总经理、工学博士隈部一雄也与职工一样失业了。工厂已经濒临破产的边缘。

六月上、中旬公司领导层决定，为刷新阵容，再造丰田而改变经营方针。总理由丰田自动织机公司的现任经理石田退三兼任，他是旧丰田财阀的警卫武士头领，素有“经营管理的奇才”之美称。正在这时，爆发了朝鲜战争，随之而来的是需要丰田提供卡车的庞大特需。

如果做为特需生产，那将是现金交易，那么资金周转就不成其为问题了。于是公司方面立即着手制定新的生产指标，结果，提出了八月份生产七百五十辆（小型车三百八十辆），九月份增产一成，十一月份一千辆（小型车四百辆），到年末总产量增产百分之五十的生产计划，并雄心勃勃地准备来年达到设备能力月产一千二百辆。工会方面表示指望尽快地把月工资提高到二千日元，愿意进行配合增产。

这场朝鲜战争除了带来特需之外，另一个副产品就是警察预备队。麦克阿瑟总司令指示吉田内阁：“需要新建一支七万五千人的警察预备队，海上保安厅的编制要增加七千人”。在野党攻击这是“建立军队”、“违反宪法”。吉田反驳道，“日本也有

自卫权 ”“这不是重振军备 ”。

这支警察预备队后来改为保安队，一九五四年七月改称防卫厅——自卫队。

第十章独立前后的怪事

(一九五一年 — 一九五二年)

犯人有犯人的推理

旧金山对日和平会议即将召开的一九五一年五月，麦克阿瑟发表了惊人的言论：“日本还是个十二岁的少年。”他在四月份因朝鲜问题被杜鲁门总统罢免，驻日美军总司令由李奇微接替。

由于原总司令的身份，五月三日至五日麦克阿瑟应邀出席上议院外交、军事合同委员会，会上他作证说：

“在科学、美术、宗教、文化的发展上，安格鲁撒克逊人已经是四十五岁的壮年了。德国也这样。但日本却还处在小学生时代，是一个十二岁的少年。”

这句话在一段时间里曾成为日本人自我揶揄的通用语。

但是就在这一年，在湛蓝的金门湾和太平洋环抱的旧金山，召开了对日和平会议，日本社会与素日一样平静，并未因此发生什么骚乱。媾和的气氛有助于经济的安定，社会心理状态也是明朗而镇静的。

虽说是个安定的年头，但需要载入史册的事件也是有的。最悲惨的是樱木町的国铁电车失火事件。四月二十四日下午一时四十分左右，有五节车厢组成的国铁电车眼看驶入樱木町车

站时，最前面一节车厢的导电架突然起火，瞬间连在一起的车厢变成一条火龙。

满座的乘客都拚命地想逃出去，可是无论怎样敲打也开不开窗子，因为这种六三型电车的窗子上有三条横隔，即使砸碎玻璃也钻不出去。就这样，烧死一百零七人，轻重伤九十余人的国铁空前大惨案顷刻之间就发生了。

还有属于特异性犯罪的八宝亭事件。这是个隆冬的寒夜，在离筑地警察署不远的中国风味的菜馆八宝亭里，主人岩本夫妻与长男长女四人被人用劈柴砍死，以他家雇用的山口常雄发现了这一现场为开端，一桩离奇的好戏就从这里开场了。

设在筑地署的搜查本部听了山口和姓刘的中国厨师介绍的有关情况，断定这是一桩了解内情的“内部相杀”案。

据山口和刘厨师讲：在案发的前一天，一位名叫太田成子、年龄约二十五、六岁的女人来到菜馆说：“我看到了招募女佣人的广告，是来求职的。”于是她就住进了八宝亭。可是在发现作案现场时却见不到她的影子了。另外，还有一件事，一个女人拿着八宝亭现场丢失的永乐信用合作社的信用卡，来到永乐信用合作社要求提取十四万元的存款。并且，山口作证说：“大约午夜一时左右，一个男人来到八宝亭找那个被雇的女佣人，好象是她的什么亲戚。”因此搜查本部认为是那个女人伪装成佣人蒙混进来给那个男人——杀人凶手做内应，以实现“内部相杀”的方案。

可是，不仅那一男一女逃走的踪迹无从查找，连他们的去向也无蛛丝马迹可循。大约六天以后，那个可疑的女人在中央区小田原町露过面，那个可疑的男子似乎也曾到永乐信用合作社去过。但除此以外，对他们的行迹全然不清楚。

山口把自己写的“我的推理”寄给了朝日新闻社。“那一男一女都好象在看书的样子，所以我未能看清他们的面目，也许是怕人看清他们而心怀鬼胎吧。几乎一句话也不说。午夜一时左右来了电话，那女人去接电话，只听见她‘是、是，地答应着，没说别的。看样子那女人是农村出身，男的象是个坏蛋。现在估计他们已经各奔东西了。”

搜查本部听说与那个名叫太田成子相似的女人住在新宿，遂对她的身世进行了调查。原来她名叫西野艳子，原籍在静冈县田方郡，现在暂寄身在他哥哥家里，住在千代区永田町的安藤公寓里。但是通过调查也搞清了西野与山口有关系的事实。于是把她带到赤署加以审问。

她坦白说：“那天夜里在八宝亭的女人是。因为我与山口相识，才到八宝亭来做事的。山口杀人以后去过信用合作社。”几经周折终于搞清了真正的杀人犯不是别人，正是这个花言巧语协助当局破案的山口。三月十一日黎明，山口在筑地署第四号拘留监房里饮氰化物自杀。

民间广播之花盛开

一九五一年也是民间广播兴起的年头。由电波新闻导致的生活革命，就是从收听民间广播开始的。

最初开办的民间广播电台是中部日本广播（CBC）和新日本广播（NJB）。他们把第一声播音送进千家万户是在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随后，朝日广播电台（ABC）、无线电九州（RKB）无线电东京（KR）、东京广播（KHK）相继问世。民间广播之花盛开。

为筹措兴办民间广播电台，曾经遇到了诸多麻烦。首先是

财界对民间广播事业的理解浮浅。绰号“广告王”的电通通信社上田碓三和吉田秀雄都认为搞商业广告节目划得来，而财界的一些人却认为“商业广告节目虽然有趣，却不见得能赚钱。”唯独小林一三说：“收听费不该都归官办的日本广播协会（NHK）独占，民办广播电台也该赚一部分。”

其次是遭到以日本广播协会为中心的通信官僚的反对。再者就是总司令部的反对。总司令部这一关没有通过：“在饥饿的日本，哪有人当主顾！”就这样给驳了回来。

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在对日理事会上，苏联代表特列比扬克说：“在占领政策下，广播事业还是由政府垄断为上策，因为兴办民间广播需要庞大资本，如果偏重巨商豪富，将被反民主团体利用。”以此为理由反对开办民间广播，主张维持现状。

但是入秋以后，总司令部迫于国际形势和日本情况的变幻，转而采取“承认民间广播”的方针。吉田内阁对此兴趣索然。尤其是吉田首相本人对新闻界一向厌恶：“为什么要允许民间办广播？请总司令部拿出指令来！”“阁下的悬念是杞人忧天。”由于麦克阿瑟满怀自信，吉田茂才终于承认了民间广播。于是允许兴办民间广播的三个法案得以在国会上通过。这时距战败已经快五年了。

至九月三十日达到高潮，申请开办民间广播的竟超过七十二个公司。电波监理委员会进行了淘汰，只承认其中取得审查许可资格的四十二个。

在这民间广播之花盛开的时候，迎来了一九五一年的春天。电波监理委员长富安风生预见到民间广播电台将对国民的言论、生活产生莫大影响。四月二十一日，该委员会又给十六家广播公司以预备许可。

潜心良苦的第一声

这十六家广播公司从批准之日起立即着手开业的准备。广播员的招聘也是其中之一。在筹建新日本广播电台时，曾担任过每日新闻事业部部长的小谷正一请当时正在病榻上休养的评论家高田保提意见。高田说：“对于广播事业我是门外汉，但我想应该招贤纳士，网罗高智能人才，那样就可以搞出别具一格的广播形式。”高田的主意切中要害，后来的民间广播就是使那些不是播音员的评论家、作家、记者以及其他外行，或者夸张一点说，使全体国民都关心它，成为它的编外播音员或导演，从而取得高收听率和高信誉。

与此同时，商业广播节目也是颇费心思的。这时已成为广告主顾的公司对于其效果将如何也是疑疑惑惑的。象服部钟表店那样早就期待着这一天，研究美国的商业广播，着意利用“报时”节目时间收听、对表的人最多的时刻，把本店的广告播出去——应该说，持这样态度的公司那时是极个别的。

但是象盐野义公司的“企鹅节目时间”、明治糕点公司的“鞍马天狗”、松下电器公司的“轻音乐”、森永乳业公司的“村冈花子妈妈”、狮牌牙膏的“有奖游戏”、丸美屋的“三环乐谱帖”、三共制药公司的“医学问答”等等商业广告节目，都是很成功的。

尽管这样，在开始播音的前一夜，气氛是相当紧张的。不妨把《民间广播史》记载的当时新日本广播电台的状况抄录如下：

盛夏之夜，在仓促建造的播音室里，电台的成员都热得只穿一件汗衫和短裤，全神贯注地跑前跑后，忙个不停，连续六、

七天彻夜加班已经司空见惯了。由于疲劳，在走廊的临时医务室等待注射维他命的人排成了队。“今后每天都要这么干了吗？”广播电台台长小谷忧心忡忡。忽然接到中部日本广播电台的铃木台长打来的长途电话：“不管成败如何，让我们一起干吧！”就说这么一句无关紧要的话。小谷以为没有什么事，随手就把电话听筒撂了，可是就在放下听筒的瞬间，小谷恍然大悟：铃木的话是要采取‘统一行动’的意思呀！于是在九月一日上午五时半，从新日本广播和中部日本广播两家电台里同时传出了民办广播的第一声电波。当天恰好前去参加旧金山会议的吉田内阁全权代表们正越过太平洋向美国飞行。

敲响了开场锣鼓的民办广播电台，首先别出心裁地来个“陪礼道歉”：“广播员有发音不准确之处或因时间短促上下节目之间有中断时，请听众谅解。”但这样做反胜官办NHK一筹。因为别开生面的新花样给听众以清新悦耳之感。

对民间广播来说，经营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出售时间”的商业广告节目究竟合算不合算。NHK内部非正式设立的商业广播对策本部得出的结论是“民办广播的商业广告充其量只能搞上一年半载的。”

在民办广播电台内部也规定商业广告只能占全部播音时间的三、四成——不能超过六小时以上。因为超过这些时间，没有那么多广告主顾来托办广告还是赚不到钱。甚至还做好了经济上“连续三年亏损”的思想准备，这是所有民办广播电台悲壮的决心。

可是，新日本广播九月份平均每天出售三个小时商业广播，十二月增至五小时，转年一月又超过了六小时。中部日本广播虽然未能避免九、十月的亏损，但十一月就开始有一千万

日元的黑字了。

流血的“五·一”所显示的不安定气氛

一九五二年是旧金山和平条约、日美安保条约生效，日本结束了被占领状态成为独立国家的一年。也是围绕“独立”问题，保守与革新之间展开暴力斗争的一年。

一年前小田原造纸厂的工会会员们把练马署派驻旭町的巡警印藤诱骗到人迹罕到之处殴打至死。工会运动的暴力化倾向由此表面化了。进入一九五二年以来这种倾向与日俱增。一月二十一日，在札幌市南六条大街上，日共党员枪杀了中央署的警备课长白鸟；二月三日，在长野县南佐久郡田口村一伙骑着无灯自行车的日共党员把五位巡警团团围住，痛打一顿，抢了巡警的枪枝仓惶逃遁。

全学联的学生们也搞起了暴力行动。二月二十日在东大法律、文学、经济系共用的第二十五号大教室里，东大剧团主持的小林多喜二祭奠正在进行着，部分学生发现三名本富士署的警官混入群众之中，遂以暴力夺取了警官的笔记本。东大方面尾高朝雄教授表示：“非法混入会场的警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强调“大学的自治”，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警视厅方面，田中荣一总监认为“毫无疑问，既使在学校内遭受暴力，也理应行使警察权。”双方对立起来。

第二天的纪念殖民地斗争日游行又发生一系列过激行动。在大田区，五十余人揪住正在巡回值勤的警察，先给其带上手铐，然后抢其枪枝弹药。接着又袭击了派出所，砸碎玻璃、电话；在池袋区，聚集到小田原造纸厂的二百人，在东上线成增车站的月台上用氨水袭击警察队伍；在涩谷区，一百二十名学

生因搞暴力活动被涩谷警署逮捕。

警视厅和检察厅认为这是日共有计划地唆使其下层组织以“青年祖国队”、“国民青年团”、“全学联”为中心展开的暴力活动。遂决定采取彻底追究的方针。

吉田内阁向正在召开的通常国会提出了以解散、处罚暴力团体为目的的“破坏活动防止法”。当然，这也不失为防止日共暴力化的对策。与此相对抗，工会总评议会，为反对“破坏活动防止法”而于四月十二日与十八日举行了大罢工。

在这样不安定的气氛中骤然暴发了“流血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事件。那天，在明治神宫举行的庆祝活动结束之后，与会者按五个地区分开进行游行。以东京都学联为中心的二百人行进至日比谷交叉口时与警察发生冲突。政府规定，禁止使用皇宫前广场，这使游行队伍反而激奋起来。不一会儿，朝鲜人、临时工的队伍也汇合进来，约六千人蜂拥进入广场。

前来制止的五千名警官与群众搅在一起乱成一团。游行队伍中，有人投掷火焰瓶，把停放在护城河一端的十三辆美军汽车烧毁，并把美国兵扔进护城河里。这是在烟雾弥漫之中的流血格斗。死亡两人，重伤一百人，轻伤四百余人。——一场地道的“街垒战”。对于这场惊动海外的流血事件，以骚扰罪逮捕了一千二百三十名有关人员。

警视厅还采取了强硬措施，禁止五月二十日、五月三十日的纪念游行活动。但是那一天，工会会员、学生、朝鲜人全部出动，到处点燃暴力活动的烈火。三百名暴徒洗劫了板桥町的上岩之板派出所，投掷硫酸瓶和石块，十三名警官有三人被暴徒击毙。其余警察好不容易坚持到救护部队赶来才脱险。另有五百余人的游行队伍在新宿车站附近用火焰瓶、石灰粉袋袭击

警官队，演出了一场闹剧。

七月十五日是“七·一五”纪念日，在东京、旭川、京都都有暴徒们的活动。八月，在披上了青纱帐的埼玉县比企郡大河村发生了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三名青年刺杀前国会议员横川重次的暴力团事件。

别了，殖民地风光

战败以来七年间，在日本到处可见的殖民地景象这时开始悄悄消失了。就象电影银幕上的“淡出”（渐隐）一样，“好象已成为独立国家”的标志也象电影银幕上的“淡入”（渐显）一样渐渐清晰起来。

被美军接管的比赛场、高尔夫球场、港湾设施、学校、个人住宅等等从一九五二年三月开始解除占领，分别回到原主人的手里。至四月二十八日归还了一般设施一百四十二处，私人住宅一千九百六十七处。

在东京，总司令部的留守人员从第一生命保险公司的大厦里搬出来，住进市之谷的旧陆军省——清静的公寓大楼。六月十四日，设在银座四丁目服部钟表店供美国人专用的“PX”商店也被限定于八月十七日以前撤消，物归原主，这个被美国人占用了七年的服部钟表店又回到主人服部之手。以在菲律宾战死的美国随军记者的名字命名的“阿尼·帕伊尔”剧场（东宝剧场）也归还给东宝。六月三十日大阪的新大饭店也毫不例外地归还了原主。随之而来的是挂在这些设施上的牌子和字号被一一取下来，至少从视觉上感觉到了殖民地风光的消失。非视觉所能感受到的变化是四月二十六日做为最后一步，解除追究战犯命令，至此，日本全部解放了。

木星号坠毁

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羽田机场归还给日本，重新用做国际机场，有如独立带来了一颗灿烂的珍珠。但是，不久又由日美共同管理了。

不消说，日本的航空事业从飞机的生产到航运都被占领政策加以禁止了。经财界和航空事业有关人士对总司令部的多方运动，终于获准设立日本航空公司，但已经是旧金山会议召开的一九五一年了。领导成员有会长藤山爱一郎（后任外相），经理柳田诚二郎，专务董事松尾静磨。

日航首次飞行始于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开辟了东京至福岡、札幌的国内航线。

最初，飞行的班次很少，乘客清一色都是公务在身的出差人员。一九五二年四月九日发生了木星号坠毁事件。

木星号的机长斯丘华特于三月十五日刚刚走马上任。他是美国具有八千小时飞行经验的航空老手，对于那天风雨交加的恶劣天气他也全然没当回事，如往日一样照常起飞了。飞机载着八幡钢铁公司的经理三鬼隆、漫谈家大辻司郎、自由党事务局长森直次、珠宝商小原院阳子等三十七名乘客离开羽田机场向福岡县板付飞去。二十分钟以后听不到木星号对飞行管制系统的回答。飞机下落不明。一场骚动随之俱来，航空厅、海上保安厅、美国空军立即出动寻找。可是坠毁的情况还不明了，国家警察署静岡县本部却发表消息说：“美国第五空军搜索机在浜名湖西南十六公里处的海上发现了遇难的飞机，美国救护艇立即赶到，全体乘客得救了。”某家报纸信以为真，竟然在夕刊的都内改造版里报道说：“全体乘员脱险”。九州的一家报纸搞

得更加离奇，竟然盲目地预先捏造了“采访大辻司郎先生的谈话纪实”等报道材料。

但是，实际上与美国救护艇“苍鹭”、“凡克莱斯特”尚未取得联系。面色惊慌、忐忑不安的六十位罹难者家属蜂拥而至日航公司。在经理办公室，藤山、柳田等八名干部焦灼不安，表情沉痛。

下午八时半，当松尾专务董事说“传说已被抢救脱险的情报难以置信”时，一阵嘈杂哄然而起。十时半，美国远东海军司令部发言人正式发表谈话：“美国运输船已经通过无线电与前去搭救罹难者的两艘救护艇取得联系，确切的结果是无一人得救……”

追究坠毁的原因

十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已经连续搜寻了三个小时的日航天恩号搜索机发现了木星号的残骸。地点在距离三原山喷火口东侧一公里、高两千英尺之处。已化为残骸的硬铝制机翼斜着刺向青天，在阳光照耀下反射出无机物特有的冷森森的光泽，引起了搜索机的注意。全体三十七人无一幸存。至于坠毁的原因，由于那时和平条约尚未生效，仍在占领政策下，未能彻底究明便不了了之。航空调查会的结论是：“据推导，由于航空管制的混乱和飞机操纵者的失误，致使飞机撞在三原山上坠毁。”

木星号起飞前接到航空管制塔指示：“经馆山、大岛飞往大阪，飞行高度六千英尺，过馆山再飞行十分钟改为二千英尺高度。”但旋即又订正方才的指示：“从羽田机场出发后飞行十分钟就改为二千英尺高度。”机长高声复述一遍，就离陆起飞了。按照以往的情况，离开羽田机场后要立即升高到六千米以上，

可是那一天美军飞机正在羽田机场上空二千英尺高度待命。正在航行的飞机约十余架。或许是为因此而订正前一道命令的。

起飞后约三分钟，从正在飞越馆山的木星号上发回了某种信息。令人费解的是，对于它发回的报告竟有两种记录。

其一是约翰逊基地航空本部的记录：“上午七时五十七分通过馆山，高度六千英尺，预定上午八时零七分到达大岛的上空。”其二是接收飞机与地面联络信息的东京监听器——航空管制的记录：“上午七时五十五分飞越馆山上空，高度二千英尺，继续以二千英尺高度向馆山南面飞行十分钟后上升。”把两个记录比较一下，一个是“通过馆山后高度六千英尺”；一个是“向馆山南面飞行十分钟，高度二千英尺”，显而易见，在飞行高度上相差极为悬殊。肯定其中一个记录有误。

从实际情况看，木星号是飞越馆山后继续在二千英尺高度飞行，所以才撞在三原山上。如此看来，还是东京监听器的记录令人信服。恐怕机长在飞越馆山时向约翰逊基地呼唤请求指示，基地发出与东京监听器记录相差悬殊的“二千英尺、飞行十分钟”的指示。机长执行了这个错误指示。从馆山至大岛只需八分钟，所以与三原山相撞。

因此，究其原因，第一应归咎于约翰逊基地的航空管制指示令，不妨说那是一道错误的指示令。为了推卸责任，事后篡改了记录，把“二千英尺”改为“六千英尺”。另外，是否机长对日本的地理情况不够精通，或者在判断情况上欠妥，总之机长也负有责任。后来，甚至有“机长喝醉了酒”等流言。

日航班机东京都号首次飞抵旧金山是在木星号事故发生的第二年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第十一章 占领的产物与反占领

（一九五二年——一九五四年）

在基地的街道上充满矛盾

一九五四年六月七日应邀参加自由党总务会议的外务省情报文化局长田付景一做报告时说：“根据日美安保条约，美军留驻日本所用军事基地在全国共有七百一十九个，面积达十四万町步，占日本领土总面积的百分之零点三七八。”关于基地的状况，H·E华伊尔兹在《东京旋风》中做了如下的描写：

北海道的一个小镇——千岁町，面积或许有两平方英里……新任命的第—骑兵团司令官奥兰德·C·特罗库赛尔准将来到这里，发现这里有些人明目张胆地经营着五百六十五所妓院，六十六个啤酒馆，此外还有不下百余所更小规模的专门骗小孩子的行当。人们把千岁称为‘世界第一罪恶町’。给美国人的代号是‘性杂耍儿’。他拧紧了双眉，决定采取最简单的解决办法，禁止驻扎在附近的一万五千名军官和飞行人员进入町内。在佐世保、横须贺、东京及其他地方，也采取了同样措施。但是无论在哪个基地，这样一来就截断了日本商人的财源，因而他们急忙思索对策。”

当然，上面摘引的一段描写未必全部属实，但它说明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凡是有美军基地的市町，几乎都存在着欢迎

美军驻留和排斥其驻留的两种对立情绪。

不妨说，基地的社会经济是靠“梆梆女郎”、夜总会、饭店、土特产杂货店等赚取美国兵腰包里的美元和政府拨给各町的基地设施补偿费支撑的。

石川县的内滩村也不例外。该村多数居民心里都很清楚，做美军的实弹射击场，四年收入七亿日元，较之每年不足二百万日元的渔业收入，真是获益非浅。假如没有美军驻扎的话，经济会很困难。这反映了基地的另一个侧面。

但是，另一方面，美军的驻留又是产生犯罪和腐败的根源。和平条约生效以后，据国家警察署公布的外国驻军犯罪数字，自一九五二年五月至一九五三年四月以基地为中心发生了杀人案六起，抢劫盗窃案二百二十九起，强奸案四十三起。

内滩与砂川的反抗

石川县的内滩村一度做为实弹射击场提供给美军使用，限期为一九五三年四月三十日。可是美军却希望无限期地使用。吉田内阁当然应允了。但是石川县的工人、青年团、妇女会等组织却掀起了反抗斗争。政府提出让石川县选出的参议院议员林屋颯次郎任国务大臣、增加补偿金等条件为诱饵，企图劝阻他们。但是连保守派的柴野知事都亲自进京陈述反对意见。并且在一九五四年的参议院选举中使现任内阁成员林屋落选，可见当地民众反抗之烈。迫于国民的压力，吉田内阁不得不在内阁会议上单方面决定内滩村做为练习射击场使用，限期到六月十五日为止。被激怒的村民们在海湾边搭起小屋，六月十三日开始静坐示威。但是，他们的抵抗未能奏效，内滩村还是被强行做为射击场使用了。

这是一九五五年砂川基地掀起反抗斗争的纪实。东京都的砂川町，由于美军扩建飞机场，要占用耕地、宅地等一、万九千坪。斗争就从这里开始了。

九月十九日当东京供应局开始参与测量时，以町长宫崎为首的一派町议员坚决反对，而反町长派的町议员则主张争取优厚条件，“测量可以，但政府应该提供优厚的补偿”。全町官民分裂成对立的两大派。这真实地反映了基地的矛盾。

十一月十一日，当时的鸠山内阁派出数百名警官在武装保卫下强行完成了基础测量。在尔后的测量中，企图以实力阻止测量的当地反对派与强行排除干扰的警察之间发生了冲突，结果百余人负伤。一九五六年春，政府决定对“条件反对派”的一万三千六百坪土地适当给予补偿金征用，而对“绝对反对派”的土地则连补偿金也不给强行征用。

可是，由于美军的督促，政府又决定再增加征用土地二千九百三十五坪。在强行测量的十月四日至二十二日，当地的反对同盟、外地的支援工会、全学联、文化、妇女团体等六千人与警官连日发生激烈冲突，酿成一场流血大惨案。鸠山内阁也被迫让步，决定改为先征用一千一百二十八坪，其余部分无限期延缓征用。

这种悲剧性的“基地遗产”不胜枚举。另一桩——一九五五年八月六日凌晨五时半，在神户市御影町的海岸上出现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男人，拄着拐杖向前躬着身子步履蹒跚地走着，他以迟缓的动作把手杖放在白色细砂的海滩上，脱下脚上的木履，跳入大海之中。

他，名叫池田义成，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那天，他家奇迹般地逃脱了死亡。可是欣喜之余，才知道原子弹的爆

炸已在他身上留下了可怖的后遗症。正当他住在兄弟家里一心一意就医、盼望能够康复的时候，由妻子起诉的离婚书送到他面前。他那遭受残酷打击的身体迅速恶化了，出现了严重的肛门出血症状。经医生诊断为骨髓性白血病。素日他经常念叨：“只要没有这次原子弹爆炸……”这句话权当是他的遗言吧。

除他以外，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广岛与长崎的幸存者中还有三十人死于“原爆”的后遗症。

复苏的崇拜皇室热

日本独立之后不久，在国民中间滋长了反美思想是不无道理的。这种反美思想不外乎两个思想体系，那就是左与右。反映这方面情况的电影颇多。为了简捷地说明这个问题，再介绍一下H·E·华伊尔兹的报道：

“虽然拍摄了为数不少的反美影片《奈良基地》、《基地的孩子们》等等，但那些只能称之为以望远镜头拍下的缩小了的罪恶、奸淫、犯罪的记录影片。日本教职员工会摄制的《广岛》中有这样的镜头：向美国兵出售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的头骨，做为他们访问广岛的纪念品，赋以强烈的反美意识。

随即，东宝电影公司拍摄了《赤线基地》。把日本的美军基地描写成为吸毒、卖淫、犯罪的祸根。诸如表现实弹射击的声音，美国兵无所顾忌的性发泄，对儿童产生的恶劣影响等，依旧是照共产党的思路创作的，即要求‘美国佬滚回去！’

接着又产生了另一种类型的，鲜明地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电影。山本五十六提督、山下奉文大将等被联合国法庭处决的武士道之精华们的传记，还有《大和战舰》、《八月十五日黎明》等影片，复活了日本的军国主义精神。”

勿庸赘述，来自左的反美思想是以暴力、游行和反基地斗争的形式发展的。但是右的思潮却不是来自以往的右翼，而是围绕着皇室、神社、社会风俗诸方面所形成的“复古风”与“逆流”。这股复古“热”首先从神的复活开始。随着和平条约生效，日本获得独立刚刚半年，皇室迎来了两个吉庆的日子，一是顺宫厚子公主与池田隆政的婚礼，另一个是皇太子成人仪式和立太子大典。

在顺宫与隆政举行婚礼的十月十日，二重桥前的广场上三万四千余人排列成人墙，当新人乘车从这里经过时，人群中爆发出“恭禧！”、“万岁！”、“好极了！”的欢呼声。人们推开了警官的拦挡，涌上去围住了车子。十一月十日举行了皇太子的成年仪式和立太子典礼。五天以后，由都政府主持在皇居前的广场上召开都民祝贺大会时，七百多人云集这里。伴随这股复古风，仅一九五三年一月二日来到皇居参贺的人竟超过六十万，创战前与战后的最高记录。

这股崇拜皇室热，由于一九五三年六月二日皇太子的出访——参加在伦敦举行的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典礼——宛如火助风威，愈演愈烈。转年二月一日终于由复古热引起一场悲剧。当天上午九时至下午三时，三十八万一千二百五十多位看热闹的人从二重桥拥挤到坂下门，皇宫警察与丸之内署警察拼命阻拦也无济于事。终于人群中发出可怕的哀号声，乱成一团。一个老太婆被挤倒，紧接着后面的人倒下一大片，老人、妇孺等十六人被踩死，六十三人负伤。

复古潮流之精神运动的抬头也是不容忽视的。其表现是恢复了以往的祭日活动：根据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日制定的“国民庆祝日有关法律”规定，这些节日是：一月一日——元旦，

一月十五日 ——成人节，三月二十一日 ——春分节，四月二十九日 ——天皇诞辰纪念日，五月三日 ——宪法纪念日，五月五日 ——孩子的节日，九月二十三日 ——秋分节，十一月三日 ——文化节，十一月二十三日 ——感谢劳动节。

为争取建国节的复活，一九五三年，神社本厅有关人员与保守党的大人物共同创立了“建国纪念日促进会”。历史学家三笠宫因对此持有异议，遭到右翼的一阵猛烈攻击。后来把二月十一日规定为建国纪念日，由一九六七年开始。

借复古风还魂的“军舰进行曲”

关于战后一个时期的复古风，一九五一年秋，《读卖新闻》以《逆流》为题连载了一篇报道，受到广泛的好评。其中一段的标题是《军舰进行曲 • 舞蹈进行曲》，文中写道：

“请到东京银座一带的夜总会去瞧瞧。当接近深夜十一点的时候，或许是佛拉斯吉达的小夜曲吧，它那优美的旋律刚刚停止。突然，对于日本和日本人来说永远难以忘怀的旋律——‘军舰进行曲’以其不可阻挡之势迸发出来。‘真可怕呀！’事后，当记者对都内最先复活这支禁曲的银座某夜总会老板这样表示时，他却胸有成竹地说：‘怎么，没有丝毫不自然的吧。’唱片公司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赚钱的机会，七月中旬，胜利唱片公司已把它编成交响乐波尔卡舞曲，改名为《大洋海军波尔卡舞曲》灌制成唱片，准备在和平条约签订时出售；刺探到这一情报的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赶紧把保存下来的唯一的一张《军舰进行曲》唱片找出来，着手复制；帝蓄留声机唱片厂把它改编成夏威夷风格的旋律，并加进夏威夷吉它的演奏……改头换面，复活了日本军国主义之歌——《军舰进行曲》。唱片行业

借着军舰进行曲复活的旋风，忙得不亦乐乎。”

在《读卖新闻》连载的另一段报道《武打热的大丰收·女侠客》中写道：

“在舞台上，由大江美智子扮演的女侠客把成群手举提灯、带着铁尺①、警绳的捕吏贪官们一个个打翻在地。每当她飞脚去踢打时，红色的裤衩和大腿都看得清清楚楚。‘哪个敢靠前，我宰了他！’女侠客圆瞪着美丽动人的眸子，发出柔声的吆喝。‘弁天小僧②抓住了！’女侠客甩袖高呼，正要用绳索捆绑菊之助扮演的弁天小僧，台下观众中传来狂热的起哄：‘女总统！’，‘美智子小姐！’。”

和平条约签订之后，怀着“这回可得到解放了”的心理，连那些搭破棚子卖艺的叫花子式的戏班子也都演起女侠客来。在全国大致有八十多处女花道，无一处不响起叮当作响的武打撞击声……标志这种全国性武打热高潮的是新国剧的出现。一九四九年秋，明知可能被“枪毙”，却还是排练了《大菩萨峠》，并战战兢兢地向总司令部提出剧情介绍和要求公演的申请，结果却意外地顺利获准。首次演出便获得了战后最高的卖座率。在这之前一个月，明治座剧团演出《月形半平太》时也是观众客满，剧团全体成员都从中捞到实惠。

电影界也不例外，由电影伦理规程管理委员会规定的，每个电影公司每月只准拍摄一部历史剧的限定也化为乌有。立即有松竹电影公司为庆祝其创建三十周年，开始拍摄《大江户五儿男》随后是《萨摩飞脚》、《弥太郎笠》、荒木右卫门的《在键

江户时代，捕吏所持的长约一尺五寸的铁棒，靠近柄处有钩，用以拦挡刀锋并打击犯人。——译者

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扒手。——译者

屋旅馆门前小路口决斗》、丸桥忠弥的《庆安风云录》、《新撰组》等问世。多么勇敢啊！一副剑拔弩张的架势，恭贺你十二岁的文化国家成了武士日本！

在一篇题为《金钱、艺术、神灵——伊势神宫》的报道中写道：

这是一九五三年的事。伊势神宫和宇治山田市^①立即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因为在这一年的十月复活了伊势神宫的迁宫祭仪式。战后，伊势一度遭到的冷遇就甬提了。我们扭转了让伊势神宫陷入逆境和窘态的风潮，恢复其昔日之人望。去年一年间，有一百八十万、今年至十月有二百四十万人来参拜，如果加把劲，实现迁宫祭的话，在一九五四年会有六百万人谒拜。

第十二章 冲击政界的波涛

(一九五四年)

民间金融业保全经济会的渎职

以保全经济会的渎职案件和造船企业的贪污案件为序曲揭开了一九五四年的序幕。这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的《朝日新闻》在社会版头条位置刊登了题为“查清造船贪污案件的原委，有可能暴露出政界的腐败”；在它的下面的是“伊藤理事长被拘留。因敲诈勒索，对保全经济会也进行全面搜查。”这两条消息占了半版的篇幅。

保全经济会是一九四八年由一位名叫伊藤斗福的朝鲜人自任理事长搞起的民间金融组织。它以五成或八成的红利把民间的零散金钱集中起来用于放高利贷。也就是所谓“匿名组织”。但为了支付出资者的高息红利，如果不能把本钱以更高的利息放贷出去，那是很危险的。渐渐地，保全经济会所赚差利不断减少，甚至陷入连收回本钱都很困难的窘境。这样，为了支付出资者的利息就必须招揽新的出资者。象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必须不断地踩动脚蹬子，否则就会倒下，保全经济会就是这样不停地进行着“自行车操作”，从十五万人手中集中了四十五亿日元。可是，终于累得精疲力尽，蹬不动这辆自行车了，一九五三年秋不得不决定休业。

于是，东京地方检察厅、东京警视厅搜查二课的成员三十人，一举对其总店、伊藤住宅以及各地的分店、营业所、有关人员的住宅等都内四十七处、全国二百四十五处进行了搜查，并逮捕了伊藤等人。结果暴露出伊藤为了策划促使“相互金融法”的成立，出资聘请社会党右派的平野力三（原农业大臣）、改进党的早稻田柳右卫门、法政大学教授松本信次为顾问，成为运动政界的要人。但是，因为没有牵涉到选举资金问题，所以只追究了伊藤等人的责任便结案了。

震动政界的造船贪污案

造船贪污案的败露始于“民间金融大王”森胁将光的融资所惹出来的麻烦。森胁的安全投资公司向日本特殊产业公司经理猪俣功提供过贷款。可是，无力偿还这笔贷款的猪俣功却通过新闻记者抓住森胁在某个问题上的把柄，向警视厅揭发检举了森胁。趁森胁被扣留期间，猪俣到森胁家中索回自己签字画押做为担保物件的票据和股票券。——造船贪污案以此为开端揭开了序幕。

森胁立即控告了猪俣，受理此案的东京地方检察院对猪俣的侧近人士进行调查。从担保物件中发现了山下轮船公司和日本海运公司等签字画押。检察员判断，如果造船、海运公司流通没有兑现希望的票据的话，那确实是犯了商法上的特别渎职罪。

搜查于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从下山轮船和日本海运两公司开始了。十五日逮捕了以下山轮船公司经理横田爱三郎、日本海运公司专务董事佐藤佑信为首的核心人物。从没收的横田记录本里找到重要的事实。第一，公司内部有这样的秘密习惯，每

当有用户订购船只时，把所付费用的一部分做为介绍费，分给公司的核心人物。这引起了检察当局的重视。为什么？因为轮船的建造费的约八成是国家的贷款。

第二，围绕着船的分配问题，造船业主和运输省有关官员之间行贿受贿、以及为促使“造船利润补给法”成立向有关政要人物提供政治献金^①。并且在横田的记录本中竟然还有支付政治献金的详细一览表。

检察当局于一月二十五日对运输省的壶井玄刚官房长提出起诉。以后接连对日立造船公司、浦贺船坞公司、名村造船、饭野海运、新日本轮船、太洋海运、日本油槽船、播磨造船、川崎重工业、新三菱造船、三菱海运、照国海运、石川岛重工业等公司先后进行了搜查。逮捕了饭野海运公司经理、日本船主协会会长侯野健辅。

东京地检还深入到政界中去，除逮捕了自由党的有田二郎、岡田五郎、关谷胜利、改进党的荒木万寿夫等国会议员之外，还对自由党干事长佐藤荣作、政调会长池田勇人，改进党总裁重光葵进行了质询。步步深入事件的核心。

在这个过程中，二月十九日，做为证人被叫到决算委员会答询的森胁将光自称在自己的机关进行过调查，并交出一份涉及造船业界与政界关系的“森胁记录”，这样一来更加轰动了政界。

在调查的基础上，检察厅断定政调会长池田从四个造船公司获取的二千万日元馈赠支票是做为访美饯行的费用的。但佐藤干事长从船主协会、造船业界接受的约二千万日元则构成间接受贿罪，从四个造船公司接受的二千万日元构成受贿罪。因

① 为参加竞选者拉选票提供的资金。 ——译者

而，四月十九日向政府提出要求逮捕佐藤的申请。

但是，法务大臣犬养健于四月二十一日运用检察厅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指挥权，让检察厅暂缓逮捕佐藤。这样检察机关就不能逮捕佐藤了，修正了原来要逮捕佐藤的方案而只是就佐藤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问题对其提出起诉，轰动政坛的造船贪污案就这样收场了。

那时，笔者恰好深入到佐藤身边。一天晚上，他到筑地的一个菜馆去，不是为了会见谁，而是自斟自饮，“要是被抓起来，我的政治生命就完了！”好象为了排遣这种绝望的心情。

我坐在汽车里等他出来。过了一会儿他走出来，我毫不留情地问：“干事长当到头了吧！”佐藤喝醉了，钻进了自己的汽车，我也坐了进去，直到汽车开到他家门口，我问什么问题他也不答话，嘴里一个劲儿地哼着当时的流行曲“小鸠不要啼”，一副醉醺醺的样子——或许是故意装的也未可知。

因这一案件牵连，赤坂的中川饭馆女老板石川千代子自杀了，这是后话。案件的真相一查清，赤坂一位名叫秀驹的女艺人是某造船公司重要人物的情妇，也被暴露出来，赤坂成了造船贪污案的舞台，也是中川、长谷川与造船业界与政界的头目们搞交易的场所。

造船贪污案了结之后，中川饭馆好长时间生意不兴隆，这或许是女老板石川千代子自杀的原因之一。此外她患了不治之症胆囊炎，加之外界的冷眼似乎也是自杀的理由。案件发生后的第二年九月，她服下了强力安眠药酒，结束了三十六岁的生命。

降落在比吉尼岛的“死亡灰尘”

造船贪污案的搜查正在进行之际——三月一日大约四时十

二分，晨曦刚要从海上升起，来自烧津的渔船第五福龙丸（载重九十吨）正在比吉尼环状礁东北八十海里的海面上捕鱼，作业组二十三人都看见在西南的水平线上有闪光，七、八分钟后听到爆炸声，随之有白色粉末落下来，大约三小时以后，在甲板上降落了薄薄一层尖埃。作业队员谁也没有想到那就是含铯九〇和其他放射性物质的“死亡灰尘”，那时候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有这种物质的存在。

船改为向北航行，当船往烧津方向返航、行了二、三日之后渔业队员们感到有轻微的头痛、恶心，凡是落过的白色灰尘的皮肤变成紫黑色肿胀起来。头皮上落过白色灰尘的地方头发开始脱落。三月十四日，返回烧津港后立即得到协力医院诊断，才知道是氢弹爆炸后遗症。捕获的二千五百贯金枪鱼、松鱼、鲨鱼，虽然及时地送到了市内和东京、大阪、北海道、北陆等处出售，因为从中检查出放射性物质，都白白埋进土里。

《读卖新闻》把这一事件做为特大新闻加以报道，不仅日本国内，连国际上也视其为重大问题。三月十七日东大综合调查团来到烧津调查福龙号时，虽然已是两周以后了，船上的放射性物质还以每小时一百一十伦琴向外放射。人体在二十四小时内平均每小时能承受的最大量是二伦琴。三月二十二日，出席众议院厚生委员会的东大名誉教授作证说：“二十三位船工中恐有百分之十已注定要死亡。”

的确，曾经一度看样子好象恢复了健康的船员十之六、七从六月份开始出现肝功能障碍症状。九月二十三日黄昏，久保山爱吉死在东京第一医院。人们终于切身感到放射能的可怕。对一向爱吃的金枪鱼也敬而远之了。尽管筑地的鱼市市场使用盖

革计数器检查过了，挑选没有放射能的鱼出售。金枪鱼平时售价一般每贯一千三百日元至一千八百日元，而这时中间商已经降价一半，售出的量，还是不足购入量的六成。

日美间关于补偿损失的谈判，直到一九五五年一月七日，美国付给七亿二千万日元慰问金才算做罢。以比吉尼事件为契机，国际反原子弹运动的高涨更趋显著。

拉斯特鲍夫的逃亡剧

在这一九五四年，奇怪的事多有发生。一月二十七日，设在麻布狸穴的原苏联驻日代办处的沉重铁门打开了，随之出来一辆汽车，车上坐着罗诺夫参事官等人。他们是去拜访警视厅公安三课的。这真是件稀罕事。

在占领时期苏联人做为代办处成员驻在日本是受国际法保护的。但是因为对日和平条约尚未签订，与日本没有正式外交关系，所以当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和平条约生效之时起，按国际惯例，苏联人就应该撤了。为此，吉田内阁已经向他们发出了通告。但他们仍在麻布狸穴的建筑物里稳如泰山，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然而，这一天他们却亲自来叩警视厅的门了。

“尤里·拉斯特鲍夫二等秘书从二十四日开始下落不明。”原来是请警视厅协助找人的。尔后，二月一日，他们又声明：“拉斯特鲍夫被美国驻在日本的情报机关扣留了。”三日又通告警视厅：“他乘坐美国的汽车，不知到哪儿去了。”美国远东军司令部只是声明：“任何有关情况都不知道。”终于到了八月十四日。

这一天，日本外务省与公安调查厅以共同发表的方式让拉斯特鲍夫事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 …拉斯特鲍夫是苏联内政部的陆军中校，在日本从事谍报活动。一月二十四日亲自到驻日的美国当局要求庇护和帮助。根据本人的强烈要求，一月二十六日美国当局用飞机将其送往海外。这一事情美国驻日大使艾利逊曾写信告诉了岡崎外相。日本派官员赴美面会了拉斯特鲍夫，调查了解了其过去所从事的间谍活动。与此同时，岡崎外相写信给艾利逊大使，对于美国在拉斯特鲍夫出境以前没有事先与日本协商表示遗憾。”

在公布事件真相的同时，还把拉斯特鲍夫的手记公诸于世：

“一九四六年一月到东京赴任的我，突然于十一月接到莫斯科召我返回的命令。我在进入国家保安人民委员会时，隐瞒了父亲被清洗出党的事实，我曾因此受到了追究，虽已恢复原职，但我对苏维埃的政治体制深感迷惑。

一九五〇年，我到日本再任时，曾经想把妻子女儿带来，但没有勇气提出这个申请。我在莫斯科工作时，妻子由于是某个与美国陆军士官有瓜葛的组织的成员受到彻底的调查，一九五〇年又再次受到审查，由于这段原委，我不敢申请携带妻子出国。

来到东京以后，内务部长贝利亚被清洗的消息震动了整个驻日代办处，我们感到内务部出身的干部首当其冲要受到清洗，因而惶惶不安。我拿定主意永不回苏联，是在一九五三年七月。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八日，上级决定召我回莫斯科。一月二十四日，东京被大风雪覆盖了，凌晨四时，我悄然离开代办处，先躲进一家土耳其浴池，又在一处日本式的饭馆用餐，然后到一个地方去会见一位美国人。过一会儿，便乘上了他的车子……”

可是八月十四日这天，警视厅以泄密罪逮捕了外务省国际协力局第一课的庄司宏、欧美局第五课的日暮信则，进而于次日逮捕了经济局第二课的高毛礼茂。八月二十八日，日暮信则从东京地方检察院的四楼上跳下来摔得粉身碎骨。这是被美苏压力笼罩的幽谷——日本的悲剧。

荷枪强盗的足迹

一九五四年岁暮警视厅发表的数字表明，一月至九月间发生的刑事犯罪案件达九十九万四千起，无论怎么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与上一年度的数字大抵相仿。如果细分的话，杀人案二千三百二十二件，盗窃案四千二百四十四件，强奸案三千余件。恶性犯罪相当突出。

其中包括这么一桩案件：保安厅（后来的防卫厅）的技术研究所经理股长斋藤渡与妻荣子遭人暗算。六月十四日夜，斋藤夫妇到青山日赤医院去探视住院的亲戚。他们刚要走进，原越中岛保安队员大津健一和另外三个男人已经“恭候”在那里。斋藤经朋友介绍刚刚与大津认识不久。大津声称要价九十四万日元出售他在四谷三荣町的房宅，斋藤准备买下来。

可是，此时大津只字不提卖房之事，四个人一齐上来用卡宾枪和手枪顶住了斋藤夫妇，把他们押进车子，绑架到四谷三荣町的大津住宅里。次日早晨七时半左右，大津等人押解斋藤一人到技术研究所，胁迫斋藤打开保险柜，取出了一张二百万日元的支票和提取一千七百万日元国库现金的申请书。然后又把他押回大津私宅监禁起来。

大津在横滨兴信银行川崎分行把支票中的九十七万日元兑换成现钞，又将斋藤夫妇转移到荻洼附近的房子里。为了达到

提出国库现金之目的，又将斋藤单独带走，去有乐町的日通营业所。但这次斋藤乘机逃走，直奔丸之内警署报案。丸之内署立即布置拦截大津所乘坐的 3—7723 号车。

荣子夫人也趁看守人员疏忽逃出虎口。

大津其人，品行恶劣，被保安队开除，一九五三年四月涉嫌强盗罪被起诉，正在保释出狱期间再次作案。当局于六月二十一日在富山市稻荷町逮捕大津的同案犯高田与六，六月二十五日又在浅草山谷的旅馆里逮捕了另一同案犯丸山四郎。当夜，畏罪潜逃的山本昌明前来投案自首，山本自供因为与大津脾气相悖，在其住宿的西荻洼和服店的二楼上将大津痛打一顿，夺取四十万日元逃走了。

因此，判明了大津的腰包里只有十万日元，以及携情人田中美佐潜逃的踪迹。即便这样，也很难找到他，因为大津随身携带一架收音机，可以收听新闻广播，掌握当局搜捕的动态。但是十月二十二日，案发后第四个月，大津与田中在大分县的汤平温泉终于被捕。

大津是个阴险毒辣、诡计多端的家伙。他带田中逃遁是因为田中能给他照看那辆借来的汽车。他与田中同居，每月只给她三、五千日元的生活费。田中结过两次婚，第二次结婚的丈夫死于肺病，她只好到酒巴间、夜总会去谋生。因为追求浮华、阔气的派头，希望找一家有汽车的人共同生活，于是和大津相好了。随着对大津审问的步步深入，终于搞清了原来他竟是两年前在东京下水道发现死尸那桩积案的真正凶手。

第十三章 向新闻全盛 时代挺进的序曲

（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

电影的黄金时代到来

战争结束之后，大多数电影所追求的是性解放。尤其是以十六岁至二十岁青少年为对象的所谓“性典电影”的流行是很有力的证明。这种性解放电影战后曾三度重复流行，第一次是在一九五〇年，以《少女的性典》为开端。第二次是在一九五二年，由《姑娘如此抗议》开始的。第三次在一九五三年，以《十代的性典》、《十代的秘密》、《处女的诊察室》等影片为中心蔓延开来。

这种倾向，一九五二年日本获得独立后，又增加了新的内容，那是随着复古风而产生的反映战争情景、时代特征、反美、容共和工人运动等内容的电影。反映战争题材的电影最典型的莫过于今井正作的《姬百合花之塔》，描写在冲绳为国捐躯的女学生部队。其次要算《浮云流尽》，它是描写学生兵特攻队的反战电影。

这些影片大获成功之后，电影公司接连不断地把《山下奉文》、《战舰大和》、《野战军护士》、《冲绳健儿队》、《潜水舰乙号至今未浮上来》等等再现战争场面的电影搬上了银幕。

较之这些远为甚者，是战后不久即促使复古风极其隆盛的历史剧影片，以往每年上映的新片约有三分之一是历史剧，而在一九五四年上半期拍摄的一百六十三部故事片中，历史剧占六十八部。并且，从这一年开始《鲤名银平》（新东宝）、《清水次郎长》（东宝）、《国定忠治》（日活）等反映舞刀弄棒、流氓恶棍的影片显著增加。

与之相对照的反战、反美影片主要是由独立的制片者摄制的。因为这些制片者几乎都是在清洗共产党时，被从大企业的电影公司中排斥出去的游离分子。

以东急百货公司的雄厚资本为后盾迈入电影界的新秀东京电影制片厂，其收益所以能超越原有的老制片厂，奥秘之一在于从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重用中村锦之助，东千代之介等影坛新星，以拍摄北村寿夫的儿童广播剧《吹笛童子》为开端，摄制了《红孔雀》等面向儿童的系列片，反映了时代的气息。

在此期间，电影的规格也在不断更新，真正的彩色电影的出现是在一九五一年用富士牌胶卷拍摄的《卡尔门还乡》（木下惠介导演，高峰秀子主演）。

与此同时，电影进入了宽银幕时代。日本首次放映宽银幕电影是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有乐座剧场。放映的是美国第一部宽银幕影片。剧目是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拍摄的《圣衣》。美国做为对抗电视的手段琢磨出来的宽银幕，被当时电视尚未发达的日本客观地接受了。至一九五四年十月，上映宽银幕电影的影院在日本有近百所。

追随这一趋势，日本电影也开始宽银幕化了。在日本诞生的第一部宽银幕电影是一九五七年东映电影公司摄制的大友柳太郎的作品《凤城的新娘》。到一九六〇年，日本电影百分之七十

五都是宽银幕影片，并且其中百分之三十是彩色宽银幕影片。

日本电影向彩色化、大型化迈进之后，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日获国际电影节最高奖赏的黑泽明的《罗生门》成为黑白电影规范的楷模；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日获科学研究所奖的衣笠贞之助的《地狱门》是彩色电影的标准样板；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获国际电影节最高奖的稻垣浩的《无法松的一生》成为彩色宽银幕电影的标准样板。由此也反映出日本电影的发展过程。

一九六〇年日本拍摄故事片电影四百二十部，在全世界独占鳌头，确实无愧于电影的黄金时代。

倾注全部心血于发展电视事业的正力松太郎

这个时期，电视也很快地在新闻世界里脱颖而出。终于把电影排挤到凋敝、冷落境地的电视，在战后五年间，没有经过实验阶段就超过了过去。其所以能飞跃发展成为社会性的企业，不仅需要技术、经济力量，政治力量也是必不可少的，发挥了这种政治力量的是正力松太郎。

正力专注于电视事业，始于他从巢鸭拘留所被释放出来之后。美国电信技术界的元老德·佛莱博士怀着把电视移植到日本的雄心，找有声电影研究家皆川芳造磋商，共图大业。皆川又找鲇川义介商议，鲇川想到了正力松太郎。

可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麦克阿瑟对德·佛莱表示：“因为电视机还是奢侈品，不能为这种事业支付美元贷款，况且正力是追究令所涉及到的人物，不能让他得到电视企业家的地位。

但是正力于一九五一年八月邀请“美国之音”创始人H·霍尔修扬、联合国通讯部长W·达斯奇斯基、美国电视技术界权威W·霍尔斯特德来到日本。三人经正力的斡旋说服了舆论界、电

气工业界，结果，很快地于九月四日，正力与《每日新闻》社长本田亲男及三名美国人共同发表了对发展日本电视事业的构想：

“资本十亿日元。另外以十亿日元的借款购买美国的技术和设施。第一期预定于一九五二年尽早以东京为中心，半径五十英里内发出电波，为初期普及之用。从美国进口一千台电视接收机，做为‘教育用资料，免税进口。”

对于正力构想有两种反应，其一是冷嘲热讽的一般批评。因为官办的NHK广播协会的总固定资本不过十六亿八百万日元而已。二十亿日元之巨款要从民间筹集简直是异想天开。还有，即便电视机能够国产，其成本之高也难以普及。另一种反应是在过去数年间从事电视研究的NHK和其他行家里手们气得脑门上青筋暴跳，大惊失色。因为正力的设想是原封不动地引进美国的一切技术。

正力构想很快便付诸实施了。十月十二日，做为“日本电视播送网公司”（以下简称“日本电视”），向电波监理委员会正式提出申请。NHK原以为播放电视的愿望要三、四年以后才能实现，所以见正力设想落实如此之快不禁惊惶失措，立即一反常态，改弦更张，十月二十七日当即为东京、大阪、名古屋三个广播电台和七个中转台组成的广播网申请许可。

当然民间广播公司也不甘落后，竞相提出播放电视的申请，其争夺之烈毋庸赘述。但电波监理委员会只批准“日本电视”一家的申请。那是一九五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后来十一月才批准了NHK的申请。

电波支配着整个社

但是，正式播放由于“日本电视”的机器筹措问题很长时

间不得进展，NHK便先行一步。一九五三年二月一日，NHK的古垣铁郎会长承蒙吉田首相的关照，首次播放了菊五郎剧团的《道行初音旅》。“日本电视”在大约半年之后的八月二十八日，才开始正式播放电视，首先中转了开业仪式，然后连续不断地播放《寿式三番叟》、《歌的祭典》、《宝塚少女歌剧团》等节目，持续十三个小时。

初期的电视，每天播放时间，NHK台是四小时，“日本电视”和其他民间电视台不超过六小时。各电视台都转播体育比赛和剧场实况，而后接着播放电影节目。

由于这种宣传媒介引起了拳击和职业摔跤热。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夜晩，转播白井义男与黑人拳击手阿伦的争夺赛时，“日本电视”在东京都内街头放置的二百二十一台电视机前，无一不挤满了人群。因此电视明星几次从画面上出现，反复强调“街头的观众们，请不要拥挤。”每当转播力道山的摔跤比赛时，凡是有电视机的茶馆里都挤得水泄不通。

但初期的电视是“很不象样子的”，“不足称道的”。剧本、文献、纪录的艺术水平和内容都相当低劣、粗糙。对这种电视的批评也是尖刻的，甚至说：“在英国凡是有电视天线的家庭都不是知识分子家庭，凡是没有天线的住户才是知识分子家庭。”评论家大宅壮一道出了“电视使一亿日本人都变成了白痴”这样精辟的警句。

一九五二年从美国进口的电视机售价二十二万五千日元。一九五三年国产十四英寸台式电视机十四万五千日元一台，很难卖出去。一九五三年二月NHK开始播放电视时，接收的人家为数甚微。但是至八月“日本电视”台开始播放时已有四千七百十六家收看。又过半年之后，好歹突破了一万大关，——普

及的速度是迟缓的。

但是，又经过一年，至一九五五年三月，收看的人家超过五万三千户，转年三月增加到十六万五千户。这时电视机的价格是七万三千日元，下降到一九五三年的三分之一。普及速度异常迅速。与日本NHK订立收看电视合同的人家，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为一百五十六万户，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末猛增到三百二十九万户，增长速度惊人。

就无线电广播方面来说，与NHK签订收听合同的数字：一九四五年为五百七十二万八千零七十六户（普及率百分之三十九点二）；一九四八年开始有明显的上升，到一九五〇年达到一千零五十三万九千五百三十九户（普及率为百分之六十三点六），增长趋势相当喜人。

这样，做为宣传媒介的电波，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通过收音机、电视机传播到每一个家庭的卧室、厨房，或吃茶店、西餐馆。并且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普及了半导体收音机，使它发展到人们的衣袋里。这些电波传达着时代的讯息，统治了社会的习俗。

出版系统竞相出版周刊杂志

与电波无缘的铅字和纸张的新闻宣传，做为传统的文明，也不甘失去其活力。不仅如此，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单行本和周刊杂志出现了“侠义热”、“推理小说热”、“漫画热”。

其中最值得记载的是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九日《周刊新潮》的出版，它给活字文明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周刊杂志的历史相当久远。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大正十一

(一九二二年四月创刊的《周刊朝日》和《星期天每日》。战后，追随这两种杂志的复刊，《周刊读卖》也复了刊。这三大杂志都有相当的销路。随后，《周刊产经》、《周刊东京》先后问世。这些杂志都属于报社专卖。因为办这种杂志需要巨大资本，除报社外，一般出版社则力不从心。

可是唯独新潮社却斗胆办起了《周刊新潮》。在它创刊的时候，一般人都认为新潮社注定要吃大亏的。可是《周刊新潮》完全冲破俗套，以崭新的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出现，每期都有四十万册以上的销路，使一些出版周刊杂志的报社望尘莫及，成为独树一帜的佼佼者。

于是，一些大出版社也很快办起了周刊杂志。一九五八年，集英社的《周刊明星》，双叶社的《周刊大众》、主妇与生活社的《周刊女性》、棒球杂志社的《周刊棒球》、光文社的《女性自身》，还有其他《周刊漫画》等等，纷纷登场。

这种倾向愈演愈烈。一九五九年，讲谈社的《周刊现代》、平凡社的《周刊平凡》、文艺春秋社的《周刊文春》、中央公社论的《周刊公论》、时事通讯社的《周刊时事》、实业之日本社的《漫画周刊星期日》等纷纷创刊。不仅如此，讲谈社还发行了面向儿童读者的《周刊少年杂志》、小学馆发行了《周刊少年星期日》。朝日新闻社的综合性杂志《朝日期刊》也问世。至此形成了蓬蓬勃勃的出版周刊杂志热。

对体育活动的情趣盎然

随着新闻宣传事业的发达，各种门类的“热”也在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日臻形成。其中之一的体育热便是由于广播、电视引起的。不仅拳击、职业摔跤如此，棒球的兴起也如

此。

棒球运动在战后不久便复活了，很快就呈现大流行的征兆。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八日，六大学棒球联赛，以早稻田大学对庆应大学的争夺战为开端，在神宫球场拉开了序幕。比赛昼夜连续进行，盛况空前，甚至还有出售三千张假入场卷的插曲。战后恢复的第一届中等学校棒球赛（一九五五年开始改为高等学校棒球赛），于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在西神宫球场举行，历时一周，浪华商科学学校获优胜。

职业棒球赛在战后的复活更早些。一九四五年十月九日，以“日本棒球联盟”的旧称再作冯妇，但是各球队都苦于选手不足。东边以巨人、名古屋、大和、西铁各队联合组成。西边以阪急、朝日、阪神、南海四个队组成。十一月二十三日，借用神宫球场，东西两个联合队展开了复活后的第一场比赛。

民众对这些专业体育运动的关心自不待言，由于电波宣传的作用，人们对游泳比赛以及奥林匹克运动会也寄以极大关注。

游泳比赛在战后不久即恢复了。这个头儿是古桥广之进开的。一九四八年他在神宫游泳池，以四分三十三秒六创四百米自由泳世界纪录。一九四九年在洛杉矶参加国际比赛，又以九分三十五秒五的成绩打破八百米自由泳世界纪录。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山中毅以十七分四十七秒五和四分十六秒六的成绩分别打破了一千米和四百米自由泳世界纪录。

但是，战后一个时期，日本与德国、意大利都被拒之于国际体坛之外。一九四八年在伦敦举行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日本等战败国未能参加，因为国际奥委会不予批准。战后日本选手首次获准参加奥运会，是一九五二年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国际

比赛。但是由于战争期间的长期空白，这次未能获得好成绩。只有摔跤比赛为国争光，在“君之代”的乐曲声中，升起了“太阳旗”。一九五六年，在墨尔本召开的奥运会，日本也参加了，体操获第二名，摔跤获两枚金牌。

“太阳族”的崛起

完全令人费解的“太阳族”一词，在一九五五年成了非常流行的通用语。这个新名词，最早出现在石原慎太郎的作品《太阳的季节》里。该文在当年七月号《文学界》杂志上发表后，获芥川文学奖，宛如舞台上的主角，被追灯的光柱打中，成为众目所望的焦点。不知是谁发明出这么个“时代的名词”。正如《太阳的季节》所描写的那些情感冷漠，玩世不恭，无视传统意识和伦理道德，整天无所事事，看破红尘的战后派青年，称之为“太阳族”。

这时，战争刚刚结束那阵子流行的新式有色眼镜、夏威夷衫、胶底鞋等已被冷落了。还有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曾时兴过的，外国商人所喜爱的浅色葛巴丁^①，起肩、大宽领的上衣，肥腿裤子等也都成为陈腐的过时货。

一九五五年，“太阳族”穿的窄领窄肩的西服和瘦长的裤子，与大正末年流行的服装完全相同。那时被叫做“曼博”的裤子，又重新时髦起来。不久，在此基础上，又兴起穿风雨衣。这种服装是石原慎太郎的弟弟石原裕次郎通过银幕使之流行起来的。他们的发型清一色地剪成“阿慎式”也就是模仿石原慎太郎的发型，其实就是美国兵的发型。

^① 中古时代犹太人等穿的又肥又长的上衣。——译者

从流行真知子卷发到流行超短三角裤衩

写到这里，不能不回想起战后女性的风貌。刚刚战败的时候，女人除了穿纯人造棉之外，什么衣料也买不到。在街上到处可见女性们穿着用军用毛毯制作的短大衣。至一九五一年左右，终于有布料上市了，尽管价格很高。“为了使自己的身材更漂亮，紧腰衣和乳搭也是必要的。”这种出自服装设计师之口的语言，遮遮掩掩地在报纸上登了出来。海绵制的乳房随之就出售了。一流服装设计家大塚末子，便是在这时交了红运的。水烫发也时兴起来。三月十四日，在日本桥三越百货公司，耗资八百万日元的时装展览会揭幕。当时正流行拖在地上约三十厘米的长裙。

一九五二年，开始发行《时装》、《美国式样》、《十七英寸》等美国和法国的服装裁剪图。手风琴式衣褶在这一年流行起来。

短裙时代的到来是一九五三年，那是由服装设计家库斯里奇·戴奥尔无所顾忌地为女性的裙子增加的新光彩，他把原有裙长减少了十五厘米左右。十一月二十五日举行了戴奥尔时装展览，博得无数女性的赞叹。这一年，伊东绢子在世界美女选拔赛中获第三名。

至寒冬岁暮，真知子式卷发大流行。真知子是电影《你叫什么名字》的女主角，她那披在肩上一圈儿的卷发，成为女性们争相仿效的模特儿。尼龙筒袖女上衣这时正在流行。

一九五四年戴奥尔时装热仍在继续，他设计的胸部偏平、腰身下移，呈“H”型的连衣裙，成为女性们追逐的珍品。欧德利·海仆班的《罗马的假日》在日比谷剧场从四月二十七日上

演到六月三日，获得巨大成功，也是这一时期的事。随之，海仆班式短发——额前垂下溜海儿的发型便泛滥于大街小巷。

一九五五年又流行戴奥尔设计的把腰身上移、提高到乳房下面的位置，裙子的下摆很宽，呈“ A ”型的连衣裙。秋季，转而追逐戴奥尔的新作——胸部宽大，腰身抽紧，象蜂腰似的，裙子紧紧贴在臀部——“ Y ”型连衣裙。一九五六年，戴奥尔又设计出新花样，把腰身系紧，双肩肥大隆起，下摆向外张开，呈“ X ”型的连衣裙。一九五七年戴奥尔与世长辞。谢天谢地，戴奥尔的花样翻新到此结束，日本时装设计家们从此才得以大显身手，有了用武之地。

但是，日本女性对流行式样的盲目追随，充其量也就到“ H ”型、“ A ”型。对一九五五年的“ Y ”型已经不那么无知地盲目紧跟了。一九五七年，讨女性喜欢的内衣热风靡一时。名叫鸭居羊子的内衣设计家，在这时名扬海内。

这个时期，黑色的长衬裙、七色的三角裤衩——令人想起丑闻的三角裤衩，和超短三角裤衩装饰了商店的橱窗。把黑色头发染成茶色或褐色——“划时代的美”——也流行起来了。

难忘的两件事

在犯罪案件中，令人注目的是特尼谷的长子被拐骗事件和丸木澄子被杀害事件。

由无线电广播培植起来的“驻日美军节目”的喜剧演员特尼谷的长子正美（大田区入新井第四小学一年级学生）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一个身着黑色西装的男子拐骗去了，事件发生在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五日下午。三天过去了，不见孩子回来，

特尼谷却收到了一封恐吓信：“必须出两百万日元赎回你的孩子。”

二十一日夜晚大约八时左右，特尼谷又接到电话：“立即带四十万日元到涩谷车站前的广场来！”这个电话成为逮捕犯人的唯一线索。警视厅搜查一课的侦探埋伏在那里，一位四十岁上下，估计可能是打电话的男子一出现，立即将其逮捕。被拐骗做人质的孩子并没有带来，还被押在犯人的家中。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傍晚，在曾经为原子弹爆炸情景作画、竭力主张禁止原子弹的进步画家丸木位里家的浴室中，位里的母亲、八十多岁的女画家丸木澄子被杀害。三天后，犯人从横须贺市的一条官营公路上跳下来，投海自尽了。

幕后的主角 —— 神武景气的功绩

在鸠山内阁统治下的一九五五、一九五六两年、新闻宣传事业出现那样异常的兴旺发达，以至带来了种种门类的“热”，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个时期的经济状况出现了所谓“神武景气”^①。一九五五年出口贸易出现五亿美元的大幅度增长的黑字。一九五六年各产业界便开始急速扩大投资，更新设备。经济专家们通常把一九六〇年称为“数量景气之年”，把一九五六年称为“消费景气之年”，也就是说，一九五六年出现了罕见的景气状况。

在生产上，电力方面采用了新的火力发电，钢铁方面采用了转炉顶部吹氧炼钢，化肥生产改用氨气波，化学纤维生产改

^① 神武是传说中日本的第一代天皇。所谓神武景气指神武天皇以来首次出现规模空前的经济繁荣。 ——译者

用流水作业装置，纸浆生产方面采用漂白纸浆生产方式、高效率抄纸机等多种划时代的技术革新项目。在消费方面，扩充了百货公司和批发、零售等商店。按月分期付款的新式销售办法也盛行起来。

就业机会和就业率均好。百人以上、五百人以下的中小企业，就业人员的增加尤为显著。失业队伍在一九五六年达到顶点——一百零六万人。尔后逐渐缩小。工资的上升率一九五六年与一九五五年相比上升约百分之八点九，物价，除住宅外，粮食、衣料等平均都下降百分之一左右，总的说来大众的生活是相当富裕的。

由于有这样的经济繁荣做为后盾，才出现了这两年的新闻宣传事业的发达，引出各种“热”来。

在这个年代，政治方面需要稍施笔墨的事情有日苏两国邦交的正常化。这是鸠山内阁顺应了国际和平共处的趋势，打出的政治招牌。但是，在日苏双方的全权代表松本俊一和马利克在伦敦举行的谈判中，日本方面提出要归还齿舞、色丹、国后、择捉四岛时，谈判破裂了。一九五六年三月苏联报复性地采取了禁止日本渔船在北洋捕鱼的措施。

关于北洋渔业问题，虽经农相河野一良亲自飞抵莫斯科缔结渔业协定，打开了局面，但是协定规定，日本的渔获量要每年由两国进行协商确定。从那时以来，苏联年年削减日本的捕鱼量。

日苏邦交的恢复是在一九五六年十月。鸠山首相、河野农相访苏与布尔加宁总理、赫鲁晓夫第一书记会谈，缔结了日苏共同宣言，实现了邦交正常化。由于此举，苏联不再在安理会上阻挠日本加入联合国了。于是，十二月日本进入了联合国。

日苏复交是向共产党国家打开了窗口，它与旧金山和约的签订并驾齐驱，成为战后日本外交的两大里程碑。然而，北方领土问题却悬而未决，遗留至今。

第十四章 卷入摇摆舞的 旋风之中

(一九五七年——一九五九年)

点缀岩户景气的皇太子婚礼

在“神武景气”渐渐转为不景气，进入所谓“锅底萧条”^①的过程中，岸信介内阁诞生了。

一九五七年上半期“锅底萧条”是由于国际收支失调引起的。各企业在上一年趁着神武景气在设备投资和扩大再生产上，步子迈得太快了，以至进口器材、原料过多，超过了出口能力，使美元外流，外汇收支出现了赤字。

岸内阁于三月二十日和五月八日两次提高官定利率，抑制各企业向银行贷款。六月十九日又拟定了“改善国际收支综合紧急对策”，限制进口。通过这一系列措施，终于摆脱了危机，一九五九年秋季迎来了“岩户景气”^②。在这一年的四月十日举行了皇太子与正田美智子的成婚大典。太子妃历来都是由皇族、华族中间挑选的，但这位美智子妃却是民间财界人士正田家的

^① “锅底萧条”指经济衰退到一定程度，既不深化、又不复苏在最低点的停滞状态，犹如处于锅底。——译者

据日本神话传说，日本皇室之祖，天照大神因愤懑其弟素戔鸣的残暴而隐居于“天之岩户”。后来，出岩户而开创日本。岩户景气指一九六一年前后出现的空前经济繁荣。——译者

令爱。这一破天荒的例外使举国上下为之沸腾。

皇太子与美智子是在轻井泽的手球场上相识的，这成为报纸和周刊杂志的话题。关于皇太子，美智子说是“纯洁的”，“可以信赖的”。于是这话原封不动地变成流行语，成为一九五九年茶余饭后最重要的谈论。

但是一九五七至一九五九年间政治极为混乱，社会陷入喧嚣、骚乱之中。

政治混乱是围绕岸内阁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发生的。至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在反对“勤务评定”斗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日本教职员工会，由于政府实行了以实力阻止停课、罢工、道德讲习会，而在东京、和歌山、高知、群馬等地发动多起暴力事件。在一九四八年的临时国会上发生了“修正警职法”骚动。

一九五九年秋，由于岸首相缔结了众人瞩目的新安保条约，社会党、共产党、总评、全学联的反对斗争激化了。还发生了总评、全学联的示威游行队伍闯入国会院内等震动社会的事件。

狂欢！摇摆舞的快活

如同象征着这三年的狂乱、骚动一样，这一时期极为流行的是摇摆舞。一九四七年十月的某夜晚，在东京维登尔舞厅首次举办西方音乐狂欢会，参加表演的大多是一些无名的新演员，只有喜剧明星柳家金语楼的儿子山下敬二郎小有名气。山下表演时，把吉它挂在脖子上，两足分开，相距约八十公分，一边扭动腰肢，一边以狂叫的声音歌唱。“只有这位少年才能成为日本的宠儿”，主持演出的剧团女团长渡边美佐发现了这个人材。她设想招集一批摇摆舞歌手，靠他们占领舞台，并把这个意图

对松竹和东宝两电影公司讲了，希望取得支持，但都未给以如意的答复。但是，到了一九五八年，日本剧场由于观众减少，决定演出西方摇摆舞，并要求美佐招集歌手。

美佐在颇受青年男女欢迎的爵士乐茶馆、泰乃西、维登尔舞厅选出了她已经相中的米吉·卡奇思、平尾昌章、山下敬二郎、冈田朝光、关口悦郎、中岛等十七至二十岁的青年歌手。

首次演出摇摆舞的情景，使人惊诧得瘫倒在椅子上。日本剧场的周围被十五、六岁的青少年围得密密麻麻，剧场内、舞台前挤得水泄不通，有的人随着乐队的节奏，情不自禁地用脚打拍子，如醉如狂。

歌手一出场，青少年观众就立即边呼喊着他们的名字，边挥动手帕。歌手的表演是抖动双腿，弯曲膝盖，身体以腰部为轴左右摇摆，好似断成两截，然后拼命地向上跳起，如此重复，直至累得躺倒在地动弹不得。当狂欢乱舞达到极点时，青少年向台上扔花束，放爆竹，撒纸屑、纸带等。兴奋的少女窜上舞台抱住歌手的脖子亲吻。纸带之类的东西扔光了，他们甚至跑到厕所去把手纸拿来撕碎往台上撒。最后把歌手从台上拖下来拉到观众席上，把演员的衬衫、外衣都撕破，连混饭吃的吉它也给弄碎了。

就这样，摇摆舞暴发般地流行起来了。接着在独乐剧场、大阪剧场，又再次在日本剧场不断演出。摇摆舞的魅力与日俱增，疯狂的程度竟无止境地加剧。每当有摇摆舞狂欢会时，剧场内总要布置许多消防队员，把厕所关闭，卖纸带、口香糖的小卖部也都停止营业。

一九五八年九月六日，“这才是真正的摇摆舞”——来自美国的十七岁的歌手安卡受到交口称赞，摇摆舞在日本也终于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吉拉德暴行事件的裁决

在干旱和冷害时有发生的海拔四、五百米的火山灰地——群马县相马村，一九五七年一月三十日，村议员板井利吉的妻子板井仲子，被特种二等兵威廉·S·吉拉德枪杀。那天，仲子到美军演习场相马原去捡子弹壳。把拾来的子弹壳集中起来出售，占农家收入的三、四成，因为村庄被征用做美军基地了。这天，仲子到那里一看，八、九十个人，其中夹杂着女孩子都在忙着捡。

“老太太、老太太！”吉拉德指着壕沟，引诱她去那里拾，于是仲子下去了，同村的小野关次也正要下去时，吉拉德就开枪了。当他要打出第二枪时喊道：“从壕沟里滚出来！”仲子三步并两步从沟里爬出来时，吉拉德的枪口已经喷出火焰，仲子当场就被打死了。

这一案件提交到日美共同委员会。日美双方就裁判权问题发生了纠葛。美国方面强调“吉拉德是在执行勤务中，应由美国裁决。”日本方面说：“不是因为执行任务犯罪的，所以裁判权在日本。”

至五月，美国才通知说“不准备行使裁判权。”于是，五月十八日，日本检察厅受理了对吉拉德的起诉。但是美国国防部长威尔逊表明：“在重新审查之前，不能把吉拉德引渡给日本方面。”这引起了美国国民的不平，骚动在扩大。六月四日，杜勒斯国务卿与威尔逊共同声明：“服从日美共同委员会的决定。”但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判决“应交美国军法会议处理，不允许引渡给日本。美国政府向最高法院提出诉讼。七月一日，最高法

院驳回了联邦地方法院的判决。于是，吉拉德终于站到日本前桥地方法院的被告席上。

判决拖延到十一月十九日，吉拉德以伤害致死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四年执行。虽然有“判决过轻”的呼声，但日本检察机关也没有再提出起诉。

残害女招待员留下的恶劣影响

日本获得独立后，驻留美军虽有减少，但随着民间航空与贸易的发展，出入日本的一般外国人数量在增加，他们的犯罪活动也随之增加。仅以一九五七年为例，除驻留军的犯罪外，其他外国人的犯罪达七万零七百五十八起，检举六万六千二百余人次。一九五八年三月，警视厅对过去四年间外国人的犯罪案件进行了统计：抢劫案一百三十三件，强奸妇女案二十九件，杀人案七件等，共计二千六百六十五起，检举率占百分之九十五。

在外国人的犯罪活动中，绝大多数是走私和秘密贩卖麻醉品。日本成了亚洲地区麻醉毒品中转基地。据厚生省一九五八年的调查，在日本国土上，战前吸毒者数目有限，可是战后竟达四万人。海关警察搜查破获走私麻醉品、幻觉剂的活动非常困难，因为对方是外国人，具有不受日本法律约束的特权和组织，并且海关警察的搜查经费一个月只有五、六百日元。但一九五九年警视厅跟踪追击了战后最大的麻醉药大王——中国人王汉胜——在大阪将其逮捕归案。

在骚扰社会安宁的外籍人犯罪案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杀害女招待员一案。那是三月十日晨，在东京杉并区大宫町的善福寺河里，发现一具溺水女尸。经高井署调查，原来是英国海

外航空公司雇用的“航空小姐”武川知子（二十七岁）。

解剖检查结果，身体上有象是绳索绞过的皮下出血和溢血，并判定发生过两性关系。推定死亡时间为十日上午五时左右。被害人是兵库县西宫市某公司经理的女儿，前后在宝塚的圣心女子学院和新宿的圣母短期大学毕业后，一月五日入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工作，预计本月十三日做为首次工作任务在飞往香港的飞机上当招待员。所以根本不存在自杀的因素。

侦查结果表明，“现场附近的土地是暗色的，看样子是被什么人带到这里杀害的”。“虽然没穿外衣，但看样子口袋里的钱没有被盗”。根据这几断定为情杀案。

首先对与她有来往的十五、六个男朋友进行调查。经过一个多月时间，一个一个都被解除了嫌疑。最后剩下一个名叫帕鲁门修的神父。他与武川最亲近，是一位在宗教出版社工作的比利时人。警视厅要求他抽空儿到警视厅接受质询，但他置之不理。

五月十一日，警视厅搜查一课的加藤主任警官、平塚侦探长等人亲自去找帕鲁门修神父询问有关情况，从七点半开始大约谈了十个小时。十二、十三日两天接着谈，神父始终顽固地拒不回答问题。但是经各方面调查大体搞清了以下情况：

首先，一月八日帕鲁门修神父与武川同在原宿的菊富士饭店的一个房间里休息，房门锁上长达三个多小时。

第二，三月五日下午二人驾驶汽车出去兜风，帕鲁门修神父把武川直送到她家门前。

还有，帕鲁门修神父经常到荻洼车站前的食品店去买罐头之类的食品。

但是，还是没有抓住决定性的犯罪证据。神父于五月二十

二日自称过度疲劳，身体衰弱，住进了下落合的圣母医院。随着侦查的深入进行，对神父的怀疑更深了。从武川的尸体里检查出的精液如果能与神父的唾液对照将取得科学的证据，但是这种侦察和其他科学的侦破手段，由于他作为外国人的特权和上一个世纪留下来的宗教特权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未能付诸实施。

在预定六月十三日第六次传讯他之前，六月十一日，神父孑然一身，乘在羽田机场起飞的喷气式客机返回比利时了。回国的理由是“案情的侦查要长期化，本人胃病复发，疲劳得很，需要休息。”于是，这桩案子在许多待揭之谜尚未解开的情况下不了了之，搜查本部宣告停止工作。

其后，田中澄江在《妇人公论》上发表文章，表示同情涉嫌的神父：“神父怎么会干出那种丑事呢？”这是一种受宗教蒙蔽的愚见。他如果是清白的，为什么不积极配合侦查，证明他的无辜？从这种逻辑出发猪俣胜人创作了电影《有罪还是无罪》。天主教徒们对此提出了抗议。这是一桩在日本人中间留下恶劣印象的案件。

一九五八年，安藤帮的“杀人魔王”千叶一弘，在银座东洋邮船公司办事处袭击了该公司经理横井树，制造了一起手枪伤人事件。横井在白木屋百货公司家族内部纠纷中是活跃人物，所以有关他的报道立即使报纸杂志热闹起来。警视厅搜查二课逮捕了安藤帮的头目，强行解散了他们的暴力团。

一九五八年度的犯罪事件与上一年度的数量基本相当。作为特异犯罪的案件，有十八岁的高中一年级学生李镇宇（朝鲜族）杀害了二年级学生太田芳江的杀人案。一九五九年的犯罪案件仅上半年就达七十二万余起，比上一年增加百分之五点

六。盗窃与暴行犯罪的增加最为显著。十一月二十四日，以卜卦为业的高岛象山被一位来他府上叩门的年轻人杀死。“你不配当算卦先生。”这就是杀人的理由。

红色灯光是这样消失的

这一时期的犯罪案件，有几起是国会议员和官僚们的贪污案件。尤其是一九五七年有两起重大贪污案件被侦破。

其一是卖淫业贪污案。为了防止卖淫，妇女团体和国会女议员们，曾五次向国会提出卖淫处罚条例等法案，但是由于卖淫业经营者的反对和保守党议员的消极抵制，眼看又要被否决或夭折，但保守党迫于舆论的压力，只好以“设立审议机关，拟定综合对策，下次国会再议”的附加条件议决。

根据这项决议，政府决定草拟卖淫防止法。一九五六年三月，拿到以菅原通济为委员长的卖淫对策审议会上讨论。向国会提出并通过，是在五月二十一日。

但是卖淫防止法的不足之处是，对卖淫行为没有处罚规定，承认在室内的个人卖淫形式。但如果遭到娼妓们的拒绝，没有设施可资用于收容她们。因而这一法律犹如竹篮打水一场空，被斥之为“竹篓法”也就在所难免了。之所以拟出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竹篓法”，是由于幕后有卖淫业者团体——“全性联”（全国性病预防法自治会）对一部分保守党议员进行通融，使之成为他们在国会上反对卖淫防止法的代言人。

全性联本部设在面对港区虎门大街的某理发店的二楼上，虽然看上去门面小而且粗俗简陋，但决不可小瞧他们的能量。在东京由新吉原咖啡馆工会、新宿咖啡馆工会与都内的十九个工会共同组成了东京都联合会。在全国的九百六十八条特饮

街^①上有九百六十八个组织，他们分别按都、道、府、县组成联合会。这些联合会又按北海道、东北、关东地区结成联盟，大小组织如蛛网密布，条条通向其中心——全性联本部。

全性联反对卖淫防止法，为了拖延该法的实施，从各经营卖淫行业者征收政治资金，虽然在帐面上记载的是四百二十万日元，实际上一九五五、一九五六两年间总额达三千五百万日元左右。在新宿向每个从业者摊派一千至两千日元。尤为严重的是，他们还残酷地刮娼妓的油，说是“为了你们”，向每个娼妓征收一百至二百日元。

这些钱都流进了众议院法纪委员会和自民党风纪委员会议员的腰包。从全性联没收的笔记本中记载着三十个议员的名字，每个名字的后面都盖有“收讫”的印迹。在议员的名字下面，还有进行通融的业主的名字。

一九五七年十月三十日，决定以“收贿十万日元”嫌疑逮捕了国会议员真锅仪十，接着又以收贿十万日元、一百五十万日元嫌疑分别逮捕了椎名隆和首藤新八。在此期间，全性联的理事长铃木明、副干事长长谷川康也因行贿嫌疑被逮捕。

这样，在一九五八年“红色灯光”终于消失了。在武藏八丁一带——吉祥寺的妓院于一月十二日关闭，这在都内还是从未有过的事。在战后极为繁盛的新宿区，五十七所妓院均于一月二十九日一齐摘掉了门前的红纱灯。自德川时代以来传统的嫖赌场所——吉原妓院，这时仍逆时代潮流，把一百三十四所妓馆、六百七十四个妓女一齐转入地下经营。尽管如此，门前的红灯却不得不一一取下来。

另一桩贪赃枉法事件发生在全购联（全国购买农业协同组

以经营卖淫、色情行业为主的街道。——译者

合联合会)。经理部会计河村秀郎侵吞了五千六百万日元公共资金。

当局逮捕了同案犯太阳汽车公司筑地营业所长东海林竹次郎，接着又以受贿嫌疑逮捕了农林省经济局肥料课长助理海内藤作。负责调查全购联案件的山川一三听信全购联干部们轻描淡写的供述，因办案不善受到警视厅的追究，最终大量吞服农药自杀了——又是一幕悲剧。

菅生、八海案件的审判

此外，这个时期还有几个重要案件的裁判 也有必要记载下来。

一个是菅生事件。这个案件发生在一九五二年六月二日上午一时。大分县竹田市菅生村的警察驻在所发生爆炸，五张隔扇、两块地板、一把椅子被炸坏。巡警大户三郎与妻三千子没有受到什么伤害。看样子是把填满石子和炸药的啤酒瓶，从窗口投进去引起的爆炸。

可是在审判过程中逐步搞清了这一简单案件的背后却设有圈套。案件发生的当天夜里，日共党员后藤秀生、坂本久夫二人被一位自称是日共党员市木春秋的男子叫出来，到指定的地点去，在那里他们俩接受了一个用包袱皮儿裹着的大包裹，里面是农民报、标语和对党的报告等。当他俩拿着这包东西往回走，路过菅生驻在所时恰好发生爆炸。与此同时，从旁边的田地里窜出的警官将他二人逮捕。此外还抓住三名日共党员。

后藤与坂本始终咬定没有事实根据，拒不认罪。但警方声称在现场看见他们做案，在包袱里面有标语和其他东西，并且从坂本的衣服口袋里搜出炸药、雷管、电灯泡，因此以违反

“爆炸物取缔罚则”和“杀人未遂罪”起诉。

经大分县地方法院第一审裁定，判处坂本有期徒刑八年，后藤有期徒刑十年。二人向福冈高级法院上诉。可是正当第二审进行的过程中，事实被暴露出来：那个自称是日共党员市木春秋的人，原来是大分县巡警户高公德。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的公判庭上，被迫站在证人席上的户高证实：“为了深入摸清共产党的情况，诡称自己是共产党员，把炸药交给被告，让他们去炸驻在所。”地方法院于九月十七日决定以违反“爆炸物取缔罚则”对户高提出起诉。当时，舆论界对这种“钓饵”式的对付日共的办法，不禁愕然。

另一案件是历时八年争执不下的八海事件。这桩案件的发生，需要追溯到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左右，在山口县麻乡村的八海，住着早川惣兵卫和早川久老夫妇俩，一位邻居来他们家送还借用的多层食品盒时，房门紧闭，隔着玻璃向里望去，只见老太婆吊在隔扇门的框架上，在隔壁的房间里，老头子的上半截身子露在棉被外面，沾满血污，已然死去。金钱被盗走。作案时间大约在前一天夜里。

看样子案犯是知情者，壁板下面的地板留下撬过的痕迹，地板下面的土地上留有人爬过的痕迹。案发后第二天逮捕了嫌疑犯——青年人吉冈晃。

吉冈苦于负债累累无力偿还，一月二十四日晚，下定决心要去早川惣兵卫家行窃。九时许，他喝了几口烧酒壮壮胆，把早川家的窗子撬开，钻进了厨房。待到九时左右，吉冈照着惣兵卫的头部连砍几斧，因早川久呼唤一声“有强盗！”就用棉被蒙住其头，死死地捺住她的嘴，然后用力把她勒死。

吉冈打开五斗橱的抽屉，拿出五张一千日元、约二十张一

百日元、五、六十张十日元的票子揣进口袋，又把现场伪装成夫妻打架致死的样子，然后从地板的边缘钻进去贴着地面爬行，爬至靠墙的地方，将壁板下面撬开钻出来逃走了。

虽然吉冈供认是自己一人作的案，但是坚信有数人共同作案的警视厅却严加逼供。吉冈为摆脱苦境，又供出朋友阿藤周平、稻田实、松崎孝义、久永隆一共同作案。但在这个过程中，吉冈曾几次翻供。终于在二月十五日向山口县地方法院岩国分部起诉了吉冈等五人。一九五二年六月二日，一审宣判阿藤死刑，吉冈、稻田、久永、松崎无期徒刑。被告向广岛高级法院上诉。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八日，第二审判决阿藤死刑，吉冈无期徒刑，稻田有期徒刑十五年，松崎、久永有期徒刑十二年。五个被告又向最高法院上诉。

不久，吉冈撤回了上诉，服从判决。阿藤等四人继续强调无事实根据，不服判决。这次上诉终于得到承认。最高法院于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五日指令：“驳回原判，由广岛高级法院重新审理。”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广岛高级法院终于宣判四人无罪，断定这一案件是吉冈一个人单独干的。

第十五章 战败后的 惨状远远消遁

(一九五七年——一九五九年)

公寓楼群接连出现

与摇摆舞带来的喧闹；“日教组”反对教员勤务评定的怒吼；在野党、总评、全学联反对新安保条约的大合唱毫无相干，在一九五七至一九五九这三年间，贫困与乏力的“战时”、“战后”状态远远消遁。因为不了解大东亚圣战的、战后出生的人逐渐增多。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八日，在东京文京区的某中学里，以“十二月八日”为题，让学生们写作文。能够从这个题目联想到它是“开战的日子”进行写作的学生只有两人，甚至有的人写“年末大甩卖开始的日子”，还有人写“大力士若羽黑结婚的日子”。

但是，并不仅仅因为战后出生的人增加，而使“战时”、“战败”状况消失，更主要的是神武、岩户景气带来的经济繁荣与物质文明所至。经济与文明的发展，从一九五五年四月矿工业生产指数为一百六十四点一，达到战后最高水平，可以得到证明。经济的发展，为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改观带来了现实的可能性。

表现之一：大约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在都市里，不断有高

层建筑拔地而起。排列如林、交织如网的高层公寓楼群连连出现。在城市里，如要建筑独家住宅楼，由于地皮和材料昂贵，靠一家一户的财力物力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大概由于战后的困难状况吧，那时大多数人都住在战后草草盖起的简陋的公共住宅里，所以这种崭新的高层公寓楼成为大众向往的住宅。迁入那样的新居是非常惬意的事情。

“公寓”一词并非这时的新发明，其来源可追溯到大正八（一九一九）年，当时制定的都市计划法里面就有“一幢公寓住宅的经营”这样的词句。战后，一九五一年实施的公营住宅法里面也有“在一幢楼的面积上至少要盖起可供五十户居住的房间”。

战后最早出现的公寓楼群，是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在千叶县柏市光丘的一片松林里建起的一片钢筋混凝土的大楼，占地十二公顷。每套房子包括约十二平米和九平米两间住房，有上下水道、洗物槽的厨房和西式浴室、阳台等。对光丘式的公寓设计不断加以改进，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间象东京三鹰新市区，大阪的千里山、旭丘，名古屋的志贺那样高级的公寓楼群如雨后春笋般地接连涌现出来。

一九五九年开始建造规模比上一年大四、五倍的公寓楼群。东京的东摩平，大阪的香里等处都是那样。其中有豪华的住宅区，居住人口超过二万，占地面积一百六十八公顷，有小学、中学、医院、污水处理中心、邮局和行政机关的招待所等设施。完全无愧于“新市区”这个名称。

一九五九年，全国新建的公寓楼达五千余幢，有三十五万户约一百万人搬入新居。诚然，这些公寓楼的地点都是建筑公团或公司容易搞到手的地方，也就是离市中心较远的地方。这

给职工上下班带来困难。居住这种住宅的经济条件是每月收入三万五千日元以上。这些缺点受到了谴责。

吃烤面包，穿尼龙织物

在这一时期，饮食生活也较之战前、“战后”有迥然不同的变化。早餐吃面包，咖啡，还有麦片粥或玉米粉饼——已经完全美国化了。

战前，稻米在日本人的主食中占百分之八十六，可是到一九五九年，它的地位已被面食所动摇，面食的比重上升至百分之二十六。

副食方面，肉、鱼、干货、蔬菜的食用量不断增加，进而阔气到牛奶、黄油、奶酪等畜产品；西瓜、桃子、苹果、蜜桔等水果的消费量显著增长。饮料方面，绿茶的消费比率下降，传统的日本酒的消费量减少。而咖啡、啤酒、威士忌等西洋饮料的消费量大大增加。

随着饮食生活的变化，日本人营养摄取量的提高自不待言。据厚生省的调查，如果以一九五一年度为一百的话，一九四九年度为八十——九十。一九五三年激增至一百——一百一十。一九五七年达到一百一十——一百二十。蛋白质的摄取量一九六〇年每天平均六十九——七十克，达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三十，脂肪的摄取量达到平均每天每人二十三——二十四克，是战前的两倍。

在衣着、服饰方面，一九五三年以前，必要的服饰只能重点地添置。但此后，即便昂贵的衣料，也可添置一些备用了，尤其是尼龙、维尼纶、涤纶等化纤制品迅速多起来，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穿着打扮。一九五九年合成纤维制品的生产达四十六

万五千吨，比上一年度增长百分之二十五，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尽管也有物价上涨的烦恼，但是，工资的增长异常显著。从国民所得的分配来看，在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八年，个人业主的所得几乎没有变化。相比之下月薪收入者的劳动所得增长约三倍。据劳动省统计，一九五八年度，主要产业的月平均工资是，男工二万五千零五十一日元，女工一万零六百一十六日元。

家庭经济进一步恢复和健全。从总理府统计局搞的家庭收支统计来看，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一般家庭每月平均饮食费一万二千一百六十日元，被服费三千五百零七日元，光热费一千四百八十六日元，住宿费二千四百四十五日元，杂费八千五百七十八日元。虽然恩格尔系数比较高，达百分之四十三点八，但勿宁说那是由于饮食极为丰盛甚至奢侈造成的结果。

电气化产生的三种“神器”

在生活上超过了衣、食、住诸方面的更大的变化是家庭生活由于电器化而向着省力、省时、合理化的方向发展。专家们通常把一九五〇年称之为“日本家庭电器化元年”。到一九五六年，继洗衣机之后，电视机、电冰箱也基本齐备了。这三大件被称之为家庭电气化的三种“神器”。在此期间，电炉灶、电锅、电风扇、电水泵也普及了。

三种“神器”的普及情况是：一九五九年度，电视机月产二十五万台，城市里平均每四点二户有一台电视机，农村每二十三点三户有一台；洗衣机城市每三户有一台，农村每十四点七户有一台；电冰箱城市每十七点五户有一台，农村还是空白。

广播的收听率直到一九五五年继续上升，一九五八年签订收听契约者有一千四百七十二万五千余户，收听率达百分之八十二。

由于晶体管的出现使收音机在设计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半导体收音机做为定型产品开始批量生产，是在一九五五年。由于这种收音机体积小，坚固耐用，物美价廉，投消费者所好，需求量迅速增长。一九五九年生产的全部收音机中大约有一半是晶体管收音机，一时成为富有魅力的佼佼者。

电话的发达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时，市内电话机的一半，电话局的百分之二十七，市内电话线的百分之四十四蒙受了战争的破坏。当时只有五十四万一千九百五十三部电话，落到了十分可怜的境地。但是到一九五五年达到二百一十七万五千一百五十九部，一九五九年八月达三百零三万四千部。

即使这样，电话的普及率也只有百分之四十二，与美国、瑞典、加拿大相比还是相当低的，在全世界居二十一位。要求安装电话的用户猛增，到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全国有七十一万二千余部电话等待安装。

广播、电视、电话等通讯器械的迅速发展，受益于美军司令部的CCS，该机构的优秀专家、技术员向日本政府和产业界就超短波无线电、微波多重电路、自动交换台、雷达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指导。

自动化的作用

但是，从家庭电器化到新闻宣传事业的发达，从产业的飞跃发展到新建筑楼群的不断涌现，在这一系列现象的背后，有

某种战前不曾见过的东西在起作用，由于它的存在带来了现代化的繁荣。这种东西是什么呢？

它，就是被称之为电子技术的电脑。电子技术的最早应用是在电讯、电话方面。正是由于它的存在，使长途电话、多重通讯、微波无线电话等成为现实，使全世界的电话约有百分之九十可以互相通话。

在电子学的应用范围内，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通过电子设备进行的自动控制了。在一九五七至一九五九三年间，“自动化”成为流行用语。例如某电器生产者在推销其家用电器产品的广告中为了吸引顾客，创造出什么“自动化夫人”、“自动化生产的巧克力”、“自动化生产的运动鞋”之类的宣传用语。一九五九年在车站、街头出现了自动出售车票、香烟、点心等的自动售货机。在一个时期里，曾经把这些都叫做“自动化”。

英国的科学史家S·里利给自动化下的定义是：“通过使用高度自动的设备，大致消除人们的劳动或把人们从具体的分工岗位上解放出来。”此外，苏联总理布尔加宁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对自动化做过这样的解释：

“自动化就是使生产工艺所需要付出的体力劳动减少到最小程度。使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使劳动只是用在工程的管理方面。在这个基础之上自动化产生的效果是使产品质量提高、生产费用降低，尤其是提高生产工艺的稳定性与连续性。”

自动化生产，日本在五十年代中期是从生产太妃糖和运动鞋开始的。尔后逐步推广到肥皂、照像机、石油制品、水泥、硫酸化肥、钢铁、通讯等方面。不仅生产部门，象股票市场、保险公司、大公司的事务所等与数字的计算有重要关系的部门

也都运用 IBM·莱明顿公司的计算机、统计机、分类机等，实现了自动化。这些计算机等都是应用被称之为电脑、人工脑的电子设备进行自动控制的。

与自动化相并行，在这三年间原子能的研究与应用也在扎扎实实地进行。日美原子能协定的签订是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其后，日本政府制定了发展原子能的四年计划，并使有关法案成立。根据这项法律，一九五六年五月设立了原子能研究所。在茨城县东海村建立了日本最早的一座美国 JR——1 型原子炉。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五时二十三分正式点火使用。

做为参考资料应记载的，是日本国产的第一号大型原子炉也安装在东海村，与上述美国型 JR——1 号配套，点火运转的时间是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二日。

由此可见，从一九五七至一九五九三年间，日本的原子与电子技术，跨入了世界先进国家行列。在日本文明史上，这三年的时间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向“技术革新”突飞猛进的时代。

此外，不能忘记，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以此为契机，全人类进入了开发宇宙的新时代。连儿童玩具都出现了仿造卫星的模型，可见人类对宇宙的兴趣之浓厚。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日，苏联发射了宇宙飞船，使之成为太阳系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十月十日，又发射了宇宙空间实验站。成功地对人类无法观测到的月球的背面进行了拍摄。在这三年间，人类的梦扩展到浩瀚而神秘的宇宙。

第十六章 反对安保条约 与右翼的反击

（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

全学联成为反对安保条约的核心势力

岸信介内阁不得不在上一年推行新安保条约所招至的混乱中度过一九六〇年的上半年。

据一月十六日《朝日新闻》载称：“为反对岸首相的签订安保条约全权代表赴美，从一月十五日夜开始，有七百名全学联的学生在羽田机场大楼里静坐示威。警视厅出动两千多名便衣警察自十六日凌晨二时十五分开始采取统一行动，一鼓作气把学生们全部赶出机场。学生们拥挤到门廊旁边的餐厅里，用桌子、椅子在出入口筑起工事，但是全副武装的警官队伍赶来，把顽强抵抗的学生们全部逮捕……。”

在反对安保条约的骚动中，全学联一跃而成为世人瞩目的势力。它的全称是“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是全国各大学产生的学生自治会联合起来组成的团体。最初成立于一九四八年，以维护学生生活、权益和日本的独立、和平为宗旨。实际上，由于共产党的领导，反对修改“防破法”、“警职法”、反对美军基地等，沿着反美、反保守的政治方向前进。

尔后，随着反代代木（反共产党）派势力的增长，一九五

八年以后该派掌握了主导权，逐步走上过激化的道路。一九五九年总评、社会党、共产党等组成了“阻止安保统一国民会议”，全学联占据其中一角阵地，上升为核心势力，在羽田机场骚乱中的表现是全学联行动的开端。

即将在华盛顿签订的新安保条约进入国会批准阶段，“阻止安保统一国民会议”的反对运动随之日趋激化。在永田町一带连日来游行示威的声浪此起彼伏。还演出了“反对安保条约”、“打倒岸内阁”等诗歌联唱节目。从《朝日新闻》四月二十六日的报道题目“阻止安保条约签订的学生示威在各地”、“在国会前静坐”、“全学联一万数千名学生的行动”等看来，在这场斗争中全学联如鹤立鸡群，分外惹人注目。

五月二十日天未明，自民党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单独强行通过了新安保条约，从而激起全学联的反抗怒潮。据五月二十一日《朝日新闻》报道：

“二十日午后四时左右，在参议院附近的道路上集结了七千余人，企图闯入国会会场。他们挽臂列队，群情激昂，曲折前进奔向国会正门，在门前与武装警察相遇……他们一看强行通过已不可能，便立即折回来奔向首相官邸。六时三十分左右，在官邸北侧警戒力量薄弱的土堤处冲了过去，砸碎了大门，约二百名学生冲进官邸内，与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警察二十九人、学生二十人、其他群众三人负伤。”

哈格蒂一行乘直升飞机脱险

接着又发生了哈格蒂事件。这一事件是由于岸首相以批准新安保条约为契机，邀请艾森豪威尔总统访日引起的。为磋商总统访日事宜，总统的新闻秘书哈格蒂一行于六月十日下午三

时四十五分飞抵羽田机场。美国驻日大使麦克阿瑟前来迎接。当他们乘坐的两辆汽车行驶到机场出口的天桥时，被总评、全学联的五千人游行示威队伍团团围住。愤怒的人群从两侧摇动汽车，用标语牌猛砸车身，打碎了车窗上的玻璃。四时过后，前来解围的警官队伍与游行队伍相遇。在双方乱作一团的当儿，哈格蒂一行换乘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直升飞机脱离险境。

趁此势头，“阻止安保统一国民会议”于六月十五日在全国动员了六十四万人，搞起了统一行动。在东京，全学联七千人于晚上六点多钟和七点多钟先后两次发动冲击国会的攻势。他们把点着了火的纸团扔进警官队的卡车，拔掉国会周围的栅栏，与警官队伍交手撕打、混战。

第二次冲击国会时，发生了东大学生桦美智子被压死的事件。由于混战的激化，警察当局开始明确表示：“不敢担保艾森豪威尔访日的安全”。科学技术厅长官中曾根康弘认为：“从日本方面提出推迟艾森豪威尔访日的行期，也是符合国际礼仪的。”岸首相向已经到达马尼拉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了延期访日的要求。

虽然艾森豪威尔访日之事告吹，但从此以后舆论的风向大大地改变了。过去舆论一直是谴责岸内阁的，现在变为“赞成岸内阁悄悄地推行新安保条约”。也就是说，舆论不再象以前那样绝对地反对了，而只是反对岸内阁强行推行安保条约的做法。

阻止缔约运动通过哈格蒂事件、冲国会事件等的向暴力运动升级，从而导致舆论的矛头所向发生逆转。六月十七日，朝日、每日、读卖、日本经济等各大报刊共同发表宣言：“排除暴力，保卫国会”。

由于岸信介内阁在安保条约成立以后二十三日声明内阁总辞职，反对运动偃旗息鼓，反而使舆论对社会党、共产党、总评、全学联的过火行动加强了批判。

浅沼稻次郎在讲坛上遇刺

一九六〇年是个多事之秋。上半年在安保骚动中渡过，下半年又连续发生极右分子的暴力行动。

第一阶段是在反安保条约运动如火如荼的六月十七日发生的。当天下午六时十分左右，社会党顾问河上丈太郎与夫人来到众议院的议员会客室。他们是专门来会见基督教方面的学生并听取他们的陈述的。

恰好就在这时，一支反安保条约的游行队伍从国会议员会客室前面经过，他们的齐声朗颂传进会客室。河上站在高出地面二、三级台阶的正门口向过路的游行队伍招手致意。从队伍中跑出一个身穿土黄色衬衫的男青年，从他的右手里飞出一把小刀向河上刺去。河上的右肩部受伤，伤口的长度大约要缝五、六针。犯人是工友户间真三郎（二十岁）。他向有关官员暴露犯罪动机说：“对全学联感到愤怒。想要让社会党进行反省。”

接着是岸信介首相被刺。七月十四日举行自民党总裁公选，池田勇人当选为岸信介之后的新总裁。当天下午在首相官邸的中庭举行祝贺池田就任招待会。当岸信介走到官邸正门准备回家时，一个突然出现的男子往他脚上刺去，伤六处。犯人名叫荒牧退助（六十五岁），这个战前曾任右翼团体“大化会”干事长的男人自供行刺的理由是“岸信介在安保条约问题上干得不漂亮。”

在矛头指向政治家的暴力活动中，冲击力最大的莫过于暗

杀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事件。无论保守派还是革新派，大多数人都亲切地称呼浅沼稻次郎为“沼先生”。他是一位深得人心的政治家。浅沼的意外之死是在池田内阁诞生后第三个月的十月十二日。因为即将举行总选举，三政党首脑在日比谷公会堂举行会谈。台上坐着自民党总裁、首相池田勇人和民社党委员长西尾末广。浅沼站在讲坛上正在讲演。会场充斥着右翼分子的怪叫和怒吼声。会议主持者要求与会者保持肃静。当浅沼又接着进行讲演时，奚落、嘲笑、喝倒采声顿时再起。与此同时，右翼分子从二楼上往下撒传单。这些场面都被电视接收了。

趁着这阵骚乱，一个男人窜上讲台，用双手握住刀柄，拼命地向正在演讲的浅沼刺去，浅沼被刺中，眼镜飞出老远，巨大的身躯栽倒在讲坛上。凶手当场被抓住，竟然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名叫山口二矢。

山口是个右翼分子，在高中时代就有“右翼野郎”的绰号。一九五九年春，在街头听到爱国党领袖赤尾敏的演说，当场加入了爱国党。由于妨碍反安保条约游行和禁止原子弹大会以及散发传单等，一年之中曾十四次被拘捕或传讯，迅速地成长为激进的右翼少年，并从思想上发展到“一命换一命”的亡命徒理论。他父亲是陆上自卫队的一等陆佐。他盯上了父亲的短剑，产生了行凶杀人的动机。

负责审理山口案件的东京地方检察院追查了山口背后是否有指使人，但他一口咬定是自己主动单独犯罪，与他人无关。在调查期间，把他交给了少年鉴别所。他在一号房间里将床单撕成二、三公分宽的布条儿，编成一条约三米长的绳子悬梁自尽了。墙壁上留有他用牙膏书写的几个大字：“天皇陛下万岁！七生奉公。”

《风流梦谭》招致的暴力骚动

在右翼的极端行动不断加剧的一九六〇年，《中央公论》七月号发表了深泽七郎撰写的《风流梦谭》。深泽是在他的处女作《橿山节考》中显示出特性的作家。《风流梦谭》写的全是作者在梦中所干的革命行动。革命的结果，杀死了天皇，绞死了皇太子，拿他们的脑袋当球踢——如此等等。

宫内厅认为这篇作品很成问题，要求法务省从法律的角度研究是否“有意毁谤皇室”。趁此机会，右翼集团积极鼓动要《中央公论》杂志社赔礼道歉。

由于《中央公论》杂志社社长嶋中鹏二、总编辑竹森清向宫内厅进行了赔礼道歉，宫内厅也不打算追究其毁誉罪，这个风波基本平息了。但右翼团体不肯就此善罢甘休。作者深泽七郎躲藏起来了，他们便盯住《中央公论》杂志社不放。在深泽的作品中有这样的句子：

“这次把美智子妃的首级轱辘轱辘地当球踢时却发出了金属般清脆的声音。”

“昭宪皇太后在我面前一出现，我立即扑上前去，揪住她怒骂道：‘你这个臭婆娘！’。于是皇太后也瞪着眼回敬一句：‘什么，你这臭小子！’……”

这些污言秽语不要说对皇太子、美智子、皇太后，即便对布衣百姓也够得上毁誉罪了。一般说来，这部作品起码是令人不快的。正因为如此，《中央公论》杂志社的道歉不能算完，右翼集团更加愤怒了。

翌年年初，大日本爱国党员小森一孝（十七岁）袭击了《中央公论》社长嶋中鹏二的住宅。大约在夜间九时半左右，潜入接

待室的小森把 嶋中的夫人和管家妇丸山抓住威胁道：“你们知道吗，《风流梦谭》全是胡说八道，让社长滚出来！”。当告诉他社长不在家时，他说“那么，就杀死你！”说着，少年用登山用的刀子刺向她们主仆二人，当少年把刀伸向夫人时，丸山飞身过去用身体挡住了夫人，刀子直刺进丸山的心脏。然后小森又拔出刀子向夫人的左臂、右胸部刺去，夫人受了重伤，两个多月方愈。次日早晨，小森到浅草山谷派出所投案自首。

第十七章 向经济高速增长突飞猛进

(一九六〇年——一九六四年)

大胆地提出“月薪倍增”的口号

反对安保条约的斗争和右翼的反击，构成政治上充满杀机的一九六〇年。但实际上，其后半年，无论左派的斗争也罢，右派的反击也罢，什么都阻碍不了社会发展的势头，它飞跃般地跨入了“经济优先”时代。这是因为池田首相提出了“高速增长计划”。池田把这项计划称为“所得倍增论”、“月薪倍增论”，向大众进行宣传。对于安保骚动之类的意识形态斗争、政治暴力化等等空洞的政治斗争已经厌倦了的大众非常赞成这项计划，欣然拥护“经济优先”。一些企业由于得到池田经济政策的指导，飞向高速增长或者向高速增长起飞。这项计划是由开发银行理事下村治等人拟定的，其内容概要为：

“增长率每年百分之十至十六（与西德并列），使日本成为重化学工业先进国、出口国。为此，必须通过财政贷款、金融机关贷款使企业得以扩大设备、实施技术革新。如果这种方法能使增长率在十年间持续上升，产量将达到今天的四倍，届时商品将通过大量生产而降低成本由于提高技术设备而改善产品质量，获得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得以扩大出口。企业不仅

可从高利润中收回投资，而且能使职工工资增加一倍。”

诚然，这种高速增长的想法来源于马琴·李朴赛特在《政治性的人们，政治性的社会基础》中所阐述的：“在当代，政治的效果意味着首先要不间断地发展经济。凡是出色地适应工业体制条件的国家，其国内政治紧张因素也最少。”这已成为世界各国纷纷追求的目标。

当时，日本已经向高速增长迈出了第一步。“神武景气”、“岩户景气”就是明证。公寓、电器化产品、自动控制的发展、矿业生产的上升等等都显示出高速增长的初期阶段。一九五九年八月，日产汽车公司开始出售小型汽车。一九六〇年四月索尼公司开始销售晶体管电视机等，这些也是高速增长初期阶段的标志。

池田的高速增长计划并不是过去不曾有过的新经济政策，只是给已经开始了的东西赋以合理性、有效性和系统性，为其增加了加速度。因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果。

实际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达百分之十七点五，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七〇年十年间增长了五倍。按人口平均国民所得一九五一年只有一百七十九美元，可是实施高速增长计划四年以后的一九六四年竟达到八百一十美元。一九七〇年又增加到一千三百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这种增长速度究竟有多快，与各国比较一下便可一目了然了。一九六一年至一九七〇年的十年间美国的增长率是一点九倍，西欧是二点三倍，东南亚是一点七倍，只有日本以五倍的增长遥遥领先。

再把出口的增长率做一比较。日本的年增长率是百分之十六点九，十年间增长四点八倍；美国增长率为百分之七点六，

十年间增长二点一倍；西欧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十点四，十年间增长二点七倍，只是日本的一半。

关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连《伦敦经济学家》杂志也发表了“令人惊叹的日本”、“日本是后起之秀”等文章。虽然也指出了日本经济的内在缺陷，但结论还是盛赞日本经济的发展。以至池田首相当之无愧地宣称：“日本已成为经济大国。”日本豪迈地跨进了世界先进国的行列。

高速增长带来的巨大财富

这一高速增长计划使社会资本充实，给国民带来巨大利益。东海道新干线、高速公路、都市环境的整備等公共设施得到飞跃的发展。个人消费支出增长了一倍。其结果，导致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三年间出现许多过去不曾见过的经济、社会现象。

首先要求各大企业着眼于高速增长，在选择厂址时集中于东海道新兴城市群。由此，引起了土地价格的暴涨。不妨举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据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八日国税厅发表的土地价格，最高的是东京银座四丁目的三爱前，那里每坪（三点三平方米）土地价格高达二百七十三万日元。

不仅土地，一般物价也开始上涨。战争刚刚结束时的价格姑且不论，从战后日本的物价来看，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时期受特需景气的影响，物价的上升与前一年度相比达百分之六。一九五六年鸠山内阁执政时，物价平均下跌百分之一。除了这两个时期之外，平均每年大约上涨百分之一，一直持续到一九六〇年。

可是，实施高速增长计划之后，物价每年以百分之六至百分之七的比率上升。在这里要插一句后话了，十三年后，即一

一九七〇年初，OECD（经济合作开发机构）对过去十年间十四个发达工业国的物价上升率做了一次调查，其结果表明，丹麦的物价十年间上涨了百分之七十一，居第一位；日本上涨百分之七十，居第二位。

其次，由于新建工厂集中在东海道都市群，导致这一地区人口高度集中。据厚生省人口问题研究所的调查，以高速增长期的一九六五年与一九五八年相比，在埼玉、千叶、东京、神奈川、静岡、爱知、岐阜、三重、滋贺、京都、大阪、兵庫、奈良、和歌山等十四个都、道、府县，共计增加了一千万人口。

由于人口过于集中，一九六二年在东海道都市群里的大城市发生了严重的房荒。在东京，住宅公团的申请竞争率是四点二倍，由此可见住宅紧张的程度。

高速增长一方面引起物价上涨和住宅难等不良现象，另一方面造就了至今很少有失业者的良好社会，这也是事实。甚至导致今天仍出现劳动力不足的现象。一九六一年十月在东京的荞麦面馆和中国风味菜馆贴出告示：“谢绝为顾客往家中送菜。”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少男、少女们都被境况很好的企业雇佣了，所以雇不到小伙计、女店员了。如果要求往外送菜的话，要付五日元至十日元的酬金。

随着高速增长，大企业所需劳动力增加了。一九六一年开始出现了“买青苗田”的招聘方式，也就是对将于来年毕业的高中生、大学生提前签订招聘合同。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八日，日经联决定“不必商定明年新毕业生的录用考试日期”，不得不承认各公司采取的“买青苗田”的雇佣方式一九六五年上半年对高中毕业生的雇佣甚为迫切，因此，当时的高中毕业生得了个高贵的绰号——“金蛋”。

“汽车社会”的利与弊

与经济的高速增长相关联，运输手段的发达也是相当显著的。运输发达的根基在于汽车。由于国产汽车生产的增长，自然而然地汽车保有台数增加。加之新建、整修、延长了高速公路、辅助公路和其他道路，这也为运输手段的发达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实际上道路设施还是远远落在后头，赶不上交通量的增长。一九六〇年前后，乘坐小汽车从永田町的议事堂到日本桥的百货大楼，如果赶上交通拥挤的高峰时间，这一段路程就需要行走一个半小时。

从汽车生产台数看：

一九五九年——轿车七万八千五百九十八辆，卡车十七万七千四百八十五辆，公共汽车六千七百三十一辆，共计二十六万二千八百一十四辆。

一九六三年——轿车四十万七千八百三十辆（五点一八倍），卡车八十六万二千七百八十一辆（四点八六倍），公共汽车一万二千九百二十辆（一点九一倍），共计一百二十八万三千五百三十一辆（四点八八倍）。

由此可见，自从一九六〇年实行高速增长计划以来，汽车生产有了飞跃的发展。从汽车出口量来看，一九五九年年仅一万四千九百二十八辆。可是到一九六三年增长五倍，达到九万零二百七十五辆。汽车数量如此增加，汽车保有量的增加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一九五九年全国只有三百四十万辆汽车，可是到一九六四年达到六百三十七万辆，增加零点八倍。

当然，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汽车的生产、出口和保有量，较之一九七七年则是小巫见大巫，不足称道。但一九六〇至一

九六四年汽车的增产，在当时也是相当惊人的。为了对付因汽车猛增所造成的交通拥挤，政府于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实施了新交通法。在一九六二年四月九日的“春斗”^①中，当十二家私营铁路公司的工人举行二十四小时总罢工时，乘私人汽车上班的人被截在路上，市内、近郊的交通完全瘫痪，到处停放着家用汽车。

不得已，警视厅于四月二十五日采取按车辆种类分别管理的办法，市内二十五条主要交通干线白天禁止卡车、拖车等大型机动车行驶。由于汽车增加、用汽车运输的货运量激增，这样反而使铁路的运输量下降，这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一大特征。

另一方面，随着“汽车社会”的发达，交通事故激增，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警视厅发表的交通事故白皮书表明：“到十一月底为止死亡一万零六百八十五人，平均每日三十二人。”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发表的交通事故白皮书说：“一九六一年共死亡一万二千七百七十五人，平均每日三十五人。”这些人多半是在运送砂石的“神风”翻斗车疾驰的车轮下做鬼的。

高速公路与新干线的建设

随着汽车上升为主要交通工具，高速公路的建设也在不失时机地进行着。这种高速公路的“收费制”是在一九五二年修改“道路法”（大正八年制定）时决定下来的。那是当时田中角荣在参观西德高速公路时受到启发产生的构想——“象西德那

^① 日本的薪金收入者在工会的组织下每年春季展开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斗争。——译者

样，征收道路税和汽油税，用来作为修建道路的财源。”但是，当初田中的这一构想遭到了大藏等省的反反对，认为这样搞违反财政法。田中不顾一切地激烈反驳道：“历来过渡口都是要交费的，从下关至釜山的渡船也要收费，河川、湖泊、海上交通不过是陆上道路的延长而已，为什么道路收费就违反财政法呢？”

一九六四年秋，从爱知县小牧至兵库县西宫约一百九十里长的名神高速公路修通了。这时东名高速公路、中央道、关越道路等连接全国主要城市的干线公路四千五百公里正在计划施工中。

其中东名高速公路在五年后，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大井松田（神奈川县）——御殿场（静冈县）之间的道路竣工。至此，东京——小牧间三百四十六点七公里全线通车。明治期间的经济高速增长与铁路的延长成正比例发展，六十年代后半期的高速增长则是与新干线道路的延伸成正比例发展的。

作为这个时期的产物，还应该记述一下东海道新干线。它是从一九六四年十月一日开始使用的。从此，从东京至新大冢乘坐“流星”号高速电动火车只需四小时，乘坐“四声”号只需五个半小时。东海道新干线的建设历时五年半，耗资三千八百亿日元。

在选定新干线的路线和车站问题上，沿途各县、市都希望“把车站建在我们的街上……”，为此展开强有力的运动。最典型的是岐阜羽岛车站。以这里作为选举基地的当时自民党副总裁大野伴睦听取了选民的要求，运用他的实力，终于在一块不毛之地中央建立起羽岛车站，使新干线的车辆能在这里停下。因而羽岛站又有“政治车站”之称。这种状况与明治时期以“如果在铁路沿线修车站，原有的驿站就要作废”为由反对在铁路

沿线设车站的情况恰恰相反。

一九六三年在小田原——三岛间的新干线试行通车时，以时速二百公里运行，乘客宛如坐飞机一样，一开始起飞时感到耳膜有点儿发疼。

新大阪——冈山之间一百六十一公里的新干线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五日竣工。冈山——博多间三百九十三公里于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竣工。

此外，在东京，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开始使用高速公路一号线和四号线（羽田——日本桥——新宿）关于都市的高速公路，笔者至今保留着难以泯灭的记忆，还是在一九五六年的时候，当我第一次在斯德哥尔摩看见市内交叉的立体公路时不禁惊叹：“这就是现代文明吗？什么时候日本能达到这种程度呢？”从那时起不到十年，日本就达到了这种境界，这全是高速增长的功效。

一九六四年八月四日东京的地下铁日比谷线全线通车，银座的综合车站诞生，这些交通网都赶在十月的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运转起来。

由流通革命导致薄利多销哲学

高速增长使大众的收入激增，购买力提高，汽车运输增长，这些势必导致流通机构的变化，被称为“流通革命”的新型流通方式也是高速增长期的新事物。

“流通革命”这个名词，最早见于林周二的著作《流通革命》。这种新的流通方式到底是什么呢？——“建立超级商店，减少流通环节，由于采购价格低廉，因而以较低价格大量销售，即一种无人售货的廉售连锁式的经营方式。”简言之，就是伴随

经济高速增长，把美国的流通方式移植到了日本。

在美国，“无人管理商店”的创始人是马伊格爾·卡伦。为了摆脱一九三〇年经济危机带来的不景气，卡伦想出了这个方案：

“首先要建立起超级市场，其规模之大令人惊诧，选择地价便宜的合适地点，备有宽敞的停车场。商店实行半自动售货，即百分之二十面对面售货，百分之八十靠机器自动售货。几乎所有商品都以接近商品固有价值最低价格出售。”

其实，这种经营方式在昭和初期，日本已经部分地采用了。昭和六（一九三一）年诞生的高岛屋均一商店便是那样办的。这家企业选择近畿、中部、关东地区的大城市开办一百个店铺。虽然不是自动售货，但一次购入大量货物，因批发价格低，能以商品的最低价格出售，薄利多销，效仿了美国的经营方式。正当他们受益于薄利多销的经营方式，眼看要发大财的时候，日本陷入了战争的旋涡，迫于物资匮乏，只好闭店搬迁了。

战后最早采用这种美国流通方式的是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在东京·青山开业的纪国屋食品店。那是一个无人管理商店，自动出售食品。接着于一九五七年出现了大阪·千林的大荣商店，它是由十三名男女店员办起的五十三平方米的简陋小店，第一年销售额只有二千万日元。

但是，进入高速增长期以后，自动售货、无人管理的薄利多销方式得到了爆发性的的大发展。仅从大荣商店的发展轨迹来看，一九六〇年只有四家店铺，从业人员三十名，销售额十三亿日元。到一九七〇年有五十八家店铺，从业人员三千名，售货额一千二百四十九亿日元。

从消费者方面来说，迄今一直习惯于到两种类型的商店去

买东西：一种是出售高级消费品的大型商店和百货公司；另一种是以日用百货为中心，专门出售中小商品的小店铺。可是在高速增长时代却发生了巨大变化，联营方式的超级市场的出现排斥了百货商店，也压抑了小商品零售商店。

此外，分期付款的发展也是“流通革命”的一部分。分期付款即按月付款，这种售货方式在战前已经开始。战争期间完全绝迹了。战后，从一九五三年开始，以收音机等电器产品为主，又恢复了按月分期付款的方式终于在大众生活中被固定下来。六十年代中期，约半数月薪收入者家庭所用电器约三分之一是采取分期付款方式购买的。利用按月付款方式购买高档消费品的人数逐年增加。迨至进入高速增长时代，更加直线上升。

商品广告的魅力

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三年间，消费生活水准显著提高的重要标志是电视机的迅速普及。一九六〇年八月家庭保有电视机数增加一倍达到五百万台，普及率达百分之四十八点五。固然，东京奥运会的召开也是促使电视迅速普及的原因之一。电视机生产厂商大力宣传“请为一九六四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召开做好观看准备。”NHK和“日本电视”也准备在奥运会召开之际开始播出彩色电视。这当然有助于煽起电视热。但是归根结底，国民收入的增加，购买力的提高是最重要的因素。

电视的发达与营利主义密切相关，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通过电视宣传把商品广告的巨大影响和涉及范围鲜明地展现出来。电视便于那些长年呆在家庭里的妇女和孩子们收看，较之阅读书报杂志容易得多，而且可以边干活儿边收看，在无意之中

就能听到、看到许多新鲜事物。由于它的这种特点，使那些以前很少有独立见解的家庭妇女们无形中接受了各种知识、见解。商业广告便充分利用了电视的这种属性，用它作为商品广告的宣传媒介。据“电通”的调查结果表明，一九五八年各种广告费总额为一千零六十五亿日元，与前一年相比增长了一百二十五亿日元。到一九六五年广告费总额增长到三点二七倍，达三千四百九十亿日元，其中电视广告费增长十七点二倍，广播广告费增长一点零八倍。电视广告的激增非常醒目。关于电视商品广告，一九六五年四月四日《读卖新闻》有这样一段报道：

“你不是没有肚脐儿吧？”——这是人们已经熟知的一句电视广告台词。有肚脐儿还是没有肚脐儿就不管它了。反正逗得观众哄堂大笑。还有“怎么样，不错吧？”、“你知道吗？”诸如此类的广告用语，一日无数次地由电视明星们轮番把它送入你的耳朵，使你不由自主地注意到它。这样，在我们的生活中，电视广告泛滥起来，以至使一些电视广告台词成了流行用语。

《读卖新闻》还对当时的电视广告形式做了如下分类：

企业广告——商业广告的主流。以介绍企业面貌为目的。例如钢铁业、建筑业等。电视明星把机械、资金、材料、建筑物、活动的吊车等，轮番送入电视屏幕，形式生动、活泼。

吸引人的句子——在电视节目中间以极短的时间穿插播出商业广告。由电视明星呼叫商品的牌号，例如“朝日啤酒”、“清爽”等。采用这种形式播出的广告，句子是否惊人，是否吸引人，往往比电视明星的魅力更重要。

当场试验——对于能够包锯齿形花边和绣花的多用缝纫机，新型洗洁剂，汽车等商品，广告员当场做试验，让电视观众亲眼看到其优良性能。在这种广告节目中，商品是主角，电

视广播员是配角。

单调的旋律——以轻快的节奏，便于记忆的单调的旋律为商品的名字谱曲，即商业广告歌曲。使电视观众不知不觉地把歌曲的旋律和商品的名字记住。例如杰利尾藤的“七枚鲜果”、弘田三枝子的“阿士巴拉（药）”等等。

胡诌、逗笑——利用电视节目中间只有五秒钟的短暂时间播送商品广告，目的是提高某种商品的名气。例如“鸡丝汤面”、“紫菜卷熟面条团”……。广告员多是喜剧演员，以滑稽的表演吸引观众的耳目。

推导褒奖——由某位明星介绍“我使用了这种商品”，由此引起观众的错觉，似乎如果自己使用这种商品也会象明星一样漂亮。这种广告要求电视明星诚恳，坚实，具有说服力。

制造气氛——主要用于化妆品、衣料、嗜好品的广告。通过这种广告使每个人都相信，只要自己使用这些商品，也会成为美男子或美女。

商品介绍——商品广告的正统派。是电器产品等商品广告的典型。介绍商品的质量、性能、使用、保管方法，寓科学于生活之中。

从《读卖新闻》对商业广告的分类可以看出商业竞争之激烈。经济学家大门一树说：“我们都被商业广告的宣传牵着鼻子走，又吃药，又吸烟，又化妆。”因而产生了“受宣传左右的消费者”这句时代用语。

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

随着消费生活水准的进一步上升，“娱乐时代”到来的先兆已隐约可见。从一九六一年开始，“娱乐”这个词儿在报刊、杂

志上到处泛滥。这一年的二月，经济企画厅对二千一百四十一户进行了业余生活调查：“看电视、听广播”的占绝大多数。其次是“看书、报、杂志”。“睡大觉”的也大有人在。虽然在家中度过业余时间的人相当多，但已经有走出家庭的意向。由于一九六〇年特尼·萨伊拉来日本表演，引起了滑雪热，滑雪的装束风靡一时，成为最新时装。

高速增长促进了交通网的整备，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乘大轿车长途旅行的团体增多。女事务员集体旅行的现象屡见不鲜。由于一九六四年贸易收支的黑字，允许自由到海外旅行。到海外观光旅游已经不是稀罕事了。不久又出现了一个时髦的新名词：“业余享乐”。夏季的定期休假也成为理所当然的事。

高速增长计划对社会风俗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九六一年开始流行无后跟高筒袜。以前的袜子在里面都有缝合的痕迹。在大量生产尼龙制品的基础上出现了无后跟高筒袜。这种袜子也很快变为不屑一顾的极普通的东西了。

与其说是在日本莫若说是在亚洲首次举行的十八届东京奥运会，恰恰在日本的高速增长期——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开幕。为筹备这届奥运会，日本政府出资一百五十九亿日元修建了国立竞技场、武道馆、驹泽竞技场、国立室内竞技场。运动会盛况通过卫星向全世界的电视台转播，因而各国称道这届奥运会为“造型与科学的奥运会”。日本如此慷慨地投入巨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兴旺发达。

都内的高速公路、地铁、私营企业的许多饭店等公用设施也都为奥运会的召开加速其竣工进度。

在这届奥运会上，日本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被誉为“东洋魔女”的日本女排，战胜劲敌苏联队夺得金牌，所有日本观

众为之热血沸腾。此外，还夺得男子体操团体和个人全能、鞍马、平衡木等项冠军，共获十六枚金牌，五枚银牌，八枚铜牌。

关于这个时期的体育新闻，不能不提到堀江谦一（二十三岁）。他乘一艘长六米，载重量只有一吨的小型快艇“人鱼号”，成功地横渡了太平洋。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二日由西宫出发，经过三个月的海上艰险拼搏，于八月十二日下午到达旧金山。

这些体育方面的业绩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日本人总体体质的提高。这一年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上升到与欧美并列，男平均六十一岁二岁，女平均七十二岁三岁。

第十八章 在高速增长 背面的枝节与犯罪

(一九六〇年— 一九六四年)

三井・三池纠纷的苦恼

在能源发展史上，高速增长计划是促进与煤炭诀别，跨入石油时代的主动动力。明治以来，直至战前与战后一段时间，一直居能源首位的煤炭渐渐地让位给石油了。这完全是由于煤炭较之石油成本高且效率低，不适应高速增长的需要。故而，大量使用煤炭的发电、钢铁、煤气、水泥等企业都转而使用石油做燃料。从煤炭与石油消费量的变化来看：一九五七年煤炭占百分之八十一·八，石油占百分之十八·二；一九六〇年分别为百分之六十九·四和百分之三十·六。从这个数字显然可以看出煤炭的前途不妙。这迫使煤炭企业不得不进行合理化调整，诸如降低煤炭价格，停止部分矿井的采掘，削减就业人员等。其结果，使各矿区的街面上或多或少地都呈现出《朝日新闻》报道的这种场面：

“以福冈为中心的九州各地的离职矿工约三万二千人。他们中间大约有一万二千人如果不能马上另谋职业、就难以维持一日三餐的最低生活需要。况且煤炭产业复甦的先兆迟迟不肯光顾，失业者的队伍日益扩大。

福冈县田川郡川崎町旧上正煤矿的住宅区里因贫困用不起电，竟到了连电灯都点不起的境地。一九五七年矿山关闭，全员失业。因交不起电费，从二月份起全矿的供电被切断，共欠电费十二万日元。九州电力公司说：“如果交纳出拖欠的电费就恢复供电。”居民们纷纷到川崎町政府哭诉求援遭到拒绝。在三十五户中有二十九户得到救济，大部分可以保证一日两餐，但也是靠薯类、小麦粉之类勉强糊口。不得已，夜晚只好点蜡烛、煤油灯……。

三井矿山公司三池煤矿的劳资纠纷是煤炭产业夕阳西下的显著标志。福冈县大牟田市的三井矿山三池煤矿被迫大量解雇矿工，为此劳资之间发生大规模纠纷。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五日工会组织为抗议资本家停工、闭矿以对付工人的这一绝招，开始了无限期的大罢工。三月十七日，接近资方的第二工会（三池煤矿新工会）发出了欲复工的暗示。二十八日，公司就命令第二工会复工。于是夹在第二工会和资方之间的第一工会一气之下布置了罢工纠察队防线。结果发生了激烈冲突，致使一百一十四人负伤。

即使如此，当天公司方面还是强行让第二工会下矿井继续采矿。眼看着第一与第二工会的对立激化了。五月十二日下午六时半左右，第一工会的纠察队员两千人与保卫矿山设施的警官队发生冲突。五十七名工人和一百二十四名警官负伤。七月七日，这场冲突又重复发生，又有第一工会的六十三人、第二工会的一百五十人、二百一十四名警官受伤。

终于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经中劳委斡旋，劳资双方达成协议，这场混战遂告结束。从这场大规模劳资纠纷得出这样的教训：“在煤炭产业夕阳西下的现实面前，煤炭劳工总体不宜采

取武斗的方式”。因而连强硬的第一工会也不得不屈服。

这一出煤矿悲剧或许可以说是高速增长背面的枝节。此外还有一些高速增长的副作用或缺陷。矛盾总是不可避免的，诸如城市人口过密，住宅难，物价高涨，公害等等。但这些弊端在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四年间都被高速增长的巨大浪头淹没，很少有人理会到。它们作为社会、政治问题暴发出来，那是一九六五年以后的事了。

杀害幼儿吉展的新型犯罪

在社会发展史上记录了与高速增长如影随形的新型犯罪。这种新型犯罪就是取得“人质”，敲诈勒索巨款。利用电话、汽车等现代通讯、交通工具，是不可缺少的手段。战前美国的林德巴克拐骗幼儿就是借助于其本身是著名飞行家，有钱，有汽车、电话等方便条件。所以，社会整体处于贫困落后状态的国家是不能发生这类案件的。

战前的日本几乎没有发生此类案件的条件。直到战后虽然发生了拐骗住友令爱和特尼谷令郎的类似案件，但那毕竟属于特异犯罪性质。可是，进入高速增长期之后，中小企业主等迅速变成了阔佬的不乏其人。而且犯罪者有了随便使用电话、汽车的做案条件。随之，有预谋地取得人质的犯罪多起来。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雅树案件和吉展案件。

雅树是住在东京都世田谷区的长尾进（天地堂皮包总店经理）的长子，庆应幼儿学校二年级生，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六日离家去上学，就此下落不明。十六、七两日，一个男子——估计是案犯——曾经用电话、电报连续催促家长交出孩子的“赎身金”。尔后，十九日早晨在杉并区上高井户的路上停着的小汽

车里发现了雅树的尸体，原来是被毒死了。

虽然立即推断出罪犯是杉并区的齿科医生本山茂久（三十二岁），但在搜查本山的下落时遭到了种种障碍。一个半月以后，传出了“本山自杀”的消息。

实际上，本山已经更名改姓，潜入大阪府布施市某工厂工作了。本山参加工作的推荐人的哥哥、在该厂工作的春野未仁见到通缉犯人的画像，便向警察报告了。警察托咐他说：“本山做过盲肠切除手术，请你设法看看那个人肚皮上是否有手术痕迹，帮助确定一下。”春野虽然讨厌本山，还是成功地把人哄骗到洗澡塘，看到他身上确实有手术的痕迹，因此断定这个人就是本山。于是警察逮捕了他。原来本山拐骗雅树是为了敲取旅游费用。

吉展事件发生在东京的下町、台东区入谷町。吉展是经营建筑业的村越兼雄的长子，当时只有四岁。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黄昏，吉展在自家门前玩耍时被拐骗走了。据搜查本部发的材料，其后的经过情况是这样的：

四月二日下午五时四十八分，犯人首次给村越打来电话：“请带五十万日元到新桥车站后面的赛马场售票处，作为记号，拿一本周刊杂志。”三日晚七时十三分又打电话说：“准备明天或后天送还孩子，请准备好现金，具体交换地点另行指定。”四日夜十时十八分又来电话：“孩子平安无事，他闹着要回家，待指定具体地点以后，请把钱送到那里。但不要向警察报告。”五日晚的同一时刻又打来电话：“在地铁入谷车站售票口处有一只袜子，把钱用破纸包好放在袜子里。”但是，这些电话所提到的地方都不见犯人出现。

六日上午五时三十五分，犯人又指定孩子家长到上野车站

附近住友银行旁边的公用电话处。吉展的母亲急急忙忙赶到那里，可是，没有看到证明吉展存在的证据，于是她留下一张纸条：“因为没有看到证明吉展存在的证据，所以回来了。”当夜十一时十二分罪犯又打电话来说：“作为证据，将把孩子的鞋留在那里。”七日凌晨一时二十五分接到犯人的电话：“从您府上出来一直向前走，走到顶头儿与昭和马路相交的地方是品川汽车公司，在它的旁边有五辆车子，在第三部车后面存放货物的地方放着吉展的鞋子，把钱放在那里后立即返回。”警方看到孩子的母亲丰子象是带着现金惶惶不安地出去，立刻派出侦探赶赴现场。

丰子坐着由亲戚驾驶的汽车出发了，果然在指定的地方一辆轻型三轮的载物架上放着吉展的一只鞋，便把五十万日元放在鞋里随即离开了。

侦探在现场周围埋伏到早晨三点仍不见犯人出现。原来侦探们包围的是品川汽车公司正面院里的车子，把地点弄错了。五十万日元已被取走。尔后又经过两年，当局作为该案的嫌疑犯追究了正在服刑的盗窃犯小原保（三十二岁）。据小原保自己供认，他于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深夜把骗走的吉展带到荒川区南千住的园通寺里杀死并就地埋葬在寺院的墓地了。

这类犯罪后来竟然发展到犯人公开自己身份，明目张胆地取得人质进行敲诈——诸如金嬉老案件及其他许多劫持飞机或轮船等大型犯罪。

与这类案件不相上下的是一九六三年发生的草加次郎事件，这也是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产生的新型犯罪。犯人先安装好炸弹，然后将自己隐蔽起来，对不定数量的人进行恐吓或杀伤以勒索钱财。这种犯罪是后来的暴力团犯罪的雏形。

据九月十日《朝日新闻》报道：

“警视厅的连续爆炸案特别搜查本部迅速对五日夜在地铁电车内发生爆炸时留在现场的定时装置等物进行了化学检验。九日下午又发现在定时钟表背面的盖内有损伤，上面横着刻有‘下一次是十日’几个字。”

“不露面的爆炸犯草加次郎曾经五次给电影明星吉永小百合发去恐吓信：‘交出一百万日元 否则杀了你！’特搜本部检验了五月十四日以来吉永小百合收到的五封署名‘草加次郎’的恐吓信上的笔迹，断定与五日夜爆炸地铁的‘草加次郎’是同一个人。草加次郎在第五封恐吓信中写到：‘命你乘九日下午七时十分由上野发出的特快列车，注意向列车行进方向左侧的窗外观察，八点以前，你会看见一个电筒一闪一灭地发出绿色的光来 把一百万日元向那个地方投去！’

九号夜间，该特别搜查本部派六名搜查人员登上指定的特快列车。并在上野车站至土浦车站之间九十六公里的行程上布置了二百八十九个便衣警官，准备了探照灯、照明弹等。但是始终没有见到草加次郎的绿色信号，白白撒下偌大的搜查网只好又撒了回来。”

此后，草加次郎再也没有出现。究竟是何许人也，无从查找。搜查本部只好解散。

狭山事件等的特异背景

在高速成长期还发生了若干起其他类型的特种犯罪。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九日早晨，到福冈县内收款的专卖公司的包租汽车受到袭击，职员和司机惨遭杀害，已收回的香烟专款被洗劫一空。福冈县警察本部认为象是知情者有计划的谋财

害命，遂设立搜查本部，立即着手破案侦查。

袭击收款车这种犯罪，完全象美国西部剧或匪情电影中所描写的情节，是日本前所未见的犯罪。也可以说是后来一九六八年日本发生的三亿日元案件的雏型。最后，查明了袭击专卖公司收款车的罪犯是西口明（三十七岁）。

此外，西口明还于十一月十九日杀害了滨松市上池川町经营出租会场的藤见先生的母亲（六十九岁），十二月二十九日杀害东京都丰岛区福寿庄的律师神吉梅松（八十一岁）。四处逃窜的西口明，十八天之后终于在熊本县落入法网。各报都对他的连续杀人事件做了大量报道。

另一起特种犯罪是在演员高岛忠夫的私邸里。他家雇用的少女把刚刚生下五个月的长子浸在水里溺死了。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发生了毁坏保险柜，窃走二千万日元的盗窃案。放在三菱石油公司川崎炼油所本部二楼办公室的保险柜的铁门被酸溶液腐蚀断，里面的二千万日元被盗走。据新闻报道，这是“战后最大的破坏保险柜案件”。同年四月至七月，神奈川县发生四十七起案件，但还是以这次盗取的款额最高。总之，这是在高速增长时期所特有的犯罪。

此外，提一下这个时期的特别审判也是颇有必要的。狭山事件是其中之一。埼玉县狭山市赤坂的农业经营者中川荣作的四女善枝（川越高级中学人间川分校一年级学生，十六岁）被人拐骗失踪。此案发生在与吉展案件同一年的五月初。善枝被拐走后，一张要求交付十万日元的恐吓信送到中川家中。搜查本部把它作为敲诈拐骗案进行侦破。

可是正当侦察进行当中，在中川家附近西武线入间川车站南面的麦田里发现了被掩埋的善枝的尸体。搜查当局认为最大

的嫌疑者是土木建筑业者石川一雄（二十八岁）。五月二十三日，对石川提出了起诉。浦和地方法院判处石川死刑。但辩护方面以非主案逮捕，证据不足等为理由提出上诉。尔后，解放同盟等组织认为这是“不平等的审判”，并为之进行了十几年的长期斗争。

这一时期，在日本审判史上记载了耗费时间最长的“昭和崑窟王”案件。五十年前的大正三年（一九一四年）经大理院终审裁决，认为栃木县下都贺郡美田村的石田石松是名古屋市郊外发生的一起案件的凶手，并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二年。石田刑满释放以后，在风烛残年倾全力为自己伸冤上诉，终于在一九六三年二月经名古屋地方法院宣判无罪。因为，已经调查搞清了，当年判石田有罪的证据——两个人的证词——纯属伪证。

另外，值得记述的是，在这一时期进行了有关私生活的裁判。对于作家三岛由纪夫发表的小说《宴会之后》，有田二郎（曾任外相、社会党国会议员、东京都候补知事）提出起诉：“这本小说以我为模特儿，侵犯了我的私生活”。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东京地方法院裁定：“被告三岛由纪夫（新潮社社长）侵犯了他人的私生活，应向原告赔款八十万日元和法定利息。”后来，在一九六六年原告有田和被告三岛经新潮社调停双方和解。

第十九章 通货膨胀与 公害的双重打击

(一九六五年——一九六九年)

超短裙显示着经济的繁荣

裸露出腿和脚的线条美的超短裙从一九六五年以后开始大流行。正如后来的人们所说的，“景气上升裙子短，景气衰退裙子长”。在膝上十公分的短裙出现并流行起来的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三年间，日本经济继续呈现高速增长的繁荣景象。但是，东京奥运会结束，池田首相因患癌症离职以后，曾一度出现暂时的景气衰退。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东京商工兴信所发表的数字表明，一年间倒闭企业（资本一千万日元以上）四千二百一十二家。好象要证明这一事实似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拒付的本年度票据达十一万一千七百三十张，创战后最高纪录。继池田之后，佐藤荣作就任首相时，政界、财界一致评论说：“佐藤是在境况最恶劣的时候登上首相宝座的。池田胡乱地大吃大喝一顿之后，佐藤被请到杯盘狼藉的宴席前”。

在这种状态中，一九六五年经营了四十年的山阳特种钢铁公司这样的大型企业破产，轰动了整个社会。破产的原因是设备投资过巨，市场销路不畅，重复采取前任经理的放慢经营方

针，使公司负债约五百亿日元。三月六日乃不得不申请按公司更生法处理。

此外在高速增长期利用“大众股东”、“赚取高利”等宣传拼命兜售投资信托的股票市场这时也陷入不景气的困境。在野村、大和、日兴、山一四大股票公司中，山一已经出现了经营危机状态。由于财界和政府为维持股票价格而施行方略，遂于一九六五年五月转危为安。

但是，一九六五年年中，在佐藤改组内阁时就任藏相（财政大臣）的福田赳夫采取了“自昭和初昭的高桥藏相以来首次实施的”发放国债政策，为恢复景气注射了强心剂，遂再度出现高速增长。

同年十一月三十日美智子殿下生了“龙子”（礼宫文仁）。这一年出现了十二年来不曾有过的高出生率，新出生一百八十一万二千八百人，创高产纪录。因为翌年（一九六六年）是“丙午”年，自江户初期蔬菜店阿七放火事件以来，产生一种迷信的说法，丙午年出生的女人“克男人”，所以都想“要生的话就在今年生吧”。于是形成了出生率的高峰。

果然在第二年——丙午年，出生率比前一年减少百分之二十五。比上一个丙午年（一九〇六年）出生的人口还少。这说明，即便是在经济高度发达时期，日本人中信仰宗教迷信、追求“吉利”的风俗仍然根深蒂固。尽管这样，到一九六七年，日本人口还是突破了一亿，一九七一年平均寿命延长到男六十九点三三岁，女七十五点九二岁。

这时的经济繁荣，从视觉能感受到的现象或数字颇多。九月二十七日，石川岛播磨造船公司生产的世界最大油轮——“东京丸”举行下水仪式。一九六六年国民人均收入达到二十

四万八千四百二十二日元。当十月二十九日政府出售战争期间接收的钻石等贵重物品时，买主踢破门槛。由此也反映出经济状况之好。十二月出现了历史上最高的存款额。十二月十一日，东京百货公司的销售额达四十亿日元，创造了空前的记录。

经过这一年，消费生活更加丰富了，从而跨入了“三C^①（汽车、空调器、彩色电视机）时代”。一九六七年的国民总产值在自由主义国家中仅次于美国、西德居第三位，不久，又超过西德居第二位。在全世界继美、苏之后排第三位。

公害席卷日本列岛

另一方面，高速增长也带来了弊端：物价上涨、环境污染等成为巨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也是在这一九六五至一九六九几年间。

在物价上涨中居首位的仍然是土地价格。一九六〇年四月，国税厅发表的数字表明，地价最高的是东京银座四丁目三爱前一带，每坪三百八十万日元。其次是大阪的梅田阪神百货大楼东侧的电车线一带，每坪二百二十万日元。

在东海道都市群里要想新盖一幢楼房，其造价的百分之七十用于购买地皮。在住宅建设上，用于购买地皮的资金占建筑费的比例，美国各城市是百分之三点七；西德的科隆市是百分之四至十；荷兰是百分之二至四；唯独日本地价格外地高。一九六五年的消费物价较之上一年出现了百分之七点四的大幅度上涨。并且这种倾向还在不断加剧。一九六七年十月，日本银行指出：“在四个月内，零售价格将持续上涨。”于是消费者反

^①在英语中小轿车、空调器、彩色电视机这三个名词都以字母C开头，所以简称为三C。——译者

对提价的运动更加活跃了。《读卖新闻》甚至把这称为“物价战争”。一九七〇年四月，日本银行又发表消息说：“批发物价已连续十四个月上涨”。

另一方面，一九七〇年甚至出现了“公害列岛”这样的用语。严重的污染问题一个接一个地爆发出来。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二十八户的反应停^①畸形儿及其父母共八十三人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要求生产反应停之类安眠药的大日本制药公司和批准生产该药的厚生省赔偿六亿三千一百九十九万日元的损失。一九六一年在西德因反应停药物危害出生先天畸形儿曾引起轩然大波。一九六二年五月根据厚生省的要求，大日本制药公司暂时中止了反应停、酞酸呱啶酮等两种药物运往市场。

可惜这样处理已经为时甚晚，已然酿成畸形儿降生的灾难。一九七四年受害者已有六十三家。原告与公司之间终于在同年十月七日达成谅解：大日本制药公司凑足五亿日元，分四千万日元、三千三百万日元、二千八百万日元三等赔偿受害者的损失。

四日市的公害问题，是以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患公害病的老人自杀以示抗议为开端的。四日市九位患哮喘病的人提出起诉，要求石油联合企业的六家公司赔偿损失。这是对大气污染公害的首次起诉。这一审判费时良久，五年以后，津地方法院才做出裁决，六公司向原告支付了八千八百二十一万余日元赔偿。

^① 一种催眠、镇静剂。英文为thalidomide。妇女在妊娠初期服用此药会导致生产畸形儿。一九五六年由西德发明，一九六五年被日本证明其有可怕的副作用。——译者

“疼疼病”与“水俣病”

确切地说，这些公害在高速增长期以前已经发生并发展，只是到高速增长期以后才表面化了。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疼疼病”和“水俣病”等。前者是流经富山县的神通河流域很早以来多有发生的骨头疼病。患者不停地发出“疼呀，疼呀！”的呻吟声，直到全身衰竭而死。一九六〇年，医师荻野昇提出这种怪病是由于“镉”中毒引起的。当地居民三十三人指控说：“排出这些镉元素的是三井金属矿业公司神岡矿业所”，通过法律程序要求赔偿损失。一九七一年夏季，富山地方法院做出裁决，让三井方面支付赔偿金。但三井立即提出上诉，结果败诉，被裁定的赔款金额比一审裁定的数额多一倍。三井只好向三十三位原告支付四千八百二十万日元的赔款。

水俣病也是那个地区年深日久的公害病。身受其害的三十户一百三十八人对奇索公司提出起诉。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七日部分水俣病患者与公司达成谅解，由公司支付四百万日元赔款。但是另一部分强硬派患者以“水俣病告发会”和“股东之一”的身份出席公司方面于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召开的股东总会，继续追究公司的责任。公司的保卫人员行使暴力，出现了十人负伤的混乱场面。

终于在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日，经熊本县地方法院裁定：命奇索公司交出总额九亿三千万日元赔款。关于熊本县和东京当时的情况，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日《每日新闻》的夕刊上有这样一段记载：

奇索公司的经理岛田从十九日夜便潜藏起来了。……公害病患者及其后援团体的谴责声不绝于耳，奇索公司总部——

在东京九之内的东京大厦，从清晨起就被一种异样的气氛所笼罩。整个繁华的商业街淹没在黑地白字的“怨”字旗和人们裹在头上、斜挎在身上的“水俣死民”的标语之中。

这样，多数公害由当地居民揭发出来或由被害人起诉。不久便由此产生一个新名词儿——“居民势力”。阿贺野河水银中毒事件就是这样，“居民势力”认为“昭和电工公司应负责任”，遂向新潟县地方法院起诉，经地方法院审理，宣判原告胜诉。

在都市里，“日照权”问题也发生在这一时期。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东京最高法院驳回了地方法院否认日照权的裁定，从这次赔偿日照损失开始，日照权便成为人们固定的权利了。

面对连续发生的公害事件，佐藤内阁于一九六九年二月制定了“亚硫酸气在大气中的含量标准”，四月制定了“防止公害计划”，十二月制定了“公害病对象地域的指定”，于一九七〇年二月、七月、八月、九月又接连制定“汽车排气标准”、“公害对策本部的设置”、包括排放污水申报等内容的“加强河川管理施行令”、“停止使用、贩卖导致亚急性脊髓神经症的整肠剂”等法令。一九七一年七月，佐藤内阁新增设了环境厅，任命大石武一为首任环境厅长官。

第二十章 陶醉于昭和鼎盛 时代的现象与状态

(一九六五年——一九六九年)

假充英雄的金嬉老

在高速增长期，具有某种特异性的野蛮犯罪案件有所增加。其中颇有代表性的是，一九六八年二月下旬发生的轰动整个社会的金嬉老事件。金嬉老(四十一岁)本是朝鲜人，取个日本名字叫金岡安广。是个乖巧、奸诈、善于变换脸谱、投机逢迎、口齿伶俐的男子。但是，曾因诈骗、盗窃、抢劫等犯过七次前科。四十年人生，大半是在监狱中度过的。

二月二十四日深夜，金嬉老在清水市内的花柳巷里，用莱福枪杀死两个人。金嬉老从金融业者那里借了相当数量的款项逾期不还，被杀害的两人是前来催逼欠款的暴力团方面的人。作案后，金嬉老逃到了大井河上游——寸又峡温泉的“泉屋”旅馆，持枪威逼，把店主一家六口人和投宿这里的十四名客人，集中押到二楼。然后给在清水警署工作的朋友西尾巡警长打电话，在他与西尾通电话的五十来分钟内，警察署方面利用逆探测器已经测出了金嬉老所在的方位。

二十一日天亮之前，静岡县警察本部和清水警署的三十名武装警官，岛田警署的二十名警官，以及其他特种机动巡警队

员，一齐奔向现场。金嬉老身边带着射程一千五百米、带瞄准器的莱福枪和一百五十发子弹、炸药等。

二十一日下午五时，县警方面开始对金嬉老喊话劝降。但是，正如常见的这类杀人犯一样，他公然声称：“警察没有信用。”九时十分当《朝日新闻》记者打电话来采访时，金花言巧语地说这次作案的背景是：“我从孩提时代就把朝鲜人的种族差别问题挂在心上。最近一位刑事审问我时，问我是不是朝鲜人，妄图借此贬低朝鲜民族，简直使我气炸了肺。”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避而不谈自己的前科犯罪，却巧妙地将自己的杀人罪行说成是为朝鲜人出气、为种族歧视分忧。这个平日里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对康德、黑格尔颇有研究”的男子汉，到底还是手段高超！

金嬉老知道自己的行动已经震动了新闻界，便想乘机冒充英雄，名扬天下。他对电视台作了电视演说，巧妙地利用传播媒介的力量，要求过去曾侮辱了自己的警察公开赔礼道歉；用莱福枪射击空中摄影记者所乘坐的直升飞机；把点着了火的炸药，往二楼的窗子里扔进去；有意制造一系列暴行。

当挂川署本乡派出所的巡警长前来劝降时，金嬉老用枪威胁他，并把炸药放在火炉旁边。他还煞费苦心地将自己的周围用“塔塔密”挡起来，以充作防弹墙壁。

二十四日下午将近三时，金嬉老站在“泉屋”旅馆的正门，两手插进口袋，只露出一脑袋来，向包围着他的记者群喊话：“记者先生们，我马上要放出一个人质，请给闪出一条路。”然后回头看看，得意洋洋地对一名人质招手示意：“那么，请过来吧。”

送走了被释放的人质，金嬉老想要返身回到屋里去，当他

刚走到楼梯口的瞬间，夹杂在记者团中的六名刑事警察，一跃而上将其抓住。只听见一声惨叫，金企图咬掉舌头自杀。警察撬开他的嘴，把笔记本塞了进去。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七日，金嬉老被静岡县地方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沉醉于电吉它的青年人

虽然野蛮的杀人犯罪等等诸多事件使人感到恐怖与沮丧，但实际上—一九六五至—一九六九年间，高速增长的社会总体仍然是一派繁荣景象，整个日本沉醉于“昭和鼎盛”时期的喜悦中。

从一九六五年起在年青人中间暴发性地流行起电吉它。这是由于电吉它乐团“温丘兹”来日演出引起的。这时，日本也大量生产电吉它，月产达到六万个，成为市场上的热门货。

随着这股风，流行起“猿猴舞”，那些跳舞的女孩子都穿着膝上十七公分的短裙，动作猴蹦乱跳，有失体统，惹起人们的纷纷诤议。栃木县足利市教育委员会认为：“要想防止青少年的不轨行为，唯有禁止猿猴舞。”遂着手抓紧对青少年的教养。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甲殼虫”乐团来日本，在东京公演的三天里，前来观看的青少年每天不下八千五百人。随之，有许多电吉它小乐队应运而生。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四日，在东京、涩谷的百货公司停车场里，召开以这种小乐队伴奏的摇摆舞会。一万五千名女中学生和高中生云集于此。甚至还发生了被挤出舞会圈外的人擅入民宅的违法事件。

次日，在奈良市菖蒲池车站的露天剧场，“虎啸”乐团举行公演，观看者八千余人，由于秩序混乱，三十人被挤伤、踩伤。

被称为“狂人”或“嬉皮士”的青年怪男怪女也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他们有的经常聚集在原宿一带，被称为“原宿族”。经常出没于银座御幸街的一伙儿，被称为“御幸街族”。尤其是“原宿族”闹腾得最凶。每到夜晚，他们就乘运动车或摩托车来到松散地分布在车站周围的饭馆、俱乐部等处寻欢作乐。他们带来的喧嚣与噪音令人不堪忍受，为此，在原宿成立了“环境净化对策协议会”。

在这些“狂人”或“嬉皮士”中间流行起冲淡剂游戏^①。一九六七年一年之中，他们中间有九人中毒身死，转年死亡人数达二十四人。他们中间被管教的人达八千五百三十四人次。

奇怪的是，在这个时期，大学生、高中生不分学历高低，不论出身贵贱和教养优劣，所有的年轻人都被卷进了漫画热。这是由于电视的发达而产生的脱离文字倾向。一九六五年，大学生总数突破百万（其中百分之七十二是私立大学学生）。但是，有人评价说，这个时期的大生理智水平下降。加之在中、壮年人当中出现了“踪迹不定”者，也是这一时期的特征，他们为所欲为，不负责任地丢弃妻子、儿女或双亲，尽情地享受着“走到哪里都能得到的”生活快乐。——象征着“昭和鼎盛时期”的特有现象。

三亿日元被巧妙地骗走

在这个时期的犯罪中，三亿日元案件颇具高度增长长期特色。

冲淡剂是用于降低涂料浓度的混合剂，一般指喷漆用的稀料，含有毒物质。一九六七至一九六八年，在日本青少年中，流行起构成社会问题的“冲淡剂游戏”（稀料游戏）。他们把充满稀料蒸气的聚乙烯塑料袋，套在脑袋上。由于蒸气的麻醉作用，很快进入昏睡状态，眼前出现无奇不有的梦幻世界。有的人竟戴着这种塑料袋睡着了，由于稀料蒸气的作用，加之口、鼻受阻，呼吸不畅，窒息而死。也有人因无节制地进行这种游戏而使脑神经受损。——译者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日本信托银行国分寺分行的现金运送车装载着三个铜箱子，里面是东芝公司府中市工厂储蓄所的三亿日元现金。当它行驶到府中市监狱附近时，一位骑白色摩托车、戴白色安全帽的交通警察上前命令停车，并对坐在车内的资金股长中田荣治说：

“巢鸭署打来了电话，国分寺分行行长的府上被炸。怀疑这辆车上也安放了炸药，需要采取紧急措施。”警官钻进车里检查一阵之后：“也许安放在车子外部了”。说着让车里的四个人下了车，又检查车子后部。“炸药在后仓盖附近，眼看要爆炸，赶快躲开！”听见这声喊叫，护送现金的四个人慌忙躲到监狱的墙角。果然看见从车子后部冒出火花来。那位警官钻进驾驶室，打开了制动器，因为车子停在路中间，以为他要把车子移到一边。可是，眼看着车子向小金井方向疾驰而去。只有警官那辆白色摩托车留在现场一动不动。后来，在国分寺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了被丢弃的现金运送车。火花是用发烟筒制造的。

警方根据目击者的追忆，画出了骑白色摩托车、冒充警官的犯人图像，对长相与之相似者进行调查。估计这是一桩知情人犯罪的案子。对了解情况的有关人员广泛地进行了审查。幸亏被骗走的三亿日元由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承担损失，银行方面和东芝公司业务员没有直接承担损失的责任。但是，罪犯到底逃到哪里去了呢？对于象烟雾一样消散掉的罪犯，许多人怀着某种好奇与快感。尽管警方投入了十七万人的搜查力量，结果还是不了了之，该案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失去时效，不再追究。

当时与政界有牵连的事件比较多。一九六五年的吹原产业公司事件便是其中之一。公司经理吹原弘宣于一九六四年十月

对三菱银行分行长诡称：“我将要存入三十亿日元”。于是骗取了两张面额分别为二十亿日元和十亿日元的存款证明书。然后，吹原又用这两张存款证明书从金融界的森胁将光那里借走三十亿日元。当时，吹原还伪造了池田内阁官房长官黑金泰美的签字，准备用它做证据行骗。四月二十三日，东京地方法院逮捕了吹原。随后，森胁也因造船公司的贪污案件被检举。

一九六六年夏、秋时节，自民党的田中彰治因威胁、诈骗罪的嫌疑被捕。还有，牵连政界的共和精糖公司的不法融资事件等丑闻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导致佐藤内阁于十二月二十七日解散众议院，这就是所谓的“黑雾解散”。一九六八年因日本通运公司案件，涉嫌与经理以下头目们的渎职、侵吞公款罪有牵连，自民党的池田正之辅、社会党的大仓精一被控告。

接连发生的航空事故

悲惨的航空事故接连发生。或许这也是高速增长期的特色吧。不可思议的是这些惨案都集中发生在一九六六年。那年二月四日，全日本航空公司的波音727型飞机在与羽田机场相接的海面上坠毁，乘客和机组人员共一百三十三人全部遇难。

波音727飞机在航空技术人员中间享有很高声誉，因为它在降落时为了控制速度，可以分为三阶段降低机翼。仅仅在前一年的十一月，在美国密执安湖上空还发生了一起飞机着陆时坠毁事故。接着，三月四日夜晩和五日下午分别有加拿大航空公司道格拉斯DC8型喷气式客机和一架直升飞机在羽田的海面上坠落。尤其严重的是，五日下午一时五十八分，羽田至香港的英国海外航空公司波音707飞机又在富士山撞毁。十一名机组人员和一百一十三名乘客无一幸免。

八月二十六日，在羽田机场上，日本航空公司的教练机昆帕阿880型飞机起火，五人死亡。九月七日，正在北海道飞行的一架旅游飞机，因为导游人员企图自杀，在机舱内纵火，使飞机坠落。导游死亡，驾驶员负重伤。

十一月十三日，全日本航空公司的YS11型飞机在松山机场附近的海面上坠毁，五十人死亡。这种YS11型飞机是战后日本飞机制造业各种先进技术的集大成者，具有经过一公里短距离滑行便可起飞的优良性能，因而在国内航线上已经有十六架飞机在航行，且因具有横越太平洋的成绩，来自海外的订货合同已达七十三架，享有很高的信誉。

心脏移植手术引起的震惊及其余波

在日本科学发展史上，不可遗漏的重大新闻是心脏移植手术。实现这一创举的，是北海道札幌医大附属医院的胸部、心脏、心血管外科教研室主任教授和田寿郎医学博士（四十九岁）。他抱着试试看的心里，给患者宫崎信夫（十八岁）进行了这一手术。信夫因患心脏瓣膜症，在学生时代就免修体育课。一九六四年以后病情加重，完全卧床不起了。一九六八年四月五日来到了札幌医大附属医院住院就诊。因为同时患有二尖瓣膜闭锁不全、三尖瓣闭锁不全、大动脉瓣狭窄等多种病症，心脏异常肥大。

和田博士于八月八日上午二时五分亲自执刀，另有二十人的医师队伍辅助，开始了心脏移植手术。仅用十三分钟打开胸腔，取出肥大的心脏，又用四十五分钟成功地把健康的的心脏移植完毕。提供这个健康心脏的是住在札幌的东京某大学四年级学生（二十一岁），他于八月七日游泳溺水呈假死状态，经人

工呼吸抢救曾一度苏醒过来，但随即被认定死亡。

信夫在施行心脏移植手术后感觉良好，又活了八十三天，于十月二十九日下午死亡。对于他的死因，和田博士说：“没有排斥反应，只是因为曾患血清肝炎，身体虚弱，加之并发了气管炎。”心脏外科权威榊原仟、木本成二也说：“死于全身衰竭，不能认为是心脏移植失败。这次心脏移植成功是医学发展的巨大进步，在世界医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人以“无视排斥反应、进行人体实验”等理由提出反对意见。虽然札幌地方检察院对和田提出起诉，但最高检察院于一九七〇年九月一日宣布不予追究。

第二十一章 经济大国

日本的真面貌

(一九七〇年——一九七二年)

“淀”号飞机遭劫持

在安保条约限期届满、自动延长一年的一九七〇年三月三十一日，日本首次发生了劫持飞机事件。从羽田飞往福岡的日航351次班机、波音727喷气式客机“淀”号（机组人员七名、乘客一百三十一人），于上午七时三分左右飞至富士山附近，九名学生模样，自称赤军派的男子，把日本刀对准机长石田真二，命令“开往北朝鲜的平壤去！”石田回答：“机上的燃料只够飞行两个小时，必须到福岡加油。”终于劝说他们同意，使飞机在福岡机场降落。时针指在八点五十九分。

由于石田机长已经通过羽田机场的航空管制室把飞机上发生的事件报告了福岡机场。福岡机场的警卫当局考虑到乘客的安全，布置了海、陆、空一体化警戒网，但是已经毫无挽救的余地了，只好按照赤军派的要求给飞机加油。机长又与他们反复交涉、要求将机上的乘客释放，结果，只释放了二十三名病人和妇孺。

下午二时，“淀”号在赤军派的胁迫下又从福岡起飞，刚要接近平壤时，遭受到了激烈炮火的轰击。因此，“淀”号返

人南朝鲜领空。南朝鲜空军飞机赶来，在两侧夹持着，把“淀”号引导到汉城的金浦机场。

已经接到日本政府联络的南朝鲜政府，为了迷惑赤军派，使他们误将汉城当作平壤，命令机场进行伪装，把一切自由主义国家的旗帜全部摘掉，换上北朝鲜欢迎他们的标语牌之类的标志。但是，“淀”号着陆后，罪犯们发现机场上没有悬挂金日成的画像，判断出该地不是平壤机场而是金浦机场。这时已经赶到金浦机场的日本驻南朝鲜大使金山政英，利用航空管制塔的电话，呼吁劫机罪犯释放人质。双方谈判一直进行到四月三日上午十时半，由于日本政府的魄力，双方达成协议：“以运输省政务次官、自民党国会议员山村新治郎为人质，释放其他乘客。”

当天下午二时二十五分，山村做为入质飞抵金浦，坐进了“淀”号机仓。至此，以女服务员为首的“淀”号全体人员终于获释。

当天，“淀”号即飞抵平壤。事后，山村对笔者追述这段往事说：“因为日本与北朝鲜没有邦交关系，所以也意识到自己此去凶多吉少。我的义父川岛正次郎副总裁当时在莫斯科，我曾打电话与他联系，他鼓励我去做人质，他说：‘如果北朝鲜扣留你的话，可能会通过苏联政府与北朝鲜协商把你放回来。’即便如此，我还是做了万一回不来的准备，把自己攒下来用于做选举资金的钱全部交给了老婆。可是，在我平安返回之后，我老婆却没有把这笔钱还给我。”

“淀”号到达平壤之后，赤军派劫机犯立即将山村和石田机长分别关押起来。虽然让山村他们看了北朝鲜的宣传画，让他们了解政策，但对于准备如何处置人质却只字不提。山村与

石田心里惶恐不安。直到事件发生后的第六天早晨，“淀”号离开平壤，飞回羽田机场时，他们才确信自己活着回来了。山村因此得了个“替身新治郎”的雅号。

虽然后来去北朝鲜访问的日本议员团，获得了有关留在北朝鲜的九名劫机犯的零星消息，但据一九七八年的最新消息说，他们在北朝鲜接受了洗脑，通过自我反省认识到：“自己所干的劫持飞机行为与革命毫不沾边”，甘愿接受劳动改造。

大约在一个月以后，与“淀”号劫机事件相似的海上劫持船只事件发生了。曾经在山口县杀死路口检查站警察的罪犯出现在广岛，这次又用莱福枪和手枪胁迫船员，强占了观光船普林斯号。把船员和四十四名乘客做为质。船开到松山之后，让乘客下来，又返回广岛。警察部队对船上的劫持犯开枪射击，救出了船员们。

国际博览会——豪华的盛会

“淀”号事件发生之前，三月十二日早晨六时半左右，驻巴西圣保罗的日本领事大口信夫在官邸附近的路上被五个学生暴力团的人骗走，日本外交官在国外被拐骗这还是第一次。

虽然后来大口被放了回来，但这种作案方式，成了反政府暴力团攻击政府的手段，动辄用之。

同年三月六日，在危地马拉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被骗走的是美国大使馆的秘书，大约四十小时以后获释。大口信夫被变相绑架时，日本驻圣保罗总领事平冈金之助在回答《读卖新闻》驻华盛顿分社记者的问题时说：“我估计，因为筹备国际博览会，在当地宣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状况，使日本的名声大振，于是当地的暴力团组织盯上了日本总领事馆，结果发生了

大口被绑架事件。”

正如平冈金之助在电话中回答记者问时所说的，一九七〇年的大事莫过于国际博览会。会场在大阪的千里丘陵，有七十七个国家和四个国际组织参加。新建的展览馆分为美国馆、苏联馆、加拿大馆依次类推。三月十四日，天皇出席了隆重的开幕式。十五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开始对一般观众展出。直至九月十三日，在一百八十三天的展出中，举行了丰富多彩的各种仪式。参观者中日本人占绝对多数。来自各国的旅游观光者共计达到六千四百二十一万余人。

连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也被这次豪华的国际盛会冲淡了。六月二十一日，日美安保条约到期，没有发生任何麻烦，便自动延长期限了。

三岛由纪夫剖腹自杀

对左翼势力和过激派的行动除忧愤之外，别无良策的作家三岛由纪夫，于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身罩“楯之会”的会服，带领四名会员来到陆上自卫队，拜访东部方面总监益田兼利。

“楯之会”是由三岛主宰的组织，成立于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其宗旨是：“为了与左翼势力相对抗，应保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武器。为学会使用武器，希望加入自卫队，接受一个月以上的军训，为此组成了‘楯之会’。”赋予它民间防卫组织的性质。三岛本人也曾经在某一时期进入自卫队受训，并且在周刊杂志上刊登了他身着自卫队军服、携带武器的照片。

事前，三岛用电话与总监联系，约定了见面的时间。进入总监办公室的三岛，对益田总监说：“我带来了一把宝刀。”说

着，让总监看他挂在身上的佩刀。总监答道：“果然是一口好刀。”三岛立即将刀收起，把他们的申请书递给总监。与此同时，“楯之会”的四个会员从总监的身后围拢上来，把总监的两臂向后倒背，用绳索把手脚捆绑起来。

三岛以异常平静的心情说：“我不伤害你，用不着害怕。”益田大声喝斥：“不许你们胡闹！”他的声音传到室外，被一个自卫队员听到，自卫队的东部方面副参谋长吉松秀信等人立即来到总监办公室，与三岛之流激烈地争吵，被他们赶出了室外，随后三岛等人用桌子、椅子把总监室的门口和两侧通往副总监室、参谋长室的门也堵住，筑起了工事，占据了总监室。

吉松隔着被打碎玻璃的窗子，劝说三岛等人退出来，遭到拒绝。三岛命令：“在中午以前将自卫队员们集合起来。”

中午刚过，副参谋长将约千名队员集合于阳台下，“楯之会”的会员们把与申请书内容相同的巨幅标语从阳台上放了下来，并散发檄文。接着三岛出现在阳台上，只见他以布巾缠头。被集合到这里的队员们，开始还以为三岛不过是要进行一番鼓动而已。三岛站在队员面前开始了三分钟的讲演。

“虽然修改宪法，以期重整军备这点，现在已然被国民遗忘了，可是你们这些行伍袍泽应该怎么想呢？”集合起来的自卫队员们，多数对这种知识分子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煽动抱有反感。于是七嘴八舌地起哄：“用不着你来充英雄好汉！”几乎没有人听三岛的演说。十二点十五分左右演说结束，三岛返回总监室，立即在益田面前解开制服的扣子，裸露出胸膛。益田大喊：“不要胡来！”无奈双手被反绑在背后，眼看着要出事，却无能为力。三岛用随身带来的短刀一字形剖腹自杀，“楯之会”会员森田必胜站在三岛身后为其助刀，见三岛未能顺利地死

去，遂用刀将他的头颅砍下。随后，森田本人也剖腹自杀，又有另一名会员为其助刀。尔后，剩下的三名会员将益田总监放了出来。他们将三岛与森田的首级摆在地板上，用制服盖好，然后昂然阔步地走出去。他们三人在走廊里，被警务部和牛込警察署以监禁、伤害罪逮捕。

三岛等人占领总监室的时候，在邻近的防卫厅共济组合市谷会馆有二十五名“楯之会”成员正在待命，准备接到三岛的命令就行动起来，可是被警视厅机动队和自卫队警务部人员监视起来，使他们寸步难行。

三岛为何采取如此过火的行动呢？从阳台上垂下来的标语上写着：“我等看到战后日本被经济的繁荣迷住了心窍，忘记了国之根本，丧失了国民精神。若不正本清源，必然走向穷途末路，或陷入应付与伪善之中，自己的灵魂也将坠入空虚状态……我等梦想在自卫队里还有真正的日本精神，真正的日本人，真正的武士道之魂。

可是，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发生了什么事呢？发生了首相访美前的最后一幕闹剧——示威游行，警察空有绝对优势，却袖手旁观，任其自行发展。在新宿目睹这一场面，我深感照这样下去，修改宪法无日可待。自卫队象哑了的金丝雀默不作声，听之任之。我们始而痛心、继而愤怒，武士之魂到底哪里去了！”

总而言之，三岛的政治理念就是修改宪法，通过改宪使自卫队变成合法的正规军队，依靠正规武装力量，击溃左翼共产主义势力。可是，面对左翼势力的过火行动，自卫队按兵不动。由于对这种现状的痛恨、绝望，以至发展到剖腹自杀。

从作家三岛由纪夫的经历来看，他是一个热衷于体育锻

的人，有时陶醉于自己的健美体态，或许是想在这健美的身体变得衰老、丑陋之前死去，加之三岛在自己拍摄的短片电影中亲自扮演了“二·二六政变”的叛军将领，如同他在做戏时的剖腹场面一样，也许对剖腹有某种悲壮的美感和陶醉感吧。

不管怎样，三岛悲壮的剖腹自杀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和反响。在自民党和政府官员中，有人说：“三岛的行动太偏激了。”有人说：“简直是疯狂的行动”；“破坏民主秩序的行为。”对国外的政界、新闻界也是巨大的冲击，许多国家评论说：“日本仍然残留着重振军备的军国主义思潮。”

尼克松冲击

一九七一年最大的事件是日美双方缔结归还冲绳协定。在举行签字仪式的六月十七日，发生了以实力反对签字仪式的示威游行。过激派在明治公园附近，往警察机动队里投掷管状炸弹，使三十名机动队员负伤。机动队对于燃放爆竹进行捣乱的示威队伍毫不手软地报之以大逮捕。

同年秋季，召开了临时国会，有人称之为“冲绳国会”。国会期间，社会党、共产党、还有全学联等过激派反复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国会批准归还冲绳。十一月十日，社会党、共产党和工会的“冲绳复归祖国协议会”在那霸市召集十万人，举行反对国会批准签字的罢工，与警察机动队发生冲突，一名队员死亡。十一月十四日，在东京也举行了反对批准签字的集会示威。过激派在日比谷投掷燃烧瓶，使一名机动队员和一名中学女教师死亡。

过激派反对签定“归还冲绳协定”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冲绳将被列入日美安保体系之中，那么，虽然日本有“禁核三原

则”，美国还会有办法，说是去掉了核武器，而实际上把核武器带入冲绳基地。他们的愿望是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立即取缔美军基地。但是由于当时国民的舆论趋势，赞成战后二十余年被置于美军统治之下的冲绳归还祖国，协定终于在十二月获准。

可是，这一年的政治状况异常复杂。七月九日美国总统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了北京，面会周恩来总理商订了尼克松访华事宜。日本在美即将发表联合公报的前夕才获悉此事，完全被当做局外人了，这对日本来说实在是个巨大的冲击。

接着，八月十四日尼克松宣布了为保卫美元暂时中止兑换黄金，并且收百分之十的进口税，这是对日本经济的又一巨大冲击。

在此期间，反对修建成田机场的斗争仍在继续。负责修建的公团方面代表政府于二月二十二日着手对预定建机场地区的农地强行征购，直至三月二十五日基本完成。可是，在这一个月之中，两万余名反对修建机场的农民和声援他们的学生、工人与两万五千多名警察发生了冲突，七百零七人负伤，四百八十七人被逮捕。九月十六日进行第二次强行征购时，再次发生了混战，机动队员三人死亡，二十一人受伤。三百七十五人被捕。

以“羞愧的心情”归国的横井军曹

一九七二年是政治史上丰富多采的一年。五月十日，日美间的“归还冲绳协定”生效，在东京、冲绳都举行了纪念仪式。趁此机会，佐藤首相急流勇退，宣布辞职。七月十五日，举行自民党总裁选举，由于三木武夫、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福田赳夫四位实力人物出马竞选，新闻界称之为“三角大福会

战”。

选举结果，田中角荣稳操胜券。七月七日，田中内阁诞生。田中撰写的《日本列岛改造论》成为畅销书。九月下旬，田中与大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飞抵北京，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会谈，二十九日发表日中联合声明，一举实行了两国邦交正常化。其结果，导致整个日本社会掀起了茅台酒热和熊猫热。

一月二十四日，在关岛的热带丛林里发现、并救出了太平洋战争的幸存者、原日本兵横井军曹。一月二十六日《朝日新闻》这样报道：

“为履行日本军人的职责，在热带密林里孤寂凄绝地生活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横井庄一（五十六岁）的声音，于二十五日夜里，先于其本人回到了日本。当天上午十一时半，横井在关岛阿格纳·哈伊茨知事的官邸，会见当地新闻记者时的谈话录音磁带，于晚七时运抵羽田机场。他讲那一口难以理解的笨拙的日本话，清楚地反映出一个尚不知日本已经战败的日本兵的真实状况。还有，横井与当地日本血统人士谈话的记录，也在同一天里搞清楚了。”

谈话记录的内容如下：

“告别了二十名战友，与八位同伴住进山洞里，靠挖掘薯类，捕捉山鸡、野牛充饥，也摘面包树的果子吃。当时只有七个人了。

后来只剩下横井、志智、中畑三人，我们在离河三公里的地方挖了个洞穴居住，大约过了一年左右，由于岛上的居民来到这里烧荒草，我们便逃到河边，在树上野营露宿，在这里又生活了一段时期，然后就到处迁徙，没有固定住处，最后在一

个地方又挖个洞穴，大约住了十五年。尔后，与另外两个伙伴分手，我一个人靠挖竹根、摘取面包树的果实维持生命。有一次特地到二位战友住的洞穴去看望他们，远远地就闻到一股怪味，进去一看，他二人的尸体已经腐烂了。至此，我们这支队伍就剩下我孑然一身了。我何尝不知道，一旦患病无医无药只有等死，有时也想去见见岛上的居民，走出丛林寻条活路，但是顾虑重重终于不敢出来。

此外，还有一份横井在关岛阿格纳·哈伊茨知事官邸答记者问的记录稿，内容如下：

问：“您此时的心情如何？”

答：“好象做了一个长长的恶梦。什么都稀里糊涂。但心情十分愉快，回到祖国，我所见到的一切如同进入一个神奇的宫殿……。”

问：“哪些东西最使你吃惊？”

答：“对所见的一切都感到新鲜，美国所具有的东西都有了，这使我为之惊叹。”

问：“原子弹爆炸的事你知道吗？美国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

答：“原子弹爆炸的事不知道。东京遭受空袭，翌年美国又轰炸广岛，这些事情我知道，那是战时的事。”

问：“你在丛林里生活最感困难的是什么？”

答：“没有火和衣服。我只好用炮弹皮敲击石头取火。”

问：“日本人到那里旅游的人很多，你就没有碰见他们吗？”

答：“没有，因为我在远离人烟的地方。”

问：“听说你曾用拾到的手电筒的塑料外壳制做成衣服扣子，这次回国是否还想重操旧业，继续当西服裁缝呢？”

答：“我还没有想过（自言自语地）。 ”

横井乘日航特别班机由关岛飞回羽田，是二月二日下午二时二十五分。会见记者之后，遂住进新宿区户山町的国立医院，开始了疗养生活。他在羽田机场会见记者的第一句话是：“非常惭愧，我横井活着回来了。天皇陛下发给我的短枪仍然很好地保存着，带回来了。”

后来，横井到底还是重操旧业，开了个“横井服装店”，由于百货公司把他在关岛的长期野人生活中，亲手制作的种种物品搜集起来，举行展览，引起众人瞩目，使横井成了赫赫有名的人物。当他要选择配偶的时候，自荐当新娘的人竟源源而来。各地请他去讲演的甚多。他们送给横井的头衔是“生活评论家”。以这样的名气和人望，横井参加了在一九七四年的参议院全国区议员竞选，以二十六万余票，名列第七十三位（前五十位当选）。

实况转播“浅间山庄”陷落的情况

正当掀起横井热的高潮之际，二月十六日下午，联合赤军的阴险残酷的暴力事件暴露出来，使整个社会为之震颤。负责搜索过激派学生及其地下活动据点的群马县警署，在妙义山湖畔的林间道路上，遇见了一伙人，用轻型客货两用汽车牵引陷入泥沼的卡车。

警署人员松井田，出于工作的责任感，进行询问时，正在推车的三个男子立即逃进山里去了。坐在车里的一男一女，从里面把车窗上的玻璃关闭，对警署人员的劝说置之不理，自顾打开收音机，边听广播，边启开罐头，大吃大喝起来。警官们把这辆车一直推到离住户五百米左右的地方停下来，将车上的

男女逮捕。原来他们是庆应大学学生、“京滨安保共斗”的奥泽修一和横滨国立大学学生清水美佐子。同一天，在沼田市上发知町迦葉山的国有林里，警察发现了看样子象是地下活动据点的小房子，在小房子里查出了“京滨安保共斗”的吉野雅邦的指纹，他是栃木县真冈市的猎枪抢劫案中通缉捉拿的罪犯。

于是，十七日清晨开始，警察当局出动三百五十名机动队员和十五只警犬对妙义山一带大举搜查。结果抓住了隐藏在妙义湖附近山中的一男一女，他们是联合赤军的最高头目永田洋子和森恒夫。

接着于十八日，群馬县警署又出动三千人在栃木、长野各县警署的配合下进行搜索，下午三时过后，在长野县轻井泽町峰原的别墅地发现五名可疑的男子，他们肆无忌惮地用猎枪扫射警官队伍，警官队被迫以手枪还击，展开了激烈的射击战。五个男子俟机逃走，闯进了离轻井泽车站七公里的“浅间山庄”，他们把管理山庄的牟田郁男和妻子牟田泰子做为人质，固守山庄以逸待劳。

为了保障人质的安全，警官队不便强行攻克。连续十天用莱福枪和手枪向山庄射击。在这段时间里，强占山庄的坂东国男的父亲，留下一纸遗书：“我儿扰乱社会，对不起”，引咎自杀。

二月二十八日，警官队终于以决一死战的姿态拼命攻城，罪犯们也以短枪、手榴弹应战，经过八小时的激战，终于使山庄陷落。警察方面使用了瓦斯弹约千发，手枪子弹十五发，用高压水龙头喷水一百吨，两名警官以身殉职，包括电视摄像记者共十三人负伤，人质牟田泰子侥幸安全脱险。

攻克浅间山庄的现场实况，各电视台都进行了转播。

NHK从上午九时至下午七时除中间抽出五分钟播放国会新闻外，全部用来转播“浅间山庄”实况。下午六点半左右，当攻克山庄抓获罪犯时收看率最高，达百分之八十九点七。

警察当局对在妙义山麓逮捕的森恒夫、永田洋子进行审讯，搞清了在过激派内部还有私刑杀人事件。由于对在群馬县境内发现的五具尸体进行了侦破，永田洋子不得不招供，承认自己总共杀死了十二个同志，他们内部把这种私刑叫做“总结”。为什么在自己人内部搞暴力活动，私设刑堂呢？

因为这些人经常处在夜间零下十五度的低温条件下，又经常饿肚子，连洗澡的条件都没有，过着肮脏饥饿的困苦生活；男女关系的纠纷随之俱来；联合赤军（头目森恒夫）与“京滨安保共斗”（头目永田洋子）又为八百万日元资金的分配问题发生了内讧。后来森恒夫在东京拘留所的单人房间里悬梁自尽。

特拉维夫国际机场的悲剧

随后，又发生了有关联合赤军骇人听闻的事件。

特拉维夫五月三十日电，据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合众国际社、以色列联合通讯社共同报道：

三个看上去象是日本人的男子，于三十日下午十时三十分乘从巴黎起飞的法国航空公司132次客机（经罗马），到达以色列的门户特拉维夫国际机场。在海关，他们从行李里取出苏制AK47型短枪和手榴弹，向二百五十多位刚刚走下飞机的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乱射乱投一气，约百十来位旅客应声倒下，一片血肉横飞。人们还来不及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情，便四散奔逃。整个机场陷入突如其来的混乱之中。初步统计至少有二十六人死亡、七十三人受伤。三名罪犯中的一个人，在海关内向墙壁

投掷手榴弹，然后扑上去将自己炸死；另一个被艾鲁亚尔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抓住，其余一人在自己同伴的乱枪中毙命。

贝鲁特三十日电，据美联社、路透社报道：阿拉伯游击队组织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ELP），于三十日夜发表消息说，该组织袭击了特拉维夫机场。该组织透露，这次袭击是一次复仇行动。因为本月初，阿拉伯游击队在该机场抢占比利时的萨别纳航空公司飞机时，有两人被打死。

据六月二日的《朝日新闻》报道：在特拉维夫国际机场被抓住的罪犯，经机场警察署的再三追问供出自己是日本人，真实名字叫冈本公三，鹿儿岛大学农学部学生。经鹿儿岛县警署调查证明所供情况属实。随后，冈本被以色列法庭判处无期徒刑。

以大久保清为象征的三年喧嚣

在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二年三年间，使报纸的社会版热闹起来的事件颇多。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四日，高崎市的大久保清，涉嫌拐骗藤冈市女职员竹村英子而被逮捕。经调查搞清了大久保清奸污了英子，又将其杀害，埋在后妙义山的桑园里。大久保清自己供认曾以同样手段强奸、杀害了七个女性。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六日，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川端康成用煤气自杀。连遗书也没有留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否真的自杀还是个谜。

这一年，为报纸的文化专栏和社会版增添了热闹气氛的是关于“色情”的争论。一月二十八日，警视厅判定日活电影公司摄制的三部色情电影触犯了猥亵罪，对公司和电影伦理事务局提出起诉。为此就创作的表现自由问题引起争论。色情电影

是在这一年的大学祭开始上演并很快泛滥起来的。总理府在一九七三年进行舆论调查时，了解到反对解放色情文学的人，占百分之七十。

一九七二年有关新闻界内幕的谈资，是《每日新闻》政治部记者西山太吉事件。在日美双方就归还冲绳问题举行谈判之际，西山搞到一条情报，那是日美间的秘密协定：“日本将代替美国，支付美国借用军事基地的费用。”但是，《朝日新闻》谨言慎行，没有发表这条消息。

于是，西山把这一情报转给了社会党的国会议员，该议员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揭露并追究此事，外务省慌了手脚，急忙追究这一情报泄露的渠道。结果搞清了是外务审议官安川壮办公室里的莲见喜久子事务员将秘电的副本交给了西山。

东京地方检察院分别以违反保密义务罪和泄漏国家机密罪对莲见和西山提出起诉。对此新闻界力陈：“记者因工作需要，有了解情况的权力”，为西山被捕鸣不平。可是通过审讯弄清西山与莲见有私情，于是又响起了批判的呼声：“难道为了取得特别消息就可以无视记者的道德而欺骗女性吗？”由于这一事件，导致莲见与长期卧病的丈夫不得不分道扬镳。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日东京地方法院判处莲见有期徒刑六个月、缓期一年执行，宣布西山无罪开释。七月二十日，由于检察院向东京最高法院申诉，结果判处西山有期徒刑四个月，缓期一年执行。关于争论焦点“取材自由”问题，东京最高法院说：“其方法与手段达到社会常情不能容忍的程度，便构成了犯罪。”

这个时期发生的航空事件颇多。一九七一年七月三日，东亚国内航空公司的“万代”号在函馆以北坠毁，机上的六十八人

全部丧生。七月十三日在岩手县雫石上空，全日航空公司的飞机与自卫队的飞机相撞，死亡一百六十二人。这是由于自卫队飞机飞进了禁止进入的定期普通航线。以过失至死罪追究自卫队的责任，防卫厅长官增原惠吉引咎辞职。

一九七二年发生的海外航空事件分外多。六月十四日，飞往伦敦的日航 DC 8 型飞机在印度的新德里郊外坠毁，八十四人遇难。十五日飞往曼谷的凯赛航空公司康伯阿 880 型飞机坠落，十七名日本人死亡。十一月二十九日，日本航空公司的 DC 8 型飞机在莫斯科的修莱麦丘勃机场起飞失败，六十一人死亡。

公害问题依然相当严重，一九七〇年六月因接种牛痘疫苗造成了十一个婴儿死亡。七月在东京杉并区的立正高级中学，正在运动的学生有四十人由于光化学烟雾的作用突然栽倒。与此前后，还揭发出了静冈县田子浦港的水银污染问题。

大城市里的垃圾处理也是相当棘手的问题。一九七一年九月，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在都议会上宣称要解决垃圾处理问题。但是，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九日，江东区议会做出决议“要以实力阻止将杉并区的垃圾运入我们这里。”因而原准备把杉并区的垃圾集中处理的计划告吹。美浓部又决定将杉并区的垃圾处理设备移到世田谷区，可是世田谷区又掀起反对运动。

美浓部唯一取得成功的是模仿纽约市长林泽伊的“五号街”从一九七〇年八月二日起设立了“步行者的天国”。

第二十二章 洛克希德 案件及其余震

(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八年)

石油冲击引起的骚动

除战争以外，因国际性问题或事件造成如此强烈的冲击还不曾有过——这样说也不算言过其实。因为事实上日本在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七年接连遭到石油冲击、洛克希德案件、日元升值的打击。

就石油冲击而言，——日本一九七三年的石油消费量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七、共计二亿四千六百零九万千公升是进口的。从各国进口石油的比例是：阿拉伯国家占百分之四十三点七、伊朗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印度尼西亚占百分之十三点八、非洲、苏联、中国、南美占百分之五。一月一日，中东原油在当地装船时的价格为每桶（约一百五十九公升）一美元八十分。

可是到十月，由于波斯湾地区六国决定提高原油价格，阿拉伯国家决定控制采油量，因而将从来年（一九七四年）一月一日开始，原油售价每桶八美元。对于完全靠进口石油的日本来说，实在是个巨大的冲击。十一月十六日，田中内阁召开了急会议，磋商对策，最后确定了三大纲要：

“石油紧急对策纲要”——石油、电力的使用减少百分之十。缩短百货公司、超级市场的营业时间，深夜收看电视要有所节制。

“消费节约运动纲要”——霓虹灯等要尽量减少使用。电梯的使用减少百分之二十。要求自我控制私人汽车的使用。室内取暖的温度不要超过二十度。电视、收音机、电灯都要求随手关闭。

“政府机节约纲要”——办公楼门前、走廊等处的公用电灯一律关闭。公用汽车控制使用。职员上下班用的私人汽车也要自我控制使用。

当然，这一次石油冲击带来的必然结果是压缩生产、缩短作业时间、物价上涨。由于物价高涨，加深了企业与民众的经济危机感，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抢购手纸风波。十一月二日，不知从哪儿刮来了“手纸要脱销了”的谣言，尼崎市百货商场的廉售部一下子有二百多位家庭主妇蜂拥而至抢购手纸，这股风立即刮到东京，主妇们都慌忙储存手纸。各处的商店都挂出了“每人限购三个”的牌子，估计价格要上涨，出现了囤积手纸、垄断市场的商店。

汽油的销售情况如何呢？

出光兴产、丸善石油、日本石油等公司所辖的加油站都开始了连续不断的缓慢涨价。预定每桶石油提价幅度为五至十日元，每公升普通石油涨价七十日元，每公升优质石油涨价八十日元。

田中内阁为了确保石油供应，分别派遣副总理兼环境厅长官三木武夫赴阿拉伯产油国、通产相中曾根赴伊拉克、印尼，为寻求石油的稳定供应而四处奔波。

洛克希德案件败露

在三木内阁执政的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洛克希德案件败露了。在美国众议院多国籍企业小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洛克希德公司副会长丘奇作证说：该公司向荷兰、意大利、西德、土耳其等国进行了工作，以便使这些国家购买洛克希德公司生产的飞机。并且谈及对日本的通融工作。他说：“为了向日本高级官员支付工作费，我将钱交给了日本丸红公司的伊藤专务了。”这就是洛克希德事件的开端。

报纸公开报道这一消息之后，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于二月十六、十七两日分别传讯了国际兴业公司经理小佐野贤治、全日空公司经理若狭得治、副经理渡边尚次、丸红公司经理桧山广、专务大久保利春、伊藤宏。洛克希德公司的幕后顾问儿玉誉士夫因病卧床未能到会作证。但他的境况也由电视转播了。一个被传讯作证的人在回答质询时总是说：“记不得了。”于是，“记不得了”这句话一时间成了流行用语。

简言之，洛克希德公司为了使全日空购买其生产的飞机，通过丸红，或者全日空向田中角荣首相、桥本登美三郎干事长、运输省佐藤孝行政务次官等政要人物馈赠了工作资金。八月以前，东京地方检察院分别以行贿受贿、违反外汇管理法、做伪证等罪名将这些有关人士逮捕。

以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对丸红公司这一线索的初次审判为开端，开始了对洛克希德案件的审理。——总理大臣、自民党干事长、运输省政务次官对私营的全日空公司提出希望，劝导他们购买某种飞机，这究竟是否属于职务权限之内的事？他们所接受的赠款算是受贿呢，还是选举用的政治献金？这些问

题成了法庭上争论的焦点。因而直至一九七八年八月仍不能做出审理的结论。

正当政界掀起“倒三木内阁”的骚乱之际，一九七六年九月六日下午一时四十八分，发生了苏联的一架最新式的米格25型飞机到函馆机场强行着陆的事件。着陆后驾驶员比库特尔·伊凡诺维奇·别连柯空军中尉要求到美国政治避难。当天傍晚，苏联大使馆照会日本外务省，要求“面见别连柯中尉”和“引渡米格25型飞机”。

次日，自卫队将别连柯中尉护送到东京。苏联驻日大使勃利扬斯基向外务省提出抗议：“别连柯被日本以暴力押解东京，拒绝会面，违反了日苏领事条约。”日本外务省反驳道：“苏联对于侵犯我领空的行为不表示歉意，实在令人吃惊。”并说：“别连柯到美国政治避难完全是他个人的意愿。”尔后，别连柯在会见了苏联大使馆成员后，美国飞机护送其亡命美国。

防卫厅得到美国的技术协作，拆开了米格25飞机。九月二十五日，防卫厅把已经肢解的米格25飞机空运到茨城县小川町的航空自卫队百里基地，在美军的技术援助下，大约用了两周时间，对米格25的性能做了详细的研究鉴定。事后，将机体引渡给苏联。

日元升值与大型企业倒闭

在这数年间，日本经济状况与高速增长时期截然不同了。对于一九七三年秋出现的所谓“物价狂乱”的通货膨胀，田中内阁的财政大臣福田纠夫采取了紧缩金融、提高官定利率百分之二，削减一九七四年度预算中公共事业费百分之零点七八，财政投资贷款控制在百分之二十三（历来是百分之三十）等等一

系列措施。

由于福田的“稳定增长”、“紧缩财政”政策，半年以后，物价虽然受到控制，但又产生了反作用——经济萧条，即通货膨胀下的不景气。事实上，一九七四年倒闭的产业（资本一千万日元以上的）达一万一千六百八十一家。负债总额达一万亿六千四百九十一亿日元。

一九七五年，尽管三木内阁的经济企画厅长官福田与通产相河本敏夫连续四次实施萧条对策，纤维业的兴人产业公司还是因不动产事业的失败而倒闭。景气的恢复相当乏力。一九七六年，由于在野党追究洛案，财政预算的通过大大推迟，萧条对策也不得付诸实施，从而经济衰退更加严重了。

一九七五年倒闭企业一万五千六百三十八家（比上一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三点三）负债总额二万亿二千六百五十七亿日元（比上一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七点四）创历史最高记录。其中包括大型企业东洋纸浆公司（负债八百八十二亿日元）。安宅产业公司不得不与伊藤忠商事合并。这一股企业倒闭风主要是由于经济萧条造成的。

一九七七年失业队伍达一百二十七万人，失业率占百分之二点四。日本经济的衰退当然是由于受到了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一九七七年秋季，突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生了日元升值现象。原来一美元兑换二百八十日元，可是进入十月以后，一美元兑换二百二十日元。正如美国财政部长布鲁门撒尔、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长詹金斯所说的：“日本的贸易出超，黑字增大是导致国际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日本至今仍然在限制进口”。以此为口实，他们采取了报复性措施，也就是所谓发动日元升值攻势。其结果使日本的出口产品企业除汽车和彩电之

外，各产品企业、有关的中小企业及零配件企业都被置于深刻的危机之中。波止滨造船公司的倒闭（负债总额五百亿日元）便是典型的一例。

一九七八年二月，生产三合板的永大产业公司及其有关公司以一千八百亿日元的最高负债额倒闭。四月，生产男子毛衣的VAN公司宣布破产，负债五百亿日元。三月份失业人数一百四十一万，仅次于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九年，居第三位。

福田内阁勉强在四月份准备了对造船、海运、纤维等“构造不况”业种实行救济、转产的法案。并且编造了二十四万亿日元的大型预算，六月以后，渐渐呈现出景气复甦的征兆。

在这样的经济萧条时期，连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总评）搞的罢工运动也不得不变换方式了。因为国民大众对于每年例行的“春斗”违反公劳法所搞的国营铁路大罢工之不满情绪随着经济的衰退与日俱增。一九七三年一月十日，在高崎线上尾车站因国营铁路罢工而阻塞的通勤者约一百人愤怒地毁坏停在那里的电车和车站的玻璃，闯入站长办公室。类似事件在各地多有发生，四月二十四日，被总评的统一罢工所激怒的人群，于当天夜里占据了上野、赤羽等三十八个车站，并进行了纵火等破坏活动。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公劳协^①搞起了“夺取罢工权的罢工”，国营铁路全部瘫痪，邮政、电信、电话机构搞起了“据点罢工”。全国舆论没有支持公劳协的罢工。三木首相十二月一日发表严厉的政府声明：“要以法律秩序为前提，不允许搞非

公劳协：全称为“公共企业劳动组合协议会”，是国营企业工会的联合组织，主要成员为国营铁路职工。——译者

法罢工。”公劳协虽然力主“不答应条件决不复工”，可是一部分中、小企业、农协等组织却开始出现了“要求赔偿因国营铁路罢工而蒙受的损失”的动向。十二月三日，公劳协也不得不做出了让步，决定中止“夺取罢工权的罢工”。这是由于国营铁路等企业在赤字累累的情况下还搞罢工的做法遭到舆论的反对，尤其是一九七五以来，要求把国营铁路移交给私人管理的呼声高涨。

在经济萧条进一步深化的一九七七年一月四日，全日本工会总会同盟发表了工资白皮书，强调“与其提高工资不如优先确保增加就业”。九月七日，在钢铁劳联的大会上宫田委员长也说：“为了抵消物价上涨部分，有节制地提高一点工资也是不得已的。”

经济不景气导致税收减少，县、市等地方政府的财政也陷入了赤字频出的困境。特别是迄今为止革新自治体因工会势力强化，人事费开支增加，财政赤字加剧，甚至东京都知事美浓部在一九七八年也表明了这样的意向：“因空前的赤字，定期调薪一概暂停”。革新自治体在一九七八年的横滨市长和京都府知事选举中事实上已击败了共产党，使日共从此衰落。

个人生活平安无事

在这数年间，社会、个人生活均发生了某种变化，这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电视的商品广告，报纸杂志的商品信息鼓动起人们的“消费”热情。“用过就扔掉”，“以消费为美德”、“消费者王”诸如此类的观念已经社会化，成为人们的通常观念。但一九七三年的石油冲击袭来之后，无

由左翼掌权的地方政府。

论社会还是个人都悄悄地退回到“节约的时代”。

经济萧条促使国民大众节约物资，克制购买的欲望，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总需求的停滞。加之物价上涨，消费者的购买力增长缓慢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石油冲击导致油价高涨，物价也随之受到影响。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公共费用一齐提价。稻米的标准价格由原来每十公斤一千六百日元提高到两千一百日元。国营铁路的客运费提高百分之二十三点二。地铁、公共汽车的最低票价由四十日元提高到六十日元。连小件邮包、医疗费也无一例外。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八日，东京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与前一年同期相比上涨百分之十四，纯属典型的经济萧条时期的物价上涨。

但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尽管出现了洛克希德案件、刑事犯罪、成田机场斗争等不安定因素，但社会总体、个人生活水平并没有低于高速增长期的水平，在抑制消费欲望的同时仍然维持着某种程度的奢侈生活。

这是因为日本经济很快地摆脱了石油冲击，显现出明朗的前景。刚刚跨入一九七四年，石油、电力的消费就渐渐恢复原状。五月三日，邮政省宣布解除了限制深夜收看电视的规定，电视又恢复了原来每天播放到深夜的习惯。实际上，在萧条时期，许多人依旧尽情地享受着业余生活的乐趣。

一九七三年四月，节日修改法案成立，规定“节日与星期日凑巧在同一天时，次日补休星期日。”在新增加的诸多节日里，如同在高速增长期一样，“移动暴发”现象到处可见。所谓“移动”，就是人或物资从空间到空间的移动。为了观光、贸易，人或物通过汽车、飞机等现代化交通工具活动起来。继续呈现

出高速公路上汽车川流不息、飞机总是客满的状态。

一九七五年七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举行了冲绳海洋博览会，参观者虽然比当初预计的少一万人，但还是达到三百四十八万这样惊人的数字。正是这些借助于飞机、船舶移动的人们助长了经久不衰的“业余娱乐”热风靡全日本。仅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一天，新干线的乘客就突破十万人，多数人依然以观光或商业活动为目的。

主要城市的开发也在扎扎实实地进行着，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全日本最高的一幢大楼——三井物产公司大厦在东京新宿落成，楼高二百零九米，地上五十五层，地下三层。按照新宿、涩谷、池袋等“副都市中心”的开发计划，高层建筑拔地而起，鳞次栉比。从这些表面现象看与高速增长时期没有任何变化。

七月九日，发生了一件颇能说明一九七六年当时社会状况的新鲜事。在新干线的三岛车站，司机下车去解手，可是一去就不回来了。只好让副司机代他开车了。

国营铁路当局与工会心照不宣，将这件事隐瞒起来，可是因为报纸毫不客气地揭发出来，只好做了检讨。那位司机之所以敢这样漫不经心地对待工作，是由于个人生活有保障的缘故。引用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内阁广报室发表的一个生活舆论调查报告，来证明这种个人生活天下太平的现象颇为有力。据该调查报告称：百分之九十的国民具有中流意识，虽然对物价上涨和其他一些问题不满、不平，但实际上，大多数国民对自己的生活怀着满足感。

不妨举一个例子来看上述的社会倾向。在这数年间，体育活动蓬蓬勃勃。赛马运动依然极为盛行。一九七三年，赛马场

上的佼佼者——良马“哈伊塞克”博得万众喝采，成为不可一世的“皇后”。一九七八年著名的良马“顿勃茵特”在东京赛马场上不幸后肢骨折，各报纷纷作为重要新闻加以报道。四十三天之后，当“顿勃茵特”因合并蹄叶炎，全身衰竭而死去时，各报刊又大肆报导一番。赛马热风靡全国，牵动着每个国民的心。

但是，最为盛行的运动莫过于棒球。巨人队的王贞治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三日累积计算达到七百个还垒球的好成绩。十月十一日又创造了七百一十五个还垒球的优异成绩，打破美国棒球之雄“巴布”鲁斯保持的记录。使全国的棒球迷们为之狂欢。人们热切地期待王贞治有朝一日能破美国棒球大王、黑人汉克·阿伦的记录。王贞治不负众望，翌年九月三日果然打破了阿伦创造的记录，取得垒积计算七百五十六个还垒球的惊人记录，无论男女老少，举国上下都忘乎所以地沉浸在“王贞治热”之中。

成田机场过分难产带来的不安

这个时期，一直陷入纠纷与争斗的是修建成田机场问题。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九日，机场公团拆除了反对派筑起的障碍物——铁塔，再次准备开工时反对派一千人举行了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四月十七日再次举行了同样的活动，参加者达二万三千人。

五月六日，机场公团拆除反对派在跑道南端筑起的两座铁塔。七日，运输省派人前来进行检查验收。八日，“三里塚、芝山反对建造机场同盟”召开集会，抗议拆掉他们的铁塔，与警察机动队发生了冲突。九日，反对派用燃烧瓶攻击千叶县临时派出

所，使六名警察负伤。十月十日，加入反对派的中核派纵火烧毁了日本航空公司重要负责人的宅邸。

尽管出现了这样的事态，政府在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内阁会议上仍做出决定：“一九七八年三月三十日开始使用成田机场。”十二月，国劳开始了反对给成田机场运输燃料的总工斗争。二十六日，机场公团强制反对派让出了最后一个据点——预定建造机场内高速公路的一大片土地。

日本社会在不安定的气氛中迎来了一九七八年。二月六日，千叶县警署和警视厅机动队进行现场检查，在预定修建跑道的地方着手拆除反对派在这块土地南端竖起的障碍物——铁塔，反对派奋起抗拒，与警察交手搏斗，二十七人受伤、四十一人被逮捕。预定开航的时间临近，一切准备工作迫在眉睫，当三月二日政府、公团命令从鹿儿岛县石油联合企业往机场燃料基地运送石油的第一次列车通行时，安排了七千多名警察沿途护卫。

然而，在即将开航的前夕，三月二十六日，过激派闯进了机场的航空管制塔大打出手，将塔内的管制设备破坏殆尽。为此，政府不得已只好推迟开航时间，决心对过激派采取严厉取缔措施。因而，通过成田新法（东京新国际机场的安全确保措施法案）成为当务之急。但是，在国会上讨论通过此法案时，社会党、共产党表示反对。就在成田新法即将通过的前夕，过激派的骨干分子先后在大阪府警署的射击场、广岛航空标识局等处纵火闹事。五月五日，过激派又用定时炸弹炸毁停放在千叶县酒井町京成电车调车场上的机场专用高速电车。在爆炸引起的轩然大波尚未平息之际，五月十二日成田新法通过了。

这时政府又重新决定“五月二十日成田机场开航”，并扎

扎扎实实地为之准备。届时，在戒备森严的警戒体制下终于开航。从决定建造成田国际机场至正式开航，由于反对派的阻挠，几经周折，历时十二年之久。这天，过激派一伙在埼玉县所沢市内切断了航空管制用的地下电缆。使机场的国内、国际航线的起飞、降落全都陷于瘫痪，造成极大混乱。他们还企图破坏成田机场附近的雷达基地和航空无线标识。

冲破反对派的暴力阻挠，二十一日从洛杉矶开来的第一班客机平安降落在成田机场。翌日，由成田开出的第一班客机起飞。从此，成田机场正式全面使用。即便如此，过激派仍不甘心，从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又进行了一系列破坏活动：用硫酸溶液腐蚀断了东京电力公司的送电铁塔；使市内新市区的一万九千户断电；袭击了机场建造公团设在富里村的富里水泵厂；切断东京都内六个交通岗的信号灯；割断运送燃料的鹿儿岛线列车控制装置的电线和铁道专用电话线，使燃料列车无法开动，通勤者和走读学生四千余人只好望车兴叹、无可奈何。

漂流的陆奥号向何处去

原子能船陆奥号的命运与成田机场相仿，漂零了十余年仍找不到归宿。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佐藤荣作内阁决定，青森县陆奥市为陆奥号的母港。尔后，又拖延了数年，直至一九七二年，陆奥号才获准将其八千三百五十吨的船体开进陆奥湾北部的港口。可是，当地渔民以反对原子能船搞动力实验为由，不准陆奥号活动，迫使其在港内搁浅。一九七四年夏，青森县知事竹内俊吉阐明：“已经得到政府确认，陆奥号进行动力实验之后，将重新考虑为其更换母港。”此外，三木内阁的科学技术厅长官森山钦司也发表讲话：“八月二十四日，要让陆奥号

出港；在太平洋上进行功率输出实验。”

为什么陆奥号一度被拴在港内不得移动呢？那是由于陆奥湾沿岸担心污染海水的强硬派渔民，和县内的左翼团体坚决反对动力实验。八月二十四日晨，企图阻止陆奥号出港的二百五十条渔船，团团包围了陆奥号，使它不能离岸。幸亏海上风狂浪急，渔船抵当不了汹涌的波涛，只好自行解除包围，趁这当儿，陆奥号逃出港口。

行至太平洋上的陆奥号开始进行原子能动力输出实验。不料，九月一日，当它的能量刚刚放出百分之二的时候，自动报警气笛响了起来。因原子炉发生异常，有放射性物质泄露出来。陆奥号历尽艰辛争得的一次实验机会就这样告吹。无论青森县知事，还是陆奥湾沿岸的渔民，更加视原子能船如洪水猛兽，无论如何不准陆奥号开回母港。失去了安身之地的陆奥号，不得已，只好在海洋上增加了补给，又去漂流。

这样熬过一个多月之后，为了让漂流的陆奥号进港，自民党总务会长铃木善幸与陆奥市市长、渔民代表共同磋商。结果，决定“取消陆奥湾这个母港”，“向当地政府支付十二亿日元”。于是，十月十四日，陆奥号得以暂时进港。

这样，政府必须为陆奥号重新物色母港。曾经选择对马港作为母港，但同样遭到反对。直到一九七五年六月，佐世保市市长辻一三接受了政府的要求，宣布“允许陆奥号开入佐世保港”。这时，长崎县渔联以陆奥号进港会使渔场遭到破坏为口实，极力反对，并举行了海上示威。先前在陆奥市曾经为陆奥号的母港问题，发生两派的对立，这一次在佐世保同样出现赞成与反对的两派激烈之争。

一九七七年四月一日，辻市长向市议会提出“根据国家要

收回陆奥号进港维修的计划，拟同意其开入“佐世保港”的方案，通过表决获准。长崎县议会也以“去掉陆奥号上的核燃料”为附加条件，准其开入佐世保港修理。这样，陆奥号的维修问题总算有了眉目。

陆奥号所以能开进佐世保港，是因为当时正值经济衰退时期，造船工业尤为萧条。佐世保重工业公司勉强支撑着，承担陆奥号的修理任务，无疑对佐世保重工业公司的经济补益非浅。鉴于此种情况，政府要求佐世保市承担封闭了核装置的陆奥号的修理任务。根据政府的要求，长崎县议会与佐世保市议会共同磋商，决定让陆奥号进港修理。在县议会和市议会表决时，都发生了骚乱——将持反对意见者排斥到旁听席上，因而请警察来维持秩序。

但是，修理完毕的陆奥号，将到哪里去寻觅它的母港呢？——或许还要因为没有母港而再次出去漂流吧。这种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昭和时代的最后一幕。昭和时代是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时代——不仅日本，全世界的文明史均由于出现了过去不曾有过的新技术而造就了第二文明体系。

能够给这种新的文明体系以巨大的变革，以便再创造出第三文明体系的便是原子能，恐怕任何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如果斗胆评价一下这一变革的进程的话，美国、苏联等大国已经是早晨六点钟左右的光景，而日本则处于黎明前的黑暗。

换言之，在原子能开发利用方面，日本只不过才到幕末阶段。何以见得？因为日本陷入了如同攘夷运动一般激烈的反对原子能运动的旋涡。原子能船的建造、使用、接收；原子能发电站的建设、利用，可以说，这是建国、建港的百年大计。然而，对这些事情的反对——犹如攘夷运动形成风暴的前夕，正在

聚积着力量。因而，欲图关乎建国、建港的百年大计为时尚早。或许日本来不及解决通过和平利用原子能开发“第三文明”的问题，昭和时代的帷幕就会关闭，而把它留做下一个朝代的命题吧！

译者的话

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日文原名为《素颜の昭和戦後》中译本依据全书的中心内容和我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易为现名。

本书按时间顺序，从日本战败投降写到洛克希德案件，向我们展示了战后三十年日本的历史画卷。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日本在战败后的惨状——经济崩溃、贫穷和饥饿无情地折磨着战争的幸存者；社会、伦理、道德、风俗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接着看到的是在美国的扶持下，在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中，日本以恢复经济为杠杆，大步走上复兴的轨道。岁月荏苒、沧桑互易。至六十年代末，经济“高速增长”政策在日本创造了“人间奇迹”。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七〇年，经济增长率平均保持在百分之十点三以上，人均国民收入由三百美元猛增到一千三百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一个穷困潦倒的战败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日本经济的飞跃发展，不仅使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感到“后生可畏”，而且吸引了众多寻求富国之途的发展中国家纷纷研究日本。日本究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本书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国和日本一衣带水，社会制度不同，但借鉴其适于我国的长处，避免其走过的弯路和弊端，无疑将有助于我国的四化建设。从这种意义上说，本书对关心祖国现代化建设的同志将是一本颇有价值的参考书。对研究国际问题，特别是研究日本问题或

从事有关日本方面的学习或工作的同志也会有所启迪。

作者户川猪佐武是日本著名作家、政治评论家，一九四七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后，入《读卖新闻》报社任政治部记者，负责采访首相官邸和自民党总部、外务省。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六年先后到东南亚、莫斯科担任特派记者。一九六一年创立“日本国民外交协会”并出版发行《20世纪》月刊杂志，自任编辑。主要著作有《昭和现代史》、《昭和外交史》、《战后风俗史》、《日本的首相》、《昭和的宰相》、《吉田学校》等。本书于一九七八年出版，在日本产生广泛的影响。

由于立场和世界观等原因，书中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与我们有很大差距，相信读者会以批判的眼光对待之。

本书在翻译时，对原著的个别章节和文字作了删节。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于土、李根海、蔡铭熹、王振经等同志的热情帮助和指导。在此谨致衷心的感谢。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译文难免有误，恳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一九八三年一月

序

日本的昭和时代，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战败为界，战前与战后截然不同。

战败后，日本社会处于何种状态，这正是本书所要阐明的问题——在战败的废墟上，我们熬过了物质贫乏的时期。那时，我们的政治、经济结构、社会、生活、风俗乃至我们的思想、伦理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演变。

保留着明治时代的气质，思想感情跟不上这种变化，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大有人在。这些人被称为“战前派”。我们这些在战争时期青春已过，出生在大正时代的人则得了一个别致的称号——“战中派”。那些对战前生活体会很浅，战争结束时正咿呀学语的人则被称为“战后派”。当然，“战前派”与“战后派”之间有断层，无论家庭、社会都产生了若干悲喜剧。

这种变化——超出了我的想象范围，——与幕末到明治的变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即便同是昭和年代，战前与战后似乎也判若两个时代。如果分开来说，战前昭和的社会风俗和生活等近乎十九世纪的明治时代，而战后昭和则近乎未来的二十一世纪。

因而，昭和时代是一个混沌与矛盾的时代，十九世纪的传统、遗产、残渣依然部分地存在着，而与俨然有理地保留旧时代风貌的遗老遗少相反，向二十一世纪挺进的预兆已不可阻止地

呈现出来。这个新世纪也以其魅力吸引着日本。在形象的变化上也是既有从明治到昭和，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延续下来的变化，又有战后才开始有的、迈向二十一世纪所形成的变化。

例如，在本书里涉及到的一九六六年的“丙午”年间出生率下降现象，岂止是十九世纪，简直是“江户”时代残留下来的封建迷信现象。在保留着这种社会倾向的同时，无论我们的心理，或者社会体制都已领受到二十一世纪的原子能发电，以及通过核反应产生的能源。要说奇怪的话也真奇怪，这就是昭和时代的写照。

战前与战后，哪些部分变化了，哪些部分延续下来了，这要借助于昭和时代发生过的若干事实，用实事求是的眼光来观察才能理解。只有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允许我们对“昭和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做出正确的评价。

或许我有点过分强调自己的道理了，总而言之，诸位读了这本书后，如能了解昭和是什么样的时代，发生了哪些事件，那就是我的心愿。如果在这些知识、认识的基础上，诸位能够得出结论说：“昭和就是这样的时代”，那就更好了。

但是，我想预先声明的是：本书只二百余页，要想把战前战后发生的事情不分巨细全都包罗进去，实难办到。好在迄今已出版了很多关于某一具体事件的专著。这本书勿宁说是一部战后昭和的“通史”或“概论”。

遗憾的是，还没有一本把迄今为止的昭和时代连贯起来的“通史”、“概论”问世，我斗胆进行了尝试，但若有需要彻底究明某一细节者，还请一阅我写作时参考、引用过的专著或记录。

户川猪佐武

一九七八年盛夏

